



金山路漫漫

[美]麦美玲·迟进之著

4.371.2

3

出版社

装帧设计：常翰卿



渝联目：16—3

ISBN 7-5011-0023-3/D·5

统一书号：3203·130 定价：2.20元

D634.371.2

M283

[美] 麦美玲 迟进之著

金山路漫漫

崔树芝译 冯仪民校



新华出版社



10075092

A PLACE CALLED CHINESE AMERICA

Diane Mei Lin Mark and

Ginger Chih

KENDALL/HUNT PUBLISHING COMPANY

根据美国肯达尔·亨特出版公司1982年版译出

金 山 路 漫 漫

〔美〕麦美玲 迟进之 著

崔树芝 译 冯仪民 校

*

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新华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7.625印张 插页5张 166,000字

1987年11月第一版

1987年11月重庆第一次印刷

印数：1—2,100册

ISBN7-5011-0023-3/D·5

统一书号：3203·130

定价：2.20元

目 录

前言	(1)
美国华人协会	(6)
第一章 美国华人史溯源	(8)
美中商船贸易	(8)
打开中国门户	(10)
清王朝的衰落	(12)
移民浪潮	(13)
加入淘金潮	(15)
铺设中央太平洋铁路	(18)
第二章 开拓者	(22)
加利福尼亚州	(24)
发展农业、渔业	(25)
从事工业劳动	(28)
其它地区	(30)
西北部太平洋沿岸地区	(31)
西南部	(32)
南部	(33)
夏威夷	(35)

第三章	排华运动	(38)
	矿区里的迫害	(41)
	“华人滚回去!”	(43)
	暴乱遍及全国	(46)
	排华法案	(49)
	排华暴行	(50)
	通过立法加剧排华	(54)
第四章	唐人街的诞生	(58)
	天使岛：一九一〇至一九四〇	(59)
	唐人街的形成	(63)
	保留传统文化	(64)
	唐人街的夜晚	(66)
	血缘团体	(67)
	会馆	(68)
	华人六会馆	(69)
	商业公会	(69)
	秘密会社	(70)
	唐人街以外的华人企业	(72)
	华人社区——唐人街	(74)
第五章	妇女与家庭	(76)
	妇女在中国的传统地位	(77)
	早期旅美妇女	(78)
	妻室移居美国	(80)
	妇女挣钱养家	(82)
	保留民族传统	(84)
	孩子帮工	(87)
	子女教育	(89)
	有家难团圆	(92)

	唐人街的变迁·····	(93)
第六章	本世纪前半叶的回顾 ·····	(95)
	改良运动·····	(96)
	孙中山与国民革命·····	(98)
	中华民国的诞生·····	(99)
	侨胞支持抗战·····	(101)
	华人日趋同化·····	(102)
	寻求美国之梦·····	(106)
	争取平等权利·····	(111)
第七章	历史性的转折 ·····	(116)
	走出唐人街·····	(119)
	撤销排华法案·····	(120)
	战后·····	(122)
	五十年代的美国·····	(126)
	中产阶级的美国华人·····	(127)
	麦卡锡主义与唐人街·····	(130)
	搁浅了的中国留学生·····	(132)
第八章	模范少数民族的苦衷 ·····	(136)
	新移民涌入唐人街·····	(138)
	唐人街的住房问题·····	(139)
	华人就业问题·····	(140)
	华人健康问题·····	(143)
	青年帮派集团问题·····	(145)
第九章	促进社会变革 ·····	(152)
	民权运动的启示·····	(153)
	社会服务机构的出现·····	(154)
	美国青年的影响·····	(157)
	越南战争·····	(158)

	开展亚裔美国人问题研究·····	(159)
	唐人街的青年·····	(161)
	华人社会组织起来·····	(164)
第十章	摆脱社会偏见 树立华人形象 ·····	(172)
	从“黄祸”到“签证饼”·····	(173)
	“功夫”热·····	(176)
	银幕上的东方女性·····	(177)
	进一步 退两步·····	(179)
	美国华人文化·····	(181)
	文学·····	(182)
	戏剧·····	(188)
	美术·····	(189)
	音乐·····	(191)
	舞蹈·····	(193)
	电影、电视与广播·····	(193)
第十一章	当代华人社会概貌 ·····	(196)
	就业状况·····	(197)
	精神卫生问题·····	(199)
	老年人问题·····	(202)
	印度支那难民问题·····	(204)
	教育问题·····	(206)
	为保留唐人街而斗争·····	(209)
	维护亚太裔美国人的权利·····	(211)
	美中关系正常化与美国华人·····	(213)
	开创未来·····	(214)
第十二章	后记 ·····	(218)
附 录	·····	(222)

美国主要各州华人人口分布情况表(一九六〇、一九七〇、 一九八〇)	(222)
美国华人人口性别比较表(一八六〇至一九七〇)	(223)
美国华人人口区域分布表(一九六〇、一九七〇、 一九八〇)	(223)
美国华人出生情况表(一九〇〇至一九八〇)	(226)
美国各州印度支那难民人数表(截至一九八一年 六月三十日)	(227)
美国各州华人人口分布图(一九八〇年)	(228)

前 言

美国华人——她是一个不断成长壮大的民族，她倾注了几代人的心血在美洲大陆上建立起自己的家园；她有着—部历尽沧桑、艰苦创业的历史。这部历史记载着一百三十五年间华人在美国这块土地上披荆斩棘创建的业绩，这部历史昭示和讴歌着华人自强不息的奋进精神。正是这种精神，激励着他们踏上漫漫“金山”路；正是这种精神，鼓舞着他们历尽坎坷与不平，经过数代人的奋争，终于赢得了自己民族的尊严。

这本书的主要目的，在于回顾和审视美国华人的历史、文化与社区的发展，让广大读者能够通过书中大量的口述资料和图片，感受到中华民族强大的生命力。

本书开头四章，记述了中美两国早期的交往，追叙了十九世纪中叶迫使中国成千上万黎民百姓离乡背井、出洋谋生的社会背景，也描绘了早年旅美华人的生活经历。虽然当年华人是被加利福尼亚的淘金热所吸引来到美国的，但是由于当时年轻的美国正处在向西部开发的时期，因此华人的到来实际上填补了美国开拓西部疆域劳动力奇缺的空白。华工们修筑了横贯美国大陆的铁路干线；他们把加利福尼亚州贫瘠的荒原改造成了富饶的农田；他们还进厂做工，促进了美国西部新兴经济的繁荣。

然而，华人自踏上美利坚这块土地的第一天起，就遭到种族主义者的百般敌视。“抢走了白人饭碗”、“败坏了城市道德风尚”等种种莫须有的罪名接踵而来，强加到华人头上。最终导致了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间的暴力排华运动。一八八二年颁布的“排华法案”，明文规定限制华人移民入境，成为美国有史以来第一个将种族歧视合法化了的法律条文。继“排华法案”之后，美国其它各领域内也相应出现了各种歧视华人的条例与规定。

在这些来自社会和法律的种种歧视面前，华人不仅顽强地生存了下来，而且建立起了自己的社区，并进而对美国社会作出了巨大贡献。第四章分析了早期唐人街单身汉社会的产生，以及为适应单身汉社会的需要而出现的各种名目繁多而体系庞杂的华人组织。这些组织起着维系社会秩序和保存民族文化的作用，同时也代行家庭的职能。

第五章集中描述了早期移民的妻室，内容包括中国妇女的传统社会地位，以及妇女来到美国后对于改变唐人街单身汉社会结构所起的重要作用。到二十世纪初时，唐人街上已出现了第一代美国出生的华人。

第六章是全书的转折点。一九一一年中华民国的建立，曾一度使旅美华侨感到无比振奋和鼓舞。但是继之而来的数十年间，由于国内政局与社会的动荡不安，使他们觉得还是留居在美国更好一些。于是，他们开始把美国当成了自己的家，但却并没有完全为美国社会所承认。

第二次世界大战为改善华人在美国的处境带来了新的转机。战争期间，中美两国同属同盟国，而且美国华人无论在前线还是在后方，都表现了对美国的极大忠诚。于是，美国在一九四三年废除了“排华法案”。接着，其它各种歧视性的法律规定也慢慢逐步

取消。因此，在整个旅美华人史上，这一时期无论就心理方面还是就政治方面而言，都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转折点。华人有史以来第一次有权申请加入美国国籍，第一次有权拥有自己的财产，第一次有权享受在政府机关就业的机会，第一次有权在唐人街以外的地区居住。虽然他们也知道，这些法律上的变化并没有立即消除社会对他们的偏见，但他们还是执意要在这些新的社会领域内，为自己争得一席之地。只是他们在努力争取为美国主流社会所承认的过程中，曾一度几乎丧失了自己的民族文化传统。

进入本世纪六十年代末期，受当时美国社会上民权运动的启示，年轻一代华人开始追寻曾一度失去了的民族文化。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发现，虽然美国华人的历史不曾在任何一本美国教科书中提到，但这却是一部多么值得引以自豪的历史啊！他们不仅找回了自己的民族文化，而且赋予她以新的生命，使之在美国发扬光大。与此同时，华人界的政治活动家们还开始把注意力转向唐人街内日趋严重的各种社会问题，诸如住房问题、健康问题、青年帮派集团问题以及就业问题等。

书的最后几章着重介绍了近些年来华人社会发生的重大事件和存在的问题；并向读者表明，华人社会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具有多重含义的概念。她由来自中国不同地区、属于不同阶级、具有不同政治信仰的数代华人所组成。他们中有些人已是第六或第七代移民，有些则还是人地两生的新移民，有些华人如今已名声赫赫、饮誉国内外，有些则至今还在唐人街内终日操劳、勉强度日。本书试图从各个不同的侧面来描述华人社会的全貌；并以美国历史和中美关系发展史为线索，来阐述美国华人的历史。

在此，我们谨向本书从酝酿到出版的全过程中曾给予我们支持和帮助的所有人们表示真诚的谢意。“美国华人协会”（简称“美

华协会”，一个维护在美华人权益的组织)是本书编著和出版的倡议者与赞助者。美国教育部为本书提供了资助。我们特别感谢负责本书出版工作的凯瑟琳·布朗女士与教育部前任民族问题研究室代理主任卡尔·爱泼斯坦先生。“美华协会”创始人及该会首任全国委员会主席王恭立先生，亲自担任本书顾问委员会主席，并负责全面安排和联络参加本书编著与出版工作的各方力量。“美华协会”前执行委员会主席李海登(音译)先生为本书的出版在调查研究、筹集资金和行政事务等方面均给予了重要的支持。

顾问委员会成员艾玛·谭·宋女士、斯坦利·苏博士、塞缪尔·朱博士、郭邓如鸯⁽¹⁾女士、陈爱丽(音译)博士、查尔斯·梅先生以及奥蒂斯·邵博士等诸位，在本书编著工作的开始与结束阶段，都提出过许多有益的建议和修改意见。翁万戈先生与弗吉尼亚·翁女士在筹集资金以及本书最初阶段的构思方面，也给予了很大的帮助。

在为本书收集资料的过程中，我们的足迹几乎踏遍全美国，采访了许许多多的人，搜集了大量照片，并实地察看了不少华人社区的现状。我们每到一地，都有“美华协会”成员以及本书的支持者们向我们介绍情况，并为我们提供十分可贵的帮助。还有许多人抽出宝贵时间，向我们叙述他们各自饱经沧桑的生活经历，并与我们共赏他们珍藏多年的家庭影集。我们在此谨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苔洛·卡娜扎娃女士把采制的大量录音资料整理成了文字。莉兹·霍尔、劳伦·黄、乔治·库珀诸位以及查尔斯·李博士协

(1) 郭邓如鸯的英文名字为 Beulah Kwoh。——译者

助详细审阅了手稿。麦礼谦⁽¹⁾先生不仅在本书的资料收集方面提供了指导,而且惠予审阅了全部书稿。我们感谢编辑罗斯玛丽·埃金在定稿过程中帮我们出色地润色了全文;感谢设计人员南希·基尔希·苏吉海拉与肯茜·苏吉海拉在出版过程中给予的指导与鼓励。

我们还要感谢我们的亲属和朋友们,他们自始至终都全力支持我们的工作。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我们要深深地感念所有的美国华人开拓者——无论是他们中的先驱者,还是继往开来者——因为正是他们,赋予了我们创作的灵感与激情。

(1) 麦礼谦的英文名字为Him Mark Lai。是前任美国华人历史学会会长。——译者

美国华人协会

美国华人协会(简称“美华协会”)创建于一九七三年,是一个维护美国华人权益的非营利、无党派组织。该组织总部设在首都华盛顿,并有二十多个分会遍布美国各地。美华协会致力于确保华裔美国公民和华裔永久居民应享的各种权利,并代表他们的利益在美国国会进行游说和疏通。

美华协会的基本宗旨是:尊重美国宪法;争取民主权利;鼓励美国华人积极参与公民生活和国家生活;确保华人获得公正待遇、同等机会与平等权利;消除愚昧与偏见,改善在美华人形象;发扬华人及其他亚裔美国人的民族传统文化。

美华协会政治教育委员会对涉及到美国华人利益的各种事务都予以关注和支持。美华协会不以组织名义对任何外国的政治事务发表观点,它仅致力于改善在美华人的政治地位。美华协会的商务顾问委员会把工作重点放在美国工业与商务方面。美华协会的华人妇女组织则专门为妇女问题进行呼吁。各地方分会负责培养该组织领导人和发展组织成员;同时举办和开展各项活动。美华协会还主办一份全国性双月通讯刊物《形象》,其发行对象是该组织会员及其它各社区组织。这份刊物的宗旨在于报道联邦政府的各项计划方案、立法议案以及美华协会自身所关注的各项工作,

也负责介绍和交流各地方分会的活动情况。美华协会每两年召开一次全国性会议，同时举办旨在起宣传教育作用的研讨会，讨论华人和其他亚裔美国人所共同关心的问题。研讨会欢迎公众随意参加。

美华协会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要致力于解决的问题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放宽华人移民入境限额；

扩大并发展双语和双重文化教育；

为新移民、难民、辍学者和以前的青年帮伙集团成员开办双语职业训练班；

进一步做好对来自东南亚和香港地区的难民等人员的安置工作；

解决好亚裔美国人在经济发展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如为他们提供小型企业管理方面的帮助等；

通过美国总统行政命令，宣布举行每年一度的“亚太裔历史周”纪念活动；

促进亚裔美国人的平等就业机会，包括努力帮助他们提高社会升迁能力和技能；也包括对政府和各基金会组织有关少数民族工作的计划进行评议等。

第一章 美国华人史溯源

远在五世纪的中国史书上，就有着慧深和尚出海探险并发现了一个遥远王国的记载。这个王国被称作“扶桑”。据说，这是一个国泰民安的文明古国，国名取自当地的一种树木“扶桑树”——当地人用它的树皮织布、造纸。扶桑国有自己的文字，还有一种独特的风俗，即在婚配上是由妇女选择男偶。更令人惊异的是，在这个古国内既无战争骚无扰又苛捐杂税。

一部分历史学家认为，这个位于大汉国以东七千英里的扶桑国就在北美洲西海岸。如果这个说法可靠的话，那么这位佛教高僧和他的弟子们，便是在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将近一千年以前就曾经到过美洲的第一批中国人了。

然而，据西方史料记载，最早来到北美的中国人是几名船员、手艺人 和 佣人，而且都是十六世纪乘西班牙大帆船来到这里的。自一五六五年以来，每年都有商船来往于墨西哥和菲律宾之间。不少早在菲律宾定居多年的华侨客商，便随着商船从菲律宾来到墨西哥的下加利福尼亚和阿卡普尔科。

美 中 商 船 贸 易

十八世纪七十年代末，美国刚刚建国不久。为了促进国内经

济的发展，美国便仿效许多欧洲国家的做法，把注意力转向了中国的资源。美国商人对贩卖中国丝绸、瓷器、茶叶、漆器、家俱和其它各种商品表现出越来越浓厚的兴趣。

一七八四年，第一艘与中国通商的美商船“中国皇后号”载着铅锭、胡椒、羊毛衣物、皮货以及三十吨人参返回了美国。满载中国货物的商船驶返纽约港后，关心这次贸易的商人们发现，投资十二万美元的“中国皇后号”获利高达百分之二十五。这一来，许多美国商船都争先恐后纷纷跟中国通商，对华贸易很快便成了一桩有利可图的生意。自一七九四年至一八一二年间，美国商船往返中国达四百航次之多。

在广州停靠的欧美商船，返航时都雇佣中国船员。一七八五年，“巴拉斯号”商船从广州返回巴尔的摩港时，船员中就有三名是中国人。他们是亚成、亚全和亚官。在商人莱维·霍林斯沃思的资助下，他们留在马里兰州和费城住了将近一年。这三个人便成了已知的第一批在美国居住过的中国人了。

这些商船还把中国人带到了北美太平洋沿岸的各个港口。比如，一七八八年，几名中国木匠和铁匠就曾跟着英国船长约翰·米雷斯在温哥华岛的诺特卡·桑德定居了下来。

一七七八年，一位名叫詹姆斯·库克的船长“发现”了夏威夷群岛。从此，夏威夷便成了往返于中国和美洲太平洋沿岸地区之间商船的主要停泊点。一七八九年，西蒙·梅特卡夫船长驾驶“埃莉诺拉号”帆船从澳门开往美洲西北部太平洋沿岸时，中途就在夏威夷停靠过。当时船上共有十名美国船员和四十五名中国船员。后来，又发现夏威夷山区盛产檀香木，于是夏威夷群岛在商人们心目中变得更为重要。中国人很珍视这种树木，用它制成熏香、扇子和各种雕刻工艺品。不久，中国人便给夏威夷取名为

“檀香山”。一七九〇年到一八四〇年间，运往中国的檀香木达三千六百万磅之多。

据蒙特里市的档案记载，可能早在一七九三年就已经有中国人正式加入基督教会了。其中提到的第一个，是澳门的侯塞·奥古斯丁·迪洛斯·雷耶斯，估计这是一个起了外国名字的中国人。第二个提到的是金山的亚南（州长德索拉雇佣的厨师），他的名字出现在一八一五年的档案材料里。

早年的海上贸易往来，使中国与无数的西方港口建立了海上联系。虽然在整个十九世纪上半叶，中国人不断地以海员、手艺人、佣人、学生和商人的身份陆续来到美国，但是这个时期的移民人数相当有限，而且都属私人资助。据移民档案记载，一八二〇年至一八四九年间，移居美国的华人仅仅四十三名。

打开中国门户

在四千年的漫长岁月里，中国一直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国家，极少与外界交往。她称自己为“中国”——世界文明的中心。虽然十六世纪时曾经建立过几个通商口岸，允许外国人进入中国，但是中国政府对此限制极严。比如，只许外商与中国各商行（即中国商人同业公会）进行贸易往来，因为这些商行独享经纪人的权力。又规定一切贸易只能在广州城外滨海一带被称作“十三洋行”的地方进行。满清皇帝甚至坚持要一切外商和外国使节定期向其叩头施礼、俯首称臣。由于外商们深谙与中国通商定有暴利可图，因而也就缄口默认了这一套繁文缛节。

十九世纪中叶，一连串的事件导致了中国在鸦片战争中的惨败，迫使清王朝不得不放弃它闭关自守的政策。早在十七世纪，鸦片就开始输入中国；但到十九世纪时，英国索性利用输出鸦片

来补偿它在对华贸易中的逆差。为了捞回她在贸易中流入中国的白银，英国变本加厉地向中国输出鸦片毒品，并且规定中国只能用白银支付。结果，不仅鸦片贩子大发横财，而且最后发展到英国整个商业贸易的扩大竟完全依赖鸦片的出口了。尽管中国政府曾屡颁禁令制止贩卖与吸服鸦片烟，但鸦片贸易还是有增无减。一八〇〇年至一八二一年间，每年进口的鸦片烟为四千五百箱；而到了一八三八年，年进口量竟达四万箱之多。

为了杜绝鸦片毒品的泛滥，湖广总督林则徐于一八三九年被派往广州去禁烟。他把英国鸦片商扣押在“十三洋行”达六个星期之久，并将价值六百万美元的两万箱鸦片统统没收焚毁。

英国对此以战争进行报复，于是鸦片战争就此爆发。自一八三九到一八四二年间，中英海军在中国沿海展开了激战。仅靠木船和陈旧武器装备的中国海军与新式武器装备的英国海军相遇，几乎每战必败。最后，中国政府被迫在完全按照英方提出的条件所拟就的“南京条约”上签了字。该条约废除了旧的通商制度，开放了广州、上海、厦门、宁波和福州五个港口为通商口岸，并规定外国人在这些港口的居住和通商权利均受外国领事的保护。该条约还把香港割让给了英国。接着，美国和法国也趁火打劫，从清政府那里捞到了同样一份特权。于是，臭名昭著的“南京条约”便成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

鸦片战争的惨败和外交上的一系列失利，使自一六四四年就统治着中国的清政府的腐败与无能在西方国家面前暴露无遗。美国报纸把中国在鸦片战争中蒙受的屈辱与失败以及中国国内的混乱局面作了详尽而耸人听闻的报道。这一早期形成的关于中国的不利形象，在以后的许多年里一直影响着美国人对华人移民的看法。

“南京条约”除了扩大对华贸易之外，还允许更多的基督教传教士来华传教。于是欧美各国传教士纷纷在中国办起了教会和学校。此后多年里，不少中国人成了基督教徒，其中相当一部分人还移居到了美国，有的去读书，有的去做工，甚至还有有的到美国华人区当起了传教士。但是国内更多的人认为，西方传教士的来华瓦解了维系中国社会的孔孟之道。比如，他们感到传教士所提倡的妇女教育这一主张，必定会破坏中国历来由夫权思想所支配的婚姻关系。

清王朝的衰落

依照中国人的说法，自古以来王朝兴灭、乾坤更替，总是以天灾、饥荒，农民起义和朝政腐败为先兆的。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中国，正是处在这样一片危机之中。一八四六年和一八四八年，大旱与洪水毁掉了全部农田，庄稼颗粒无收；饿殍遍野，百姓怨声载道。满清朝廷不仅不救民于水火，反而趁机派兵强占灾民的土地。朝廷和被鱼肉的百姓之间日益尖锐的矛盾，终于迫使农民揭竿而起，暴动遍及全国各地。“洪门”、“天地会”等秘密会社组织，这时也重新活跃了起来。

声势最大的一次农民暴动是太平天国起义。起义军领袖洪秀全系广东客家人。他自感受命于天，便挺身而出，为实现“太平天国”举起了义旗。他把中国的传统伦理与他对基督教教义的理解相结合，提出了人人平等、给妇女以权利、土地改革和简化汉字等主张。他率领五十万义军，在长江流域一带与清兵辗转作战达十三年之久。战火所至，物毁土焚，破坏极大。一八五一到一八六四年间，有两千万国人丧命。太平天国起义和其他无数次的农民暴动，表明中国人民已陷入了走投无路的绝境；也显示了他们为彻

底改变社会现状和生活境遇而斗争的决心。

移民浪潮

在那兵荒马乱的年月，为了挣扎活命，许多村子的百姓都把家里身强力壮的男劳力送到了城市和码头，去觅寻生计。成千上万的人到了那里便去招工处登记，接着就被运往秘鲁、古巴、墨西哥、东南亚、加拿大、夏威夷和美国加利福尼亚等地去当苦力。

这预示着一股大规模的移民浪潮即将来临。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三次大的移民浪潮。第一次发生在公元七世纪，当时曾有小批华人乘船到了台湾和澎湖列岛，做些季节性农活度日。第二次是在葡萄牙殖民主义者于一五五七年把澳门变成通商港口之后，又有一批冒险者、移民和商人纷纷移居海外。在十九世纪中叶出现的第三次移民浪潮中，广东省有成千上万的人被生活所迫，冒着杀头的危险投奔海外谋生。早在一七一二年，清政府就颁布过移民禁令，并宣布违者死罪。

在这些移民中，一部分人是靠抵押农田、店铺或者靠向亲友借钱而自筹路费的。大多数人则是以所谓契约劳工而卖身出洋。这种契约劳工有两类。一类叫做“契约劳工制”，其剥削性质极为残酷。它的做法是，由那些在通商口岸替洋商办理招工的中国代理人，把订了契约合同的华工强行用船运往急需廉价劳动力的国家。许多不幸的契约工都是被这些所谓招工者们拐骗绑架而来，然后再被转卖出去做苦力。被运往南美洲和中美洲的契约华工所受的非人待遇苦不堪言，骇人听闻。华人把这种“契约劳工制”叫做“卖猪仔”。美国的商人们和商船，在贩卖中国苦力贸易中起了极其恶劣的作用，他们曾造成了无数华工的惨死。例如，一八五

五年美国的一艘“维弗利号”苦力船在由汕头驶往秘鲁卡廖港的途中，船上的四百五十名华工中竟有三百人被活活闷死在船舱里。其他苦力船上的华工曾被迫多次起来反抗。有些人甚至因绝望而途中愤然自杀。但是大部分苦力最后还是被运到了买主国家，被迫在矿井和种植园里卖命当牛马。

第二类契约劳工叫做“除单工”。这种契约制多用于去加利福尼亚州、东南亚各国和澳大利亚的移民中。根据这种合同，移民去海外的路费先由雇主或雇佣公司垫付，日后再从他们的工资中逐月扣除。这一切全是通过中方的中间人办理的。这种合同制虽然能给移民以人身自由，但是由于他们初到国外，人地两生，完全处于无依无靠的困境，因而总难逃脱雇主们的种种敲诈和欺凌。

下面是一则曾经在广州街头张贴散发的招工广告。它所描绘的那片美国乐土，曾为许多动身去美国的华工所深信不疑：

美国人都很富。他们希望并且欢迎中国人到那儿去。那里工资高、房子又宽敞。至于吃和穿，更是任你挑任你拣。你可以随时给亲友写信寄钱，我们保证信和钱都能安全邮到。那可是个好地方，没有官府，没有士兵，人人平等。现在那儿已经有许多中国人了，你不会感到陌生的。那里也有中国财神，还有招工局代办处。别害怕，你会走运的。请到香港来，或者到广州挂有“招工局”招牌的地方来，我们会告诉你怎么办手续。美国的钱多得很，随你花。想办理工资或劳动担保的人可来本招工局申请。我们负责担保。

加入淘金潮

一八四八年，约翰·萨特的磨坊附近金矿的发现，吸引了大批冒险者从世界各地涌向美国加利福尼亚。到一八五〇年时，在五万八千名前来冒险的淘金者中，已经有了五百名华工。两年之内，远涉重洋来到金矿的华工人数剧增到两万五千人。中国人把美国称作“金山”，就是这个时期开始的。

在早期的淘金潮中，曾经流传过这样一个故事。据说在一八四九年，有个叫张德明(音译)的华工凭着自己的精明与本事，在淘金中发了相当大一笔财。于是他给广州家里人写信，催促他的亲戚张仁(音译)也到美国来。一听说“金山”是个赚钱的好地方，张仁马上动身漂洋过海来到了美国。这样一传十、十传百，消息不胫而走，传遍了广州城，传遍了珠江三角洲：“金山”是个发财的好地方。

由于广州早年就与西方国家有通商往来，因此现在成了华工移居美国的主要集散地。在广州码头上，招工局的人还一再向移民们打保票，说一到了国外保管立即发洋财。但是大多数华工，出于传统的家庭观念和乡土感情，并不想在海外久留。广东省的一个青年就是个典型例子。他只想趁自己年轻力壮的时候在美国好好干上几年，然后告老还乡，回家安度晚年。

那时候还流传过这样一句话，“金山客，没一千，有八百！”意思是说，凡是去过加利福尼亚的人，就算积不下一千美元，至少也能赚上八百。在那多灾多难、民不聊生的年月里，传说中的“金山”给人们带来了一线朦胧的希望。

然而，踏上这艰难的淘金生涯的第一步，却是那漫长而难熬的海上旅程。数百个华工被塞进拥挤不堪的舱底，要在海上颠簸

两个多月才能到达目的地。许多人一路上晕船呕吐，根本就爬不起身来。不晕船的人也忍受不了舱内的污浊气味，恶心不止。在船上，各种人之间，比如客家人与本地人之间、旅客与船员之间，纠纷冲突不断，时常发生殴斗，死人的事接二连三。

来到加利福尼亚淘金的华工，几乎全部在旧金山上岸。华人称旧金山市为“大埠”。按人口排下来，旧金山是第一大城市，萨克拉门托次之，叫做“二埠”。第三个是马里斯维尔。其它几个华人较集中的城镇是奥本、普拉塞维尔、内华达城、科洛马、安吉尔斯镇、中国镇、库尔特维尔和霍尼特斯等。到美国来的华工，一般都先在这几个地方购好需用物品，然后沿着圣华金河和萨克拉门托河到达各个金矿区。

当年，华人淘金者的足迹，曾沿着矿脉踏遍了整个加利福尼亚州。继而越过加州州界进入了内华达、俄勒冈、不列颠哥伦比亚、爱达荷、蒙大拿、科罗拉多和南达科他等州。“金山”里这些“约翰支那人”⁽¹⁾的一举一动，加上他们背上拖着的齐腰长的辫子，身上穿的蓝裤蓝褂子，头上戴的宽边大草帽，以及脚上登的美式大皮靴，无一不是早期美国西部民谣中的笑料。

随着华工人数的不断增多，白人矿工对他们越来越敌视。华工们只能在白人采剩下的或者没人愿意去的矿场采矿，而这些地方的金矿往往绝大部分早已被白人挖光。华工还常常遭到其他矿工的毒打和抢劫，或被任意赶出矿场，因为这些人总把华工看作是一种经济上的威胁。结果，不少华工被迫离开矿井，开起了饭铺或洗衣房。有些人则开起了小杂货店，卖些矿工需用的物品，或者干些其它服务性的活儿。

(1) 这是当年对华工的蔑称。——译者

进入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加利福尼亚的表层金矿源已被采光。几家拥有大规模先进技术设备的公司开始垄断采矿业。大部分白人矿工不愿依附于大公司干活，便纷纷离开加州，到北部或西部去寻找新的矿源了。这样一来，公司只得雇佣华工。于是华工在加州矿区又继续干了好几年，直到白人矿工因外地矿源枯竭又陆续返回加州为止。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中期，金矿开采殆尽。许多华工便开始收起工篷进城找工作，有些人转向沿海一带或农业地区找些活儿干。还有的华人就此回到中国，再也没回来。不过绝大多数华工继续留在了美国，靠着省吃俭用攒下的钱定期回家探亲。回到美国后，再按时寄钱回家养活一家老小。他们自己在美国，宁愿跟别的“单身汉”们挤住在简陋不堪的住处，也要省出一大半挣来的血汗钱寄给家里的亲人。在这陌生的异国他乡，他们举目无亲、事事艰难，原先想迅速致富的梦想终成泡影。现在他们开始意识到，得在美国熬过无数个春秋才能再跟家人团圆。

下面这首民谣唱出了千千万万的移民与妻儿离别时剜心绞肚般的悲戚：

盼君离家早日还，
但愿别离仅瞬间；
祝君事事皆如意，
三年别后望君还。

求君万万心莫变，
妻儿老小挂心间；
月圆月亏传家书，

三年两载迎君还。

一八七五年，旧金山一位华人黄申(音译)与他的助手曾合编过一本《英汉对照词语手册》。其中包括许多与华工的劳动、自卫、娱乐及日常生活相关的有实用价值的句子。仅摘几句为例：

工人们罢工的原因是要增加工资。

他无缘无故地欺负人。

他抢占了我的矿井。

他若再不离开，我就得把他撵走。

他想敲我的竹杠。

他诬告我偷了他的手表。

你违犯了州法。

他是被一个强盗用绳子勒死的。

今夜我可以在这儿留宿吗？

有什么东西能给我吃一点吗？

给点草喂喂我的马行吗？

她是个没用的浪荡女人。

从香港到加利福尼亚的路费是五十美元。

人都能进天堂吗？

只有信基督教的人死后才能进天堂。

美国的移民很多了。

移民很快就要被禁止入境了。

铺设中央太平洋铁路

一八六四年，“华人六会馆”(一个华人互助组织)的主席接到

一份通知，要求华工参加铺设一条连接美国东西海岸的大铁路。当时美国联邦政府选中了两家铁路公司承揽这项铺轨工程，报酬一概按所铺铁轨的英里数而定。“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负责东段的铺轨工程，雇用的主要是爱尔兰铁路工人。“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负责西段的铺轨工程，该公司曾在地广人稀的西海岸地区招募过一支有相当人数的筑路队伍。这时由于美国内战正酣，劳动力奇缺，白人筑路工只能勉强凑足几百人。于是负责“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筑路工程的查尔斯·克罗克向他的主管人斯特罗布里奇建议，不妨雇用华工。但是斯特罗布里奇认为，华工的体力恐怕对付不了如此繁重的劳动。但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他们只好决定先招五十名华工来试试看。试工的结果证明华工完全能可靠而出色地胜任这项工作。于是接着他们又雇用了数百名华工。到这条连接东西海岸的大铁路竣工时，整个铺路队里已经有一万二千名华工了。

一八六五到一八六六年的严冬，华工们一直在内华达山区与严寒搏斗。暴风雪接连不断，地上积雪深达四十英尺。华工们只好在雪层底下挖坑道，一连几个月在不见天日的坑道里吃、住、干活儿。有时候碰上雪崩，引起可怕的坑道塌方，死伤不计其数。有几次塌方，随着一阵轰响，整个营地连人带工篷全部坠入深谷。

转眼到了一八六六年的夏天，华工们又冒着酷暑开始在合恩角的花岗岩绝壁上打眼放炮、开山凿路。他们使用的工具只有镐头、铁锹、炸药和马拉车。人被装在篮子里吊送下山崖，在悬崖绝壁上凿洞、埋炸药、点引信。华工丧生的惨剧不胜枚举——有的是因为在炸药点着之后，装人的篮子没及时拉上来而被活活炸死；有的是因为吊篮的绳子突然绷断而葬身山涧。英语里甚至为此而造出了一个新词，叫做“not a Chinaman's chance”，意为

“毫无希望”。

华工起早摸黑，累死累活，每周干六天，一天才挣一美元，一个月只能拿到二十六美元。后来才加到每月三十美元。白人跟华人的工资一样多，但是他们可以不付伙食费。华工们每十二人至二十人被编成一组，每组有一个厨工和一个管采购和发饷的工头。华工的伙食费一律从月薪中扣除。吃的饭菜多是大米、腌卷心菜、晒干了的牡蛎、乌贼及其它鱼干，还有蘑菇、猪肉、家禽、热茶等。

一八六七年六月，为了抗议苛刻的劳动条件和不合理的待遇，内华达山区两千名华人隧道工举行了一次大罢工。他们提出的条件是要把月薪增加到四十美元，要求跟白人一样每天工作八小时，要求惩处肆意鞭打、虐待工人的监工。这次罢工使公司头目大为震惊，但终因未得到其他工人的支持而告失败。只是工资略有增加，自那以后华工每月薪水增加到三十五美元。

离东西两段铁路接轨的日子越近，两家铁路公司竞争也越激烈。早在淘金时期，爱尔兰工人与华工之间就有过敌对情绪，现在双方更是势不两立了。“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自吹每天可以铺轨六英里，“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则声称每天可铺七英里。在“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加码到每天七英里半甚至至于八英里时，查尔斯·克罗克索性提出“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每天负责十英里——到最后一天只剩下十六英里铁轨时，华工竟然一天铺了十英里零一千八百英尺。虽然这时候华工要冒着沙漠酷暑施工，但毕竟是在平地上铺轨，因而进度比起在内华达山区开山凿隧道还是要快一些。

经过整整六年的苦战，这条连接美国东西海岸的大铁路终于于一八六九年在内华达州普罗蒙特里角接轨。然而，在庆祝胜利

的狂欢人群中，竟不见一个华工的影子，他们全被排斥在庆祝活动之外。甚至在正式庆典上，华工的血汗劳动也只是寥寥数语一带而过。

铁路竣工之后，为了找寻新的生计，华工们各奔东西，又开始了新的跋涉。他们有的继续东去；有的回到了铺铁路时经过的一些城镇；有的留下来继续筑路，把这条连接东西海岸的铁路向西北部延伸。不少人返回加利福尼亚州，在农村或城市里找到了工作。还有些人则就此回到了中国。

在回忆开拓“金山”这段辛酸的往事时，一位老华工曾这样凄楚地诉说当年“金山梦”的破灭：

“‘到美国去！

到美国去！

快到美国去！’

喊声激昂震天响，

美国曾是祖辈梦想中的天堂；

如今我来到了这‘金山’上，

天堂啊天堂，你究竟在何方？”

早年来美国的华工，开矿山、修铁路，历尽了世间的磨难；他们横遭敌视、远离家园，饱尝了骨肉离散的熬煎。在踏上美国这块土地的最初岁月里，他们是酸甜苦辣全尝遍。但是，美国华人的历史并不是一场悲剧，而是一部披荆斩棘、艰苦创业的历史，一部激励人心、催人奋进的历史。她象一株大树——也许是一株扶桑树吧——植根于这片土地，几经风雨摧残，如今却枝繁叶茂，开花结果了。

第二章 开拓者

一八六八年，中国取消了早年的海外移民禁令。由于当时中国农村连年兵荒马乱，使成千上万的广东百姓不断远渡重洋来到“金山”，加入了他们同乡的队伍。同年，中美两国签订了“蒲安臣条约”，规定两国之间在贸易、领事、移民等方面享有互惠待遇。这是以往两国间的任何条约所不曾涉及到的内容。其中第五和第六两条规定，双方公民均享有优惠移民待遇：

“大清国与大美国切念民人前往各国，或愿常住入籍，或随时来往，总听其自便，不得禁阻，为是现在两国人民互相来往，或游历，或贸易，或久居，得以自由，方有利益。”

“美国人民前往中国，或经历各处，或常行居住，中国总须按照相待最优之国所得经历、常住之利益，俾美国人一体均沾；中国人至美国，或经历各处，或常行居住，美国亦必按照相待最优之国所得经历与常住之利益，俾中国人一体均沾。唯美国人在中国者，不得因有此条，即时作为中国人民；中国人在美国者，亦不得因有此条，

即时作为美国人民。”⁽¹⁾

“蒲安臣条约”虽然立即遭到了美国劳工组织的反对，但是却引起了美国财政界的极大兴趣。因为根据条约精神，美国可以扩大对华贸易，并且可以大大利用中国的劳动力资源。由于看到了美国对华贸易迅速发展的前景，一名过去一向把中国人描写为“粗野、奸诈”的美国报纸编辑，也一反常态，称颂起中国人来：“当我们最优秀的波士顿祖先还在沼泽地和森林里垦荒时，……文明的中国早已人才济济、群星璀璨，拥有自己的诗人、哲学家、经济学家、伦理学家和政治家了。”

对于华人来说，“蒲安臣条约”可保证他们自由移居美国，同时也可保证他们在美国应享的法定权利。

然而条约签订后不久，便遭到了加利福尼亚州的坚决反对。于是美国政府又回到谈判桌上，增补了一条修正案。该修正案规定美国有权调整、限制或中止华人移民入境，但是“并不绝对禁止他们入境”。尽管如此，自“蒲安臣条约”签订之后到一八八二年“排华法案”出笼为止（这个排华法案显然是上述修正案的产物），平均每年都有一万二千名华工自由移居美国。

对于华人向加利福尼亚州移民这件事，不管在美国争议多么激烈，有一点是肯定无疑的：华工是开发美国西部经济的一支不可缺少的力量。他们为发展加州的农业，为把加州开发成全美国以至全世界最富饶的农业区奠定了基础。同时，许多华人还进了工厂，也促进了加州城市工业的迅猛发展。

(1) 这是“蒲安臣条约”原中文条文。见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261—262页。——译者

加利福尼亚州

到一八六〇年时，加州的表层金矿已开采完毕。许多来美国西部的开拓者和矿工原先都是美国东海岸和中西部的农民，现在都涌到了加州找寻生计。但是在他们四处找寻可耕土地时，却气恼地发现这时加州的大部分土地都已经被分光了。首先是个体土地投机商们，在加州刚成立的头十年里，把大片大片的土地都占为己有，加之美国政府又曾经答应铁路公司每铺一英里铁轨可得十平方英里土地，所以当铁路完工时，单单铁路公司就独占了两千多万英亩土地，占全加州原辖土地总面积的百分之十六。到一八七〇年时，仅占加州人口百分之五的人，竟垄断了全加州二分之一以上的可耕土地。

美国各州多以粮食生产为主。可是在加州，由于上述原因，粮食生产始终没能得到大规模发展。一八六〇年时，加州农场的平均面积为四百六十六英亩，而其它各州的农场平均面积仅为一百九十九英亩。加州开始也曾出口过小麦。但到了一八七〇年，由于干旱、经济不景气以及小麦出口量难以与俄国和密西西比平原竞争等原因，迫使加州不得不另寻出路。

农场主们这时纷纷开始考虑种植水果和发展酿酒业，因为这类产品的市场正在不断扩大。一八六九年横贯北美大铁路的竣工更为这一设想提供了两个重要条件：一是铁路运输速度快，能把各种农作物迅速运往全国各地；而水路交通只能运粮食，不宜运送易腐烂的产品。二是铁路完工之后，腾出了一万名华工，正好为开发加州农田及时提供了足够的劳动力。

发展农业、渔业

加州大部分有待开垦的土地都在中北部。当年从圣华金河一直延伸到萨克拉门托河三角洲一带，全是长满了灯心草的一片沼泽地。虽然这片土地的占有者早就看出将来这儿会变成一片沃土，但是这种想法直到六十年代末，在大批华工从金矿和铁路上遣散回到加州之后才变成了现实。由于华工们来自珠江三角洲，干过多年的农田活，因此对垦荒和灌溉都有丰富的经验。数千名华工被雇来整修这一片沼泽地——他们筑大堤、修水坝、挖沟渠。许多熟悉水利工程的华工还指挥修建起了一套灌溉网。只待把水抽干，即可播种作物。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里，华工们完成了围垦整个舍曼岛的巨大工程。他们环绕全岛筑起了近两米高的环岛大堤。一八七八年到一八八四年间，他们又在布尔丁岛和罗伯茨岛上筑坝、排水，变荒岛为农田。而这一切，靠的仅仅是铁锹、手推小车和华工们自己的一双手。为了把沼泽变成可耕的农田，他们常常得一连几天泡在齐腰深的水里干活儿。经过他们的一番开垦，整个加州的土地价格从原来每英亩一至三美元猛涨到每英亩二十至一百美元。再加上华工所铺设的铁路，更使加州土地所有者的资产剧增。

历史学家凯里·麦克威廉斯曾经写过这样一段话：“显然，……如若没有华工在加州的贡献，那么，从种植小麦到改种水果的这一转变肯定要推迟四分之一世纪。在这个转变中，华工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甚至可以说是唯一重要的因素。”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间，华工凭着自己的劳动与技能，在加州开辟了果园、葡萄园、农场以及蛇麻草种植园。在年轻的加州面临着工业破产的危机时，华工在农业上的开发及时帮

助它摆脱了经济困境。这位历史学家又写道：“实际上，是华工教会了他们的雇主如何播种、培育及收获水果和蔬菜的。华工在这方面的本领可以说是有目共睹，他们经验的积累也决非一日之功。而他们的雇主，却绝大部分都是门外汉。”加州水果的输出量逐年增加，从一八七一年的一百八十三万二千三百一十磅增加到一八八四年的一千一百九十九万六千磅。

华工很快便成了雇主们理想的劳动力。一来因为他们干活可靠；二来因为他们全是单身汉，膳宿好安排。而且华工又都肯干季节活——等这儿的农活忙完了，他们可以到旧金山或其它农业区去打一阵短工，等到下一个农忙季节一到，他们再回来干。这对双方都有好处。对于华工来说，除此之外没有更多其它的就业机会了；对于雇主来说，则为发展生产、增加财富提供了绝好的条件。

华工一般是由华人工头带班的。工头负责与雇主联系，管理帐目，发放工资（华工的生活费要从中扣除）等。为了给季节工们安排膳宿，农业区到处都搭起了帐篷。

从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华工们在太平洋沿岸农业区四处流动，做着各种季节性农活。他们常年累月在烈日下曝晒，弯腰曲背，什么活都得干。从种草莓、苹果、橄榄、蛇麻子、甜菜、桃子、梨子、樱桃，到收花生、棉花、小麦、卷心菜和南瓜，他们无所不能、无所不精。由于过去在家乡广东省就有着多年干农活的经验，因此他们的作物总是大面积丰收高产。即使在八十年代排华最猖獗时，华工的人数也还占加州农业工人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五到八十五。

华工不仅精通农活，而且创造了不少新的耕作方法及多种作物的杂交育种法。比如，加州的“炳氏樱桃”就是以“阿炳”的名字命名的。阿炳是七十年代时住在俄勒冈州米尔沃其的一个农业工

人。再如，一位名叫刘锦浓的华工，从八十年代开始，曾先后在马萨诸塞州和佛罗里达州用人工传授花粉的方法改良了多种果树品种，包括苹果、无核葡萄、桃子、西红柿、葡萄柚和山莓等，其中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一种橙子，更使他名闻遐迩。为此，他曾于一九一一年荣获美国农业部颁发的威尔特尔奖。

到二十世纪初叶，加州已到处可以看到来自日本、菲律宾和墨西哥的农业工人。华工虽然仍从事农业生产，但已不再是唯一的农业劳动力。二十世纪前十年里，华人新移民的就业范围仍十分有限，多半只能做农业工人。

华工一般都是租地耕种的。作为租耕农，他们得跟农田主签订合同，帮他们种植某几种作物。农田主们自己则往往对农活是一窍不通的。这种合同内容包括如何提供农机设备、如何运销作物、如何分配所得收益等。华工一般是在加利福尼亚三角洲一带租种土地，在萨克拉门托河两岸从弗里波特到爱尔顿一带租种果园。当时绝大部分租耕农是华人，其次是葡萄牙人和意大利人。他们各自根据合同，分别种植不同的作物。比如华工主要种水果、土豆和洋葱等。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时，华人的渔村已遍布太平洋沿岸。比较集中的一段是从蒙特里到托马斯湾一带。华工们在加州造了许多中式帆船出海捕鱼。捕来的鲍鱼、鲨鱼、鱿鱼、鲟鱼和比目鱼等，大部分是晒干后供华人居民食用。此外，华人还在旧金山海湾内的猎人岬和圣巴布罗海湾边上的佩得罗角发展过捕虾业。

如今，在加州仅存的一处华人渔村，叫“中国渔村”，那是早在一百年前在圣佩得罗角的北部营造起来的。这块地皮是华人渔民当时以每年三千美元的租价从理查德·布利斯手里租来的。后

来在排华激烈时，布利斯还曾经出面代替华人把捕来的鱼虾运往旧金山销售。华人捕的虾，一部分晒干之后还远销中国、日本和夏威夷等地。当年“中国渔村”最兴盛时期，每星期捕捞和加工的虾产量高达二十至三十吨。

从事工业劳动

加州商人早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办起的一些小型制造业，到六十年代时得到了迅猛发展。因为这时美国正处在内战时期，东部大量工业产品无法运往西部，这给了西部工业以发展机会。由于西部工厂都在准备扩大生产，因此华工得以进厂做工。过去华工曾使加州农业得到空前发展；现在他们同样又使加州的工业产量空前提高。可惜好景不长。内战一结束，形势大变。这时东部跟西部企业可以自由竞争，白人工会又拼命攻击华人，指责他们造成了美国经济的衰退，以至到了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白人工会终于用政治煽动等手段，把大批华人赶出了工厂。但是在这之前，华工对加州工业发展所作的巨大贡献是无可否认的。

早在一八五九年，雪茄工厂就开始雇佣华工。这是雇佣华工最早的制造行业。依靠华工的劳动，加州雪茄工业产值从一八六四年仅两千美元猛增到两年以后的一百万美元。到一八六八年时，加州雪茄生产已取代马萨诸塞州，在全国名列第四位。

一八七〇年时，旧金山雪茄工业中已有百分之九十的工人是华工。旧金山的李乔治在回忆他一家三代人从事雪茄生产的情况时这样说道：

“我祖父、祖母都在雪茄烟厂做过工。那还是一八五〇年前后的事。他们来到美国后就开了一个雪茄烟厂。”

那时候，大部分姓李的华人都在雪茄烟厂干活。工厂就在巴特雷街上。那是在旧金山大地震发生之前，厂里有八九十名工人，全是华人。

“地震之后，我们搬到别处。在里士满街上又办了个雪茄烟厂。他们在那儿又干了三四十年，也许是五十年，后来就不干了。现在已经没有手制的雪茄烟，全是机器生产了。所以你看，我祖父、父亲和兄弟几个全是在雪茄厂做工的。”

加州的制鞋商为了跟东海岸竞争，也雇佣了大批华工。到一八七三年时，全加州生产的靴鞋，有一半是华人制作的。由于华工劳动力源源不断，他们制作的靴鞋质量又好，使加州靴鞋业产值从一八七〇年的一百五十万美元增长到一八七五年的三百万美元。

在服装业上，东海岸的主要劳动力是欧洲来的移民妇女，而加州雇佣的则基本上全是华人男劳力。他们在那些拥挤不堪、榨取工人血汗的工厂里，为旧金山的服装市场制作出一批又一批衣裙、衬衫、工装和内衣，大大减少了加州对东海岸成品服装的需求量。在毛纺业上，早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末，华工就已经进毛纺厂工作了。六十至七十年代里，他们成了促进毛纺工业发展的主要劳动力。到一八七三年时，华工已占毛纺工人总数的百分之八十。

在所有这些工业部门里，资本家从华工身上榨取了巨额利润，恶劣的劳动条件和苛刻的工资待遇使劳资双方矛盾日益加剧。由于华工没有权利参加白人工会，于是他们就自己组织起来与资方斗争。比如，雪茄烟厂的工人们组织起自己的同业工会“同善会”，通过罢工和组织专门由华人参加的工会等手段，迫使资方给他们

增加了工资。

华人之所以有机会进入各制作行业，是因为加州的白人劳动力来源不足。城市里的白人一般都设法找收入较高的职业，而不肯进服装厂或其它制作行业。如在东部，只有白人妇女和儿童才肯进这些行业。到一八七〇年时，华人已经发展起自己的烟草工业、制鞋工业和毛纺工业等，这些都是加州工业中的主要行业。可是七十年代里，由于经济萧条，白人找不到职业，便又扬言是华工抢走了他们的饭碗，硬强迫工厂主把华工辞退。好在这时的华工已经熟悉了许多行业，所以很多人便象六十年代时一样，自己独立办起厂来。因此到七十年代中期时，制鞋工人都在华人自己开的厂里找到了工作。可是其它许多行业，由于雇佣的是白人，得增加工资，结果产品成本也提高，从而失去了与东部工业竞争的能力。又因东部的生产技术设备比西部发展得快，致使加州绝大部分小型制造工业到八十年代时，差不多全被挤垮了。

其它地区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间，随着新建铁路的铺设，华工的是迹遍及美国各个正在发展中的地区。数千名华工离开了加州，来到美国西北部太平洋沿岸地区及美国西南部和南部各地寻找工作，在铺完了连接东西海岸的大铁路之后，华工们又与新来的移民一起动工铺设北太平洋铁路和加拿大太平洋铁路，这两条铁路都于八十年代中期竣工。在修筑穿过华盛顿州、爱达荷州和蒙大拿州的北太平洋铁路时，曾雇佣了一万五千名华工，占整个西部铁路工人的三分之二。这段铁路完工后，他们又铺了其它几段，包括连接波特兰、普吉特海湾和西雅图的一段，以及从塔科马到华盛顿州东部的一段。此外，他们还铺了从西雅图到沃拉沃

拉一段铁路，把西雅图变成了西海岸的主要运煤港。

在西南部，华工们把南太平洋铁路继续向东铺至亚利桑那和新墨西哥州；向南铺至得克萨斯州的圣安东尼奥。在南部，从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期间，华工们铺设了从亚拉巴马到查塔努加一段铁路和从得克萨斯到太平洋一段铁路。此外还在佐治亚州内铺了一段铁路线。在这些铁路铺完之后，许多华工又返回了加州；但是也有一些人就留在了美国南部和西南部，填补了当地各行业的劳动力不足，并在这些地方陆续建立起小型的华人社区。

西北部太平洋沿岸地区

华人是**不准**在海上捕鲑鱼的。但是到了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他们却成了西北太平洋沿岸一带以及不列颠哥伦比亚和阿拉斯加一带鱼类罐头食品业的主要劳动力。华人在罐头厂里每天要工作十一个小时，负责罐头加工过程中从处理内脏、敲制听桶到烹调、检验、包装等全部工序。老板很难找到象华人一样肯干而又能干的劳动力。华工们之所以肯干，大抵是因为他们在这一带难以找到其它的工作，工资很低，一天只有一美元。华人一直在罐头食品业干到本世纪三十年代。不过在此期间，大部分华人逐渐被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来到美国的日本移民和菲律宾移民所取代。一位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曾看到过华工在罐头厂劳动情景的人，生动描绘了华人的工作效率：

“鲑鱼一进厂、先卸在一张长台子上。接着，几刀就把头、尾、鳍剥掉，内脏挖净。一名熟练工人这样处理完一条大鱼，连半分钟都用不了……”

十九世纪七十至八十年代，曾经有数百名华工在香港签好合同后，来到俄勒冈州参加各项开发工程。他们筑铁路，垦荒原，在

沼泽地上开沟修渠，在俄勒冈州开辟交通干线，使该州的经济急起直追，赶上了西海岸的其它地区。

与此同时，华工们也是各地劳动现场上一支必不可少的后勤服务力量。在西北太平洋沿岸以及全国各地的矿区和小城镇里，他们帮着烧饭、洗衣服，也开杂货店。有些华人，或独自一人，或数人结伴，经常离开华人集中的地方，到白人工作的地区去做些小生意。比如有一个被人们叫做“支那乔”的华人，淘金时期来到旧金山。后来一路打工朝北走，最后在阿拉斯加东南部定居了下来，在伦吉尔堡开了一片杂货店和一家饭馆。后来他又买下了一条废弃了的轮船，把它拖上岸来改装成一个旅馆，供探矿者或矿井看守人在冬天采矿淡季时租住。谁来他都欢迎，也不管是否付得起钱，他都收留。而且到来年开春时，他还会帮他们备足口粮送他们上路，并祝他们佳运亨通，万事如意，让他们高高兴兴地开始新的一年采矿生活。只在分手时说上一声，待他们日后赚了钱再回来还账也不迟。

西 南 部

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华人发现美国西南部地区开发前景可观，于是便在亚利桑那州办起了农场。尤其在银湖地区，他们或租种土地，或出租土地。有时候为了获得土地所有权以便把农田整治得更肥沃，他们也会定居下来。华人兴办的农场遍布各处。沿圣克鲁斯河，经过奥利克一直延伸到雷利克一带，全布满了农场。此外在费尔班克斯、圣佩德罗河谷、贝塔戈尼亚地区以及亚利桑那州其它一些地方，也都有华人的农场。但是到了九十年代，由于银湖水枯竭，造成农田水利灌溉困难，结果大部分华人离开了农场，进城做起了各种杂货生意。

当时有一个名叫盖约翰的华人，是一九一八年从加州奥克兰来到亚利桑那州的。刚来时靠给矿井拉炸药、开小客店和为矿区供应木料等物品谋生。后来因矿井关闭了，他才决定办农场。在回忆当时的情景时他曾这样说：

“我对开餐馆和洗衣店从来不感兴趣。我从小在杂货店里长大，可是也并不喜欢这一行。因为你一个礼拜要工作七天，一年到头没个休息日。办农场呢，要是农场小，就得自己干活；要是办得大，就可以大规模生产了。以前因为没干过这一行，所以看到有人办农场，就爱东打听西打听。我有个好朋友，是个白人，我也向他打听。有一天他对我说：‘约翰，你怎么不去开一块地呢？这儿土地到处都是，可以去开一块嘛。’我问：‘能赚钱吗？’他说：‘哦，我赚的还真不少呢。’我又问：‘你租那块地得花多少钱？’他告诉我：‘每年付两万到两万五千美元，总得在两万以上。’

“这次谈话引起了我的兴趣。不过，天哪，两万美元在那时候可是一大笔钱。于是我去跟哥哥阿炳商量：‘咱们办个农场吧，将来会大有前途，别去开杂货店了。办起农场来，可以雇个领班的人。’就这样，我们一块儿办起了农场。”

南 部

美国在通过了宪法修正案第十三条后，南方的奴隶制被废除了。由于种植园主们失去了黑奴，因此便开始考虑雇佣华工来解决劳动力问题。一八六九年六月，阿肯色河谷移民公司办起了一

项专为当地种植园招募华工的业务，打算从中国招募一千名劳工来补充劳动力。阿肯色州的这个做法，引起了南方其它各州的兴趣，它们也开始纷纷议论起雇佣华工的好处。当时孟菲斯的一份报纸《阿尔塔》在一篇题为《中国佬在南方》的文章里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阿肯色州现在已经行动了起来，难道田纳西州、密西西比州和亚拉巴马州能自甘落后吗？”

究竟要不要用华工代替黑人来维护南方根深蒂固的庄园制度，这是一个关系重大的问题。经过充分酝酿之后，一八六九年七月，在孟菲斯召开了一次会议，专门讨论这个问题。支持这一做法的人认为，引进华工可以刺激那些解放了的黑人，促使他们把生产效率提高并恢复到原有的水平。参加这次会议的代表来自田纳西、密西西比、路易斯安那、亚拉巴马、佐治亚、南卡罗来那、肯塔基、密苏里和加利福尼亚等州。与会代表们最后一致投票决定筹款一百万美元，实施向美国南方引进华工的计划。但是在孟菲斯会议召开的同时，另外一股政治力量也正在酝酿形成，即美国南部和西部的民主党在引进华工问题上持反对立场。他们反对的理由是，引进华工将会导致“野蛮的中国佬”闯入南方。结果，尽管孟菲斯会议一直希望能引进大批华工，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这个想法始终没能实现。

不过七十年代开始，一部分华工还是来到了美国南方。只是他们人数并不象预期的那么多，来的目的也并非专门为了解决种植园劳动力问题。他们大多数参加了铁路修建工程。铁路修完之后，又辗转在南方各地另谋生计。许多人在密西西比州当了农业工人或租耕农。这些华人的命运跟南方的黑人一样，备受歧视。之后，他们又陆续离开了种植园而经营起食品杂货店，在南方各地的黑人聚居区开店做些小生意。在佐治亚州，华工一般被雇佣

来管理稻田。阿肯色州从中国招来的数百名华工都进了棉花种植园。不过许多人一旦有了别的工作机会，便纷纷离开了种植园。路易斯安那州早在一八六六年就有从古巴来的华工在甘蔗园里做工，后来还从菲律宾来了一些华工。但是后来他们在设法积攒了些钱之后，全都离开了甘蔗园，当了渔民和菜农。

这个时期里，华人在南方各州颠沛流离，哪儿有工作就到哪儿去干。也有些人在美国其它地方流落或工作，过一段时间之后，也来到南方定居了下来。

随着内战后的建设时期接近尾声，南方对华工劳动力的需求也逐渐减少。资本家们看到黑人陆续回到了南方，便不再把华工当成南方必需的劳动力了。因此，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以后仍然留在美国南方的那些华工，绝大部分都分散到“阳光地带”的各州，办起了食品杂货店或开起了餐馆。

夏威夷

在十九世纪中叶夏威夷的经济发展中，华工是一支极为重要的力量。早在一七七八年库克船长刚到夏威夷群岛时，那儿就已经是遍地甘蔗丛生了。十九世纪初，早期华工曾经打算在拉奈、毛依和考爱等岛办甘蔗加工厂，可是一直到一八五〇年，才由欧洲白人种植园主创建起皇家夏威夷农业协会，并正式开始甘蔗加工业生产。要发展甘蔗生产，得需要成千上万的劳动力。可是，由于当时从外国传进来的种种疾病，也由于西方国家的控制给当地人所带来的精神压抑，造成了夏威夷土著的大量死亡，使人口从一七七八年的三十万人下降到一八三六年的十万零七千人。到一八五〇年时，只剩八万四千一百六十五人了。而剩下来的这些夏威夷人，又都不愿意在白人控制的甘蔗园里卖命。

一八五二年时，第一批为数一百九十五人的华工从香港被运到了夏威夷。在种植园主们发现他们能胜任这项劳动后，便要求再继续招华工。从一八五二年到一九〇九年间，夏威夷共招募了二十一万九千八百二十五名劳工，其中单单华工就占了四万五千名。最初来的全都是合同工，规定他们得在甘蔗园里当五年苦力，报酬是每月三美元，外贴路费和吃住费用。他们住在种植园的营房内，极受限制，很不自由，合同条款也十分苛刻，而且还常遭工头虐待。因此许多人五年合同期一满便立即设法离开甘蔗园到别处去谋生。然而，正是华工们最初那五年的血汗，浇灌了夏威夷的甘蔗园，发展了甘蔗生产，并使它成为夏威夷经济迅猛发展的支柱。此外，华工在发展夏威夷的咖啡和菠萝生产中，也曾经作出过重要贡献。

这些早期华工，有的后来回国了，但也有些人留了下来，用自己积攒的钱在檀香山唐人街上做起了小买卖。还有的人自己办起了农业，种土豆、玉米、小麦、卷心菜、洋葱、芋头、水稻、香蕉和其它各种蔬菜。也有靠养猪和饲养鸡鸭为生的。夏威夷的水稻生产，靠的几乎全是华工——挖水渠、开垦沼泽地，把原先只能种芋头的小块土地整治成可以种水稻的大片耕地等等。他们既是稻田主，又是种稻人，产量能满足当地和加州粮食市场的需要。尤其在內战期间，南方对农产品的供应量减少，加州对夏威夷水稻的需求量也更高了。一八九〇年，夏威夷的水稻出口量达到最高记录，超过了一千万磅。

此外，华人还在夏威夷种植了多种中国的水果、蔬菜和花木，包括荔枝、龙眼、梨子、金橘、枇杷、柿子、橘子、柚子、香蕉、苹果、竹子、豆芽、大白菜、藕、豌豆和黄豆等等。

由于华工离开种植园后都办起了农场或做起了生意，引起了

他们与别人在经济上的竞争。尤其到二十世纪初时，不少华工从苦力一跃而成了企业家，更使白人和夏威夷土著感到他们的经济和政治利益受到了威胁，于是便设法对华人施加种种限制，企图控制华人势力。

总的来说，在这一短暂的自由移民时期，华工对美国西部经济的发展曾经起过举足轻重的作用。他们从事的都是别人不肯干或者不会干的各种劳动。可是后来在工人与雇主间的矛盾冲突中，华工却成了替罪羊。经济上的许多症结明明是由于市场价格的波动和工商巨头的贪得无厌、追逐暴利所引起的，这时却统统归咎于华工。另外，来自法律条文与社会的种种压力，迫使华工只能从事有限的几种劳动——小型制造业、建筑业和农业等。然而，就是在这些有限的劳动领域内，华工们仍坚持不懈地为开创和发展美国的经济、美国的工、农业，付出了巨大的劳动。他们为造福全体美国人民，为日后一代又一代美国人的富裕与安乐，作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

第三章 排华运动

美国国内的排华情绪由来已久，可以上溯到第一批华工来到美国之前的数十年。在古代马可·波罗的传说里，中国曾被描绘为一片梅花飘香、盛产丝绸和圣贤辈出的天国圣土。然而到了十八世纪八十年代，这一美好的形象却在美国被另一个截然相反的形象所取代。其原因要追溯到早年的中美商船贸易时期。当初美国有许多公司曾经在对华贸易中获利匪浅。初试得手，他们便想在中国捞到更多的好处。可是当时中国方面对洋商的限制十分严格，对商船停泊地点、贸易通商对象以及商品经营范围等都有种种限定。美国的商船主们为了平衡贸易盈亏，便千方百计在国内搜寻中国愿意买进的各种商品，如水獭皮、檀香木，以及小荒岛上可找到的供食用的蜗牛等。但是，由于中国方面上述各种限制，使他们想进一步谋取高额利润的梦想未能遂愿，因而不满情绪日益增长。于是商人们便对中国当时的某些腐败与落后现象大事夸张，肆意渲染。

有些商人借讽刺中国的食物、衣着和风俗习惯，来发泄他们的不满，如说什么“美国人第一眼看到中国人，就止不住要嘲笑他。他们的衣着在我们看来十分可笑，而那种貌似庄重的紧身马褂看上去则更加滑稽；裤子纯粹是两条米袋……鞋尖朝上翘着，活像

两只木船；帽子也古里古怪，头发又是全部剃光，只在头顶上拖下来一根狗尾巴似的长辫子。”这种把中国人跟动物相提并论的做法，无非是故意把华人贬低为低人一等的劣等民族。

甚至像拉尔夫·沃尔多·埃默森那样还算受人尊重的一些作家，也舞文弄墨，信口雌黄，极尽贬低华人形象之能事：

“我们越琢磨，越感到这个愚蠢的民族令人厌恶。要是给中国王朝赠之以‘木乃伊’这个雅号，那倒是再恰当不过了。你瞧，三、四千年来，它始终原封不动地保持着它那副世界上最丑陋可憎的尊容。我实在看不出，像这样一个衰老、呆板而古怪的民族有什么存在的意义。它充其量不过是供他人使役的工具而已。就连可怜的非洲，也还能说一句：我砍树汲水，可以滋润其他民族的文明。可是中国呢？纯粹索然无味，古老愚昧！真是令人作呕！有朝一日在世界各民族聚会的时候，她能说的唯一的一句话，恐怕只能是——‘我会泡茶’。”

在华的西方外交官对中国所作的报道，也影响着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在一些公开发表的备忘录里，不少外交官员对中国的文明表示怀疑，列举了溺婴、行凶和虐待妇女等事例。他们认为中国的科学和医学完全处于停滞状态；统治者暴虐无道；军队也极端落后。但是，也有一些外交官员对中国是称颂的，认为中国跟西方国家有着同样的文明。不过持这种观点的人为数较少。

一八〇七年，基督教传教士开始来中国传教。最早的一个牧师名叫罗伯特·莫利斯。在以后的几十年内，他们出版过大量报道中国的书籍和刊物。在中国期间，由于他们关心的是如何拯救

灵魂，因此与美国商人和政府官员比起来，他们同中国人接触得更多一些。他们学会了说中国话，办起了教会学校和医院。尽管他们在中国做过一些积极努力，但是他们对中国的报道和评论，还是在美国公众中起了贬低中国人的作用。他们曾这样写道：“千百万中国人一听到耶稣基督的名字，即便是不憎恨，也大都表示反感”。他们还把中国人称作是有待摆脱异教和愚昧的“黑暗中的孩子”。

到一八二〇年时，对中国直言不讳的攻击，已开始见诸于美国学校的教科书。热衷于嘲讽中国的作家有好几个。其中最卖力的一个要算是笔名为彼得·帕利的塞缪尔·古德里奇了。他曾经为各种年龄的读者编写过许多地名词典和写过多种中国历史书。因为他用第一人称现在式叙述的，所以很容易吸引读者。一八三三年他笔下所描绘的中国形象，后来一直贯穿在他作品的始终：“众所周知，世界上极少民族像中国人一样如此缺乏自尊，如此麻木不仁，如此充满奸诈与虚伪。他们貌似端庄，却毫无智慧；他们礼仪繁多，却鲜有教养。”

美国报纸也不遗余力地在公众中大造舆论，贬低中国的形象。比如，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创办的一家末流小报社，在四十年代时为了跟资格较老的华尔街报界竞争，竟不惜倾全力把版面对准当时社会上最热门的话题——中国。为了压倒华尔街报界，它经常不择手段地抢先刊登各种耸人听闻的报道，招徕了越来越多的读者，致使华尔街报界大为恼火。这家小报连篇累牍竭力向读者推销的，不外乎是关于中国在一八三九至一八四二年间鸦片战争中惨败的报道。连当时的亲华刊物《尼罗河民族事务报》也这样写道：“从中国和入侵者的多次较量来看，前者的无能是越来越显而易见了。”

一八六八年“蒲安臣条约”签订之后，美国报纸对中国的反面报道一度有所收敛，因为这个条约为美国扩大贸易市场打开了方便之门。但仅在一年之后，“蒲安臣条约”中所提及的“新中国”与美国新闻界之间的“蜜月阶段”便告结束。当时关于一八六九年天津大屠杀事件（华人与洋人均有死伤）的报道又充斥了美国各地报刊的头版。这次事件本来只是中国人与洋人之间由于互不信任而引起的若干冲突中的一例，可是美国报刊社论却一味地泼骂中国是什么“异教徒、杏核眼野蛮人”等，并且重又弹起了中国人是所谓野蛮而难以驾驭的“黄祸”的老调。

从以上事例可以看出，早在华人移民于十九世纪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间来到加利福尼亚淘金之前，他们的祖国在美国人心目中的反面形象已经形成。虽然当时的报纸上也可见到某些零星的有利于中国的报道，但是大部分来自商人、外交官的报道，都在设法证明中国根本不配“文明国家”这一称号。在这之后的许多有关中西方冲突的报道中所一再重复的，仍然不外乎是中国在政治与军事上如何低劣无能之类的陈词滥调。

矿区里的迫害

几乎从来到加利福尼亚的第一天起，华人就备受歧视与欺侮。这里有经济方面的、也有种族方面的原因。虽然开金矿的人中有许多是外国人，但是由于肤色等外表特征，华人一眼看上去就跟别的外国人不同。随着对被传得神乎其神的金矿的争夺日益激烈，华人的地位也被压到了最低层。每逢他们找到一处富金矿，总是立即被白人矿工撵走。因为当时矿区里流行的一句话是：“加利福尼亚是属于美国人的！”

淘金人数的增多和矿源的枯竭，使华人的处境越来越坏。一

八五二年，加州立法机关又重申了《外国矿工征税条例》。这一条例本来是针对墨西哥人制订的，而现在则把目标对准了华工。原来每月征税三美元，一八五三年时增至四美元，一八五五年又增至六美元。翌年，又恢复到了四美元。从一八五〇年到一八七〇年，加州财政收入的一半全来自金矿的税收。

除了对付合法的收税人之外，华人还得经常对付一些骗子。这些骗子往往手持空白矿工执照和假收据，在矿区到处乱窜，敲诈勒索。为了免遭袭击和暗算，所有的华人不管自己是否是矿工，都只好购买矿工执照。日子一长，华工们也学会了躲避这些“收税人”。只要看到他们一来，华工马上派人去通知附近的矿区，于是那儿的矿工立即拆掉工篷，撤到山脚下去避几天风头。由于华人向来无权在法庭上控告白人，因此欺侮华人的行径也就越来越肆无忌惮。

尽管华人屡遭迫害，但他们还是留在矿区里，哪怕只有一丝找到矿砂的希望，也拼命继续挖。凭着这种坚韧不拔的精神，华工们常常在别人挖过而废弃了的贫矿区再找到金矿。他们的这种本领引起了白人矿工的忌恨，于是便处心积虑地设法把华人赶走，以除去他们的竞争对手。一八五二年，他们在图奥卢米县哥伦比亚矿区召开了一次群众集会。会上，凡是参与过把华工运到加州来的商人、资助人和轮船主，均遭到袭击和殴打。白人矿工还作出了决定，剥夺一切来自亚洲和南太平洋诸岛的移民在加州开矿的权利。并进一步把他们所采取的一系列行动通知了其它矿区的白人。

很快，在一个接一个的矿区里便连续发生了多起类似事件。他们动辄通过决议谴责华工，并强令他们离开矿区。下面这份于一八五六年在马利蓬萨贴出的布告，充分暴露了当年白人迫害华

工所惯用的伎俩，

“勒令厄瓜弗利河及其支流一带一切华人，务必自即日起于十天之内全部撤离矿区。违者处以三十九下鞭笞，并将被武力驱出矿区。特此通告。”

在各地的城镇集会、矿工集会以及立法会议上，种族主义者们把华工丑化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在一份矿区采矿委员会所发表的关于矿区少数民族问题的报告中，曾经写过这样一段话：

“结论：华人是美国社会与道德的一大祸害——他们是社会颜面上的疥癣，是国家肌体上的脓疮——一句话，令人厌恶。”

华工经常被勒令离开矿区，有时甚至被用暴力押送出矿区。自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末开始，所谓“治安维持会”的歹徒时常出没矿区，挑动骚乱，无恶不作。最后政府不得不派人协助地方上的行政司法人员，制止他们的绑架和各种非法暴力行径。

“华人滚回去！”

不仅在金矿矿区如此，其它地方的排华情绪也在迅速蔓延滋长。美国在十九世纪末期所面临的经济与社会困境，更进一步助长了这种排华情绪。煽动排华者抱怨得最厉害，叫嚷得最凶的一条，是华人以廉价劳动抢走了白人的饭碗，给白人造成了经济上的威胁。此外，当时美国内战刚结束不久，正处在恢复时期，奴隶制的问题还是一个相当敏感的问题。一些排华代言人把矿区和

铁路上的华工比作南方的黑奴。一八八〇年，波特兰的《俄勒冈人日报》上这样写道：“不错，中国佬的确不是奴隶。但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起着奴隶的作用。对于社会发展来说，使用华工跟使用南方的奴隶并没有多大差别。奴隶制也好，雇佣华工也好，其趋势都必将是挤掉白人劳动力，必然会把权力，财富和政治势力集中到使用这些廉价劳动力的少数人手里，从而最终削弱我们的民主精神。”

随着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淘金潮的衰落和一八六九年中央太平洋铁路的竣工，成百上千的白人失业劳工涌向了美国西部各城镇。艰难的岁月开始了。接踵而来的是股票暴跌、干旱成灾、农业减产。一八七三和一八七六年又相继出现了两次经济大萧条。结果，在企业被垄断、工人遭剥削的情况下，维护白种工人权利的劳动工会误把华工当成了他们的攻击目标。在随之而来的七和八十年代的排华运动中，华人成了白种工人发泄怒火的替罪羊，而美国工商企业巨头的利益却丝毫未受触及。

一八七〇年八月，加州召开了一次排华集会，纠集了各方排华力量，不仅在加州煽起一场劳工运动，而且得到了东海岸一些劳工组织的支持。与会代表们通过了一项决议，一致要求废除“蒲安臣条约”，并且要求停止华人移民入境。为了维持这一排华势头，旧金山的劳动工会又组织了一系列的群众集会鼓动排华。与此同时，由于共和党与民主党在加州的政治较量中势均力敌，因此双方都设法捞取劳工方面的这张关键性选票。为了换取劳工的支持，两党的政客们不惜采取一致的排华立场，并炮制出多项地方与州一级的排华条例。这些条例无一不是针对华人的生活习俗而定的，

——人行道条例(一八七〇年)，禁止挑担者在人行道上通行。

——立方空间条例(一八七〇年)：要求住房中每人所占的起居空间不得少于五百立方英尺。(为了抗议这一条例，华人干脆拒交罚款，宁愿触犯条例进监狱。结果牢房人满为患，造成了政府违背自己制定的法律条例的局面。)

——辫子条例(一八七三年)：凡是入狱华人，一律剪掉辫子，留发不得超过一英寸长。(而当时在中国，规定男人一律留辫子，以示他们对满清政府统治的恭顺。凡是剪掉辫子的人一律不得回国，违者死罪。)

——洗衣业条例(一八七三年与一八七六年)：凡是拥有一辆马车的洗衣店，每季度交款二美元；有两辆马车的，交款四美元，没有马车的，交款十五美元。而大多数华人洗衣店都属于第三类。

当时白种工人对华工的敌对情绪已很普遍，因此煽动排华的人往往不费吹灰之力就可轻易纠集起一支排华游行队伍。一八七七年，在旧金山曾经举行过一次支持东海岸铁路工人罢工的游行。结果一小撮排华狂人趁机把游行队伍拉到了唐人街，在那儿横冲直撞，见人就打，见物就砸，无恶不作。

在整个加州，任何微不足道的小事都会酿成暴乱，造成华人财产被毁，甚至发生人命案。一八七一年在洛杉矶发生的一场暴乱，起先是由两个有世仇的华人组织相互殴斗引起的。骚乱中，两名警官受伤，一个平民死亡。消息一传开，立即引起了一场大骚乱。气势汹汹的人群冲进华人住宅区，在短短四个小时内，杀死了十八名华人，洗劫并烧毁了多幢房子。事后，华人六会馆与中国政府就这一事件向首都华盛顿提出抗议。结果美国政府仅答应向死难者家属赔偿损失。而那些被逮捕的暴乱分子，却只经过短时间的监禁，便很快获释而逍遥法外了。

有个名叫丹尼斯·卡尼的爱尔兰水手，曾买过大笔矿山股票，后因股票市场倒闭而破了产。为了宣泄满腹怨恨和进行报复，他便在街头发表演说，大肆抨击土地和铁路垄断的邪恶和华人的“罪孽”。后来借助于《旧金山纪事报》的一阵鼓噪，他竟一跃成了白种工人的英雄和斗士。他那篇申明自己观点的“宣言”，实际上是一通言辞激烈、充满种族主义煽动性的演说：

“我们向你们，也向全世界宣告，中国佬必须离开我们的领土。我们宣告，只要中国佬在这儿待一天，我们白种人——不管男女老少——就无法享受到作为我们这个伟大共和国的公民所应当享受的那种生活权利，因为我们没有能力在劳动力市场上跟那些单身汉华人苦力们竞争。”

一八七七年，卡尼又组织了一个加利福尼亚工人党，并且把华人的问题扩大到了全国范围。这个党到处策划排华游行和集会，并煽动立法机关对华人采取行动。卡尼曾因多次挑起骚乱而锒铛入狱，但是在他出狱后，却变本加厉地排华，而且那些白种工人也对他追随得更紧，并伙同他一起狂叫“华人必须滚回去！”虽然加利福尼亚工人党只存在了五年便寿终正寝，但是它掀起的排华恶浪却引起了加州和联邦政府对华人问题的调查，并最终导致了终止华人移民入境这一提案的出笼。

暴乱遍及全国

虽然加州各地劳动工会的排华叫嚣不可一世，但却并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大部分由州一级或地方一级所通过的限制华人入

境或限制就业的法令，都一一被取消了。因为有些法令违背宪法精神，有些则无法强制推行。排华分子开始意识到，要想赶走华人，非由美国国会出面制定法律不可。于是他们便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煽动和呼吁，到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末，排华运动已蔓延到有华人居住的其它各州和各地区。

比如在俄勒冈州，虽然华人筑起了铁路，建立了邮递网，开辟了轮船航线，建起了城镇，但是他们终究没有逃脱种族主义者的魔爪，最后还是成了歧视性法律与种族主义暴行的牺牲品。最大的一次暴乱是一八七七年的“蛇河惨案”。在瓦洛沃县的蛇河上，十名淘金的华工遭到七个白人的袭击与杀害。暴徒们抢走了华人价值五千至一万美元的金矿砂逃离现场。后来虽然捉住了三个歹徒，但竟然被判无罪释放。

一八八〇年十月，丹佛市又发生了一场暴乱。一伙暴徒将华人全部赶出了唐人街，放火烧了他们的住房，甚至当场吊死一名华人。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那天早上，在一家赌场附近，两个白人向两名华人无端寻衅，结果打了起来，引来三千多市民聚在现场围观。城里八名值勤警察、一百二十五名特别警察和消防队一起出动镇压。当该市市长发现仍无法驱散人群、平息暴乱时，就命消防队把水龙头对准人群喷射，被激怒的人群用砖头猛烈还击。这时华人已四处逃散，不少人逃往郊野避难。在这次暴乱中，有些华人得到了富有同情心和有胆识的美国居民的保护。比如有这样一个例子：一个名叫吉姆·穆恩的赌客，当时站在他的一位华人朋友和一群暴徒中间，厉声喝道：“你们这帮人到底想干什么？”没人作声。他继续厉声喝道：“这位华人从不惹事生非。看你们谁敢碰他一下！”为了表示说到做到，他边说“边将一支左轮手枪默默地瞄准了暴徒的脑袋。结果，在枪口的震慑下，那伙暴

徒——正像美国一句俗话所说的那样——生怕‘自讨苦吃’，便灰溜溜地散去了。”这是一位《泰晤时报》记者所描绘的当时的情景。他是这场事件的目击者。

在城里另一个地方，四名华人被当地妓院的一个鸨母莉兹·普雷斯顿从暴徒们手里救了出来。在场的一名消防队员威廉·罗伯特事后讲道，“十来名不含糊的女子”一起替莉兹助威，把香槟酒瓶、火钳还有高跟鞋等等拼命朝暴徒身上砸去。

事实上，在丹佛市唐人街这场暴乱发生之前的一个月里，《落基山新闻报》已经在为排华制造舆论、推波助澜了。十月八日，这家报纸用大量篇幅刊登了一则白人青年吸鸦片过度的报道。文章叫嚣，一定要把华人赶出城去，否则他们不仅对白人妇女是一种威胁，而且还会腐蚀白人青年，因为不少青年已经成了鸦片烟和“华人妓女”的牺牲品。与此同时，民主党还多次煽动游行示威，到处叫喊“打倒华人！”“华人夺走了我们妻儿的面包！”等口号。

到一八八一年时，华工已把南太平洋铁路铺到了得克萨斯州的埃尔帕索。接着，有两千六百名华工又继续把铁轨从埃尔帕索往东铺到佩科斯河，在那儿与由爱尔兰铁路工自东往西铺的铁路接轨。华人铁路工不仅要受铁路公司老板的残酷剥削，而且还遭其他铁路工的极度敌视，包括墨西哥人、阿巴契印第安人以及白人等。华工遭袭击和谋杀的事件，接连不断。在审理一起爱尔兰工人谋杀华工的案子时，审判官罗伊·比安竟然公开宣称，在得克萨斯州从来没制定过不许“杀害中国佬”的法律。

凡是华人比较集中的地方，排华情绪都十分嚣张。夏威夷的《檀香山广告报》还发表排华社论，指责华人在加利福尼亚、东南亚和澳大利亚等地所惹出的各种麻烦问题，胡说在夏威夷出现排华问题的三个主要原因是：华人难以同化；华人的人口有超过夏威

夷土著人口的危险；华人会败坏夏威夷群岛的道德风尚。

虽然，引起大批夏威夷土著人死亡的多种疾病都是由西方人带入这个群岛的，但是现在罪名却加到了华人头上。比如，他们诬陷华人带去了麻风病，把这种病叫做“麻病”、“中国佬病”。为此，卡拉卡沃皇帝于一八七八年还专门签署了一项法令，以保护公众健康为借口，不准船上乘客任意登岸，并重申政府有权控制移民入境。自一八七八至一八八四年，夏威夷立法机关曾审理过二十起各类排华案件。在对待华工问题上，甘蔗园种植主们与夏威夷的排华势力之间有过斗争，因为种植园主想要谋取高额利润全得靠华工这支劳动力。到十九世纪末，当夏威夷成为美国的领土之后，在华人问题上，就一概照美国法律行事了。

排华法案

一八八二年五月六日，美国终于通过了“排华法案”。这标志着由白人劳工组织所掀起的排华运动，首次在全国范围内获得了法律上的认可。“排华法案”的通过，是多方面因素所促成的。当时美国的主要铁路干线已经完工，西部经济的发展也已奠定了基础，因此劳动力不足的问题已不复存在。此外，在北亚当斯、马萨诸塞、贝尔维尔、新泽西、比弗福尔斯以及宾夕法尼亚等地，华工被老板们用来充当破坏罢工力量的这一事实，使东海岸一直在关注华人事态发展的人们也进一步看清了问题的实质。与此同时，民主党与共和党又正在为控制国会而进行着激烈的斗争。双方都意识到，能否捞到西部的选票是这场斗争关键的一着。要想获取西部选票，则非采取排华立场不可。就这样，“排华法案”在几乎没遭到任何反对的情况下，便在两院顺利通过了。根据这项法案，华工向美国移民被中止了整整十年，非法入境者一律被驱逐

出境，而且华人被剥夺了成为美国公民的权利。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基于种族歧视而限制移民入境的法律。

在这之前三年，拉瑟福德·海斯总统曾经否决过国会的一项排华提案，原因是它违背“蒲安臣条约”精神。但是翌年，美国又同中国举行了一次谈判，并达成以下协议：根据一八八〇年条约，美国有权调整、限制或中止华人移民入境，但是并不绝对禁止华人向美国移民。一八八〇年签订的这个条约便成了一八八二年“排华法案”的依据。在这之后的数十年间，陆续增订的形形色色排华法令竟达十四项之多。

一八八二年的“排华法案”和以后出现的一系列排华法令，均遭到在美华人的强烈反对。华人六会馆曾代表整个华人界广泛地进行抗议。还有许多华人曾多次通过法庭据理抗争。

排 华 暴 行

对于排华势力来说，一八八二年中止华人移民入境仅仅是他们全面排华的第一步。整个十九世纪八十年代间，排华暴行愈演愈烈。其中最令人发指的一次，是发生在怀俄明州的“石泉惨案”。一八八五年九月二日这一天，一个威尔士矿工跟两名华人矿工因为分配住房的事发生争执，接着双方撕打起来。一名华工当场被用铁锹砍死。这时候已经纠集起一大帮白人矿工，他们把所有华工全逐出了矿区，赶回石泉唐人街。当天晚些时候，又有一百五十多名男女暴徒冲进唐人街，其中许多人已喝得烂醉。霎时间，只听见满街枪声大作。华人手无寸铁，寡不敌众，便纷纷往山上逃去。

当时有一位目击者这样写道：“华人像一群被追捕的羚羊，完全失去了抵抗的能力，只顾奔逃。一排排子弹对准他们身后射

去。没过几分钟，城东边的山上已是黑压压一片逃难的华人。暴徒们又丧心病狂地纵火烧了整个唐人街，可怜那些没有来得及逃出的华人，全部葬身在一片火海里。在这次惨案中，共有二十八名华人丧命，十五名华人受伤。整整一个月内，全州各处暴乱始终没有停过。最后，州长沃伦不得不动用联邦军队来收拾局面。”

这一时期里，白人矿工在反对联合太平洋煤炭公司剥削的斗争中，因多次抗议无济于事而一筹莫展。举行罢工，又因华工不肯参加而屡遭失败。问题的根子明明在于煤炭公司企图利用华人来牵制白人的罢工斗争，可是白人却把矛头转向了容易攻击的华工。这是当时白人对华人进行攻击所惯用的伎俩。

“石泉惨案”激起了东海岸人道主义者、和平主义者和一切华人支持者的义愤。他们纷纷要求美国政府主持公道救助华人。中国政府也派人赶赴现场调查事实真相，并向美国政府提出抗议。结果美国政府被迫赔偿死难者家属十五万美元。可是，在甜水县陪审团审理此案时，却没有对任何一个肇事的白人歹徒立案起诉。

一八八五年九月二十八日，在西雅图也发生了一起排华暴乱。来自各地的代表在排华大会上作出决定，勒令华人限期在十一月一日之前一律撤离华盛顿州西部一带。会议还对所有雇佣华人的家庭、工厂和企业进行了谴责，并责成“驱华委员会”监督塔科马和西雅图两地的驱华活动。

十一月三日，塔科马城七百名华人居民被三百个持枪白人强行押上货车驱出城外。当夜这些华人被迫在凄风寒雨中露宿，致使两人冻死在荒郊。城里唐人街则被放火烧光。无家可归的华人走投无路，大部分人被迫乘火车逃难去了波特兰市。

一八八六年初，华盛顿州立法机关又通过了一项“外籍人土地

法”，禁止一切外侨拥有土地。除这项法案外，众议员查尔斯·芒迪还提出另外三项排华提案，不过这几项提案都被搁置或被驳回。一位反对派议员奥林奇·雅克布斯指出，美国作为一个民主国家，应当允许国内亚洲人同其他民族享受同等权利。

排华活动在立法上遭到失败后，西雅图的排华势力索性自己动手赤膊上阵了。他们四处组织排华集会，蛊惑人心，煽动排华情绪。一八八六年二月七日和八日，一些各由五六个人组成的形形色色的什么“委员会”冲进唐人街，命令所有华人统统卷起铺盖限时离开西雅图。几小时内，就有三百五十名华人被装上货车运到了码头。由于警察只同意赶走华人但不准虐待他们，于是当地行政司法长官便动用了自己的后备队和保家团来充当打手。“太平洋皇后号”船的船长答应把这批华人运往旧金山，条件是每人付运费七美元。排华分子当即凑钱买了船票，打算把他们立即运走。但是船还没来得及离开码头时，船长便接到法院通令，说根据“人身保护法”，需在次日先把这批乘客送往法院进行审理。

法庭上，审判官告诉华人，虽然城里白人对他们很仇视，但是如果他们愿意的话，还是可以留在西雅图，并表示将尽可能为他们提供保护。可是只有十六名华人表示愿意留下。

在第一班载满华人的船离开西雅图之后，剩下的华人由后备队送回城，有的等下一班船，有的准备继续留住下来。这时满城还是一片骚乱。州长斯夸尔不得不调来联邦军队维持治安，并宣布全城实行军事管制。结果，国民警卫队在西雅图驻扎长达半年之久。

“排华法案”颁布后多年，加州华人一直在法律上备受歧视。在无数城镇里，他们都成了仇华暴徒的牺牲品，经常被任意驱赶

出城。一八八五年，亨博尔特县两名华人打架，子弹走火，无意打死了尤利卡市的一名市政会成员。结果全县华人一个不留地被驱逐出去。直到十年之后，亨博尔特县商会还扬言道：“那是一八八五年的事了。自那以后，这儿的华人就断了根。连远在中国国内的苦力都知道，本县不许任何一个华人进来。也没人再敢来过。”

到一八八六年时，亚利桑那州的几乎所有城镇都成立了排华团体。他们每周举行排华集会时，必定要先上街游行一番。游行队伍中又是铜管乐队、又是合唱团，还有市长镇长发表排华演说。听演说时，妇女还被让到前排位置上去。

当时有一出专门嘲讽和奚落中国风俗习惯的滑稽剧，剧名叫做《华人滚蛋》。该剧在墓石城的“鸟笼剧院”上演时，台下观众不时哄堂大笑。在整个亚利桑那州，墓石城排华团的气焰最为嚣张。他们的口号是“饿死中国佬！”自一八八六年二月起，他们又用拒绝跟华人做生意的办法企图逼走这些“猪尾巴”⁽¹⁾。为了一劳永逸地赶光华人，墓石城里一个富商情愿为一百名华人出路费，打发他们去波士顿。此外，在亚利桑那州另一个城市普雷斯科特，白人也企图用抵制中国货的手段除掉他们经济上的竞争对手。一八八七年，一伙白人甚至纵火烧掉了该城铁路街上萨姆·李开的餐馆。幸亏及时发现，才没有烧掉整个唐人街。

在许多城市里，虽然赌博、吸毒、卖淫的总是大有人在，但罪名却全加在华人头上。各种报纸也迎合这股排华恶潮，不顾事实真相，屡屡用“华人滚蛋”的大标题刊登各种谣传文章。政客们

(1) 因为当时华人都留着长辫子，便被种族主义分子蔑称为“猪尾巴”。——译者

则更为敏感，为了捞取选票，不惜趁机到处发表排华演说，通过排华法令。

就这样，直到二十世纪初，排华运动愈演愈烈。为了逃避迫害，不少华人移居到了美国东部。但是后来在中西部和东海岸一些城市里也相继出现了排华示威活动。这一时期里，美国东北部大西洋沿岸地区的华人人口迅速增加，从一八七〇年的一百三十七人增加到一八八〇年的一千六百二十八人。到一八九〇年时，华人已多达六万一千七百零七人。中北部各州，也有类似情况。这片地区在一八七〇年时仅有九名华人，一八八〇年增至八百一十三人，到一八九〇年时已达两千三百五十七人。而西海岸的华人人口是从一八七〇年的六万二千八百三十一人增加到一八八〇年的十万零二千一百零二人；但到一八九〇年时，则又下降到九万六千八百四十四人。

通过立法加剧排华

一八八八年十月一日，美国国会又通过了一项“斯科特法案”，规定华人劳工离开美国后，即使持有有效的回程证件，也一概不得再返回美国。只有五类华人可以例外：官员、教师、学生、商人和旅游者。结果使得两万多名回国探亲的华工不能再回美国去谋生。

“斯科特法案”是违背一八八〇年条约精神的，因为后者规定，美国无权禁止华人移民入境。可是当华工蔡振平(音译)就此法案向法院起诉时，美国政府竟强词夺理地声称，不管过去签订过什么条约或规定过什么宪法权利，美国国会都有权调整移民政策，阻止任何移民入境或遣返任何外国侨民。

一八九二年五月五日所通过的“吉尔里法案”，又将一八八二

年的“排华法案”延长了十年。它规定，一切华人须在一八九二年内领取居住证，进行户口登记。该法案还进而剥夺了华人向法院起诉的权利。它并进一步规定，任何非法入境的华人将被判处一年狱中劳役，随即驱逐出境。

这一切，引起了美国整个华人界的强烈抗议。中国领事与华人六会馆号召华人拒绝进行户口登记，并为他们筹款聘请律师同“吉尔里法案”进行斗争。结果，在十万六千六百六十八名华人中，只有一万三千二百四十二人在限期内进行了户口登记。在一起邝月庭(音译)控告美国政府的诉讼案中，最高法院的判词竟是：“规定华人进行户口登记是符合美国宪法精神的”。当时由于中国政府极为软弱无能，因此对美国政府的排华行径除了表示抗议之外，完全束手无策。自一八八九年开始，中国使节对“排华法案”曾提出过一系列抗议，但是美国政府根本不予理睬，一直拖到三年之后才作出答复。美国国务院驳回了中国的抗议，再次声称“吉尔里法案”旨在保护那些有资格旅居美国的华工的权利。甚至还狡辩说什么，在美华人的权利已超过了在华美国人所享受的权利。

但是，在美国也有为数不多的团体是反对本国政府的排华运动及其有关政策的。教会组织就是其中之一。凡是曾在中国或美国与华人共过事的传教士，都支持华人向美国移居，并认为这样做有助于福音的传播。第一个亚裔美国主教威尔伯·周牧师曾说道，在排华狂热时期，教会曾经给过华人极大的支持：

“那段时期，教会十分热衷于在世界各地的传教活动，曾派过不少传教士到中国和其它一些国家去。正因为如此，他们感到有必要替在美国遭到不平待遇的华人说话，应该支持他们。在华人因不懂英文只会说中国话

而遭到非难时，是教会为他们办起了英语学习班；在华人被斥责为只懂得崇拜偶像的异教徒时，又是教会为他们办起了圣经班，帮他们改信基督教。他们这样做的目的，不单单是为扩大教会人数，更是出自他们自己的信念——基督把上帝的爱赐给天下所有的人，应当让普天下的人都领受到这种爱。当时反对美国排华法令最强硬的一位传教士，是旧金山卫理公会的奥蒂斯·吉布森牧师。另外在长老会、浸礼会里也有这样一些牧师。在一次议会听证会上，由于吉布森牧师出面为华人作证，结果在会议结束后，旧金山的排华分子焚毁了他的模拟像。”

夏威夷华人界也曾组织过抗议排华的活动。他们在一九〇八年四月二十日的一次群众集会上，通过了数项决议，并就排华一事向移民局官员、罗斯福总统以及中国政府驻首都华盛顿的官员发出呼吁。檀香山中华会馆还向移民专员大卫·基夫递交了一份请愿书，抗议在办理移民手续过程中对华人的歧视待遇，并在请愿书的末尾，呼吁美国政府放宽在夏威夷地区的各种排华法令，“以便使我们的人民不至于感到他们是这个世界上最不幸的人”。起初，夏威夷的华人还曾幻想美国政府总会酌情修订夏威夷的移民条例的。但是事实证明，他们的命运与其他地区美国华人的命运毫无二致。

为了迫使美国政府修改排华法令，华人在美国进行抗议斗争的同时，还进一步呼吁国内同胞起来抵制美货。一九〇五年，抵制美货运动首先在上海开始，接着便迅速向南方发展。由于大部分旅美华人的家乡都在广东、福建两省，因此这里的商人是这场

运动最坚决的支持者。整整一年内，中国商人、学生和工人统统拒绝购买美货，拒绝进美国人办的学校读书，拒绝用美国轮船装运物资，拒绝替美国公司做事。这使美国原先每年三千万至四千万美元的对华贸易总额受到了极大影响，因此美国政府不得不赶紧要求中国停止对美货的抵制。最后，还是由于皇帝的敕令以及中国商人在经济上蒙受的损失，才迫使这场运动平息了下来。

虽然这场抵制美货运动并没有像某些最激进的发起人所预期的那样会迫使美国撤销各种排华法令，但却促使美国在领事工作方面做出了某些重大的政策性改变。这场运动最重要的意义在于，通过国内及海外（包括古巴、不列颠哥伦比亚、菲律宾、苏门答腊、夏威夷等地）华人界对抵制美货运动的支持，使美国种族歧视性的排华法案在国际范围内引起了反响和重视。并且也向世界公众揭露了这样一个事实：美国所推行的政策与它所吹嘘的民主原则完全是背道而驰的。

尽管美国到处笼罩着一片仇华气氛，但是由于中国国内的生活依旧是一贫如洗，因此迫使许多人宁可铤而走险去“金山”。根据美国排华条例规定，只有五类人可以移居美国。于是，一些不符合这五类人身份的，便设法通过各种渠道进入美国：有的假冒自己属于这五类人；有的越过加拿大或墨西哥边界非法进入美国国境；也有的用“冒籍子女”⁽¹⁾的办法设法获取美国公民身份。这个时期，虽然美国国内最猖獗的暴力排华势头已经过去，但是排华情绪仍在各个方面继续表现出来。华人在天使岛的遭遇——这是华人移民踏上美国领土必经的第一道关口——便是一个例证。

(1) 美国排华法案规定，凡是在美国出生的华人，其后代可以到美国来。于是有些人便假冒自己是美国出生的华人的子女，设法进入美国。

——译者

第四章 唐人街的诞生

一九七八年四月二十八日，数百名美国华人来到旧金山湾内的天使岛上，为一座重六千磅的花岗岩纪念碑举行庄严的落成揭幕典礼。碑上刻着这样两行字：

别井离乡 飘流羁木屋
开天辟地 创业在金门⁽¹⁾

——陈阿相

前来参加揭幕典礼的人群里，有老一辈的华人——在二十世纪初期，他们为了等待踏上美国这块土地，曾经在这个小岛上的移民拘留营度过数周、数月甚至数年的拘留生活。今天，眼前这一切，在他们的记忆中唤起的是不堪回首的往事。人群里也有不少第二代和第三代的华人——他们是前来向父辈奉献敬意的。华人在天使岛所蒙受的不平，今天终于为历史所承认。

当年拘留华人的简陋木屋，如今已被废弃，无声地伫立在那里。然而，那留在墙上的文字却仍在一字一句地诉说着天使岛上

(1) 这两行字系镌刻在天使岛纪念碑上的原文。——译者

的往事。许多不知名的被拘留者用汉字题下的行行诗句，深深地刻在木屋的板壁上。华人拘留营三一七室内的这两首诗，有力地表达了当年被拘留的华人心头的怨愤：

壁墙题咏万千千，
尽皆怨语及愁言。
若却此牢升腾日，
要忆当年有个编。
日用所需宜省俭，
无为奢侈误青年。
幸我同胞牢紧念，
得些微利早回旋。

——香山题

埃屋三椽聊保身
仓麓积憾不堪陈
待得飞腾顺遂日
铲除关税不论仁

——无名⁽¹⁾

天使岛：一九一〇至一九四〇

天使岛拘留营是美国政府蓄意推行排华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一八八二年排华法案颁布之后，美国移民官员加紧了对华人入境的控制。他们设下道道关卡，对要求入境的移民反复进行盘

(1) 以上两首诗均系天使岛拘留营墙上所题之原文。第二首是一首鹤顶格诗，每句第一字连读作“埃仓待铲”。当年华人通常称天使岛为“埃仓”，系英语Island(岛)一字的译音。——译者

问审查,直到证实他们确实属于美国政府准许入境的那五类人时,才肯放行。一九一〇年以前,拘留营设在海边的一个码头上。自一九一〇年至一九四〇年,来美国的十七万五千名华人中,绝大部分都是经过天使岛入境的。其他国家的移民也需要经过天使岛移民检查站入境,但是被拘留者中人数最多、时间最长的是中国移民。

所有华人移民均需进行体格检查,并接受长达一两个小时的严格盘问。然后,移民当局再把对每个移民提的问题向该移民在旧金山的亲属核对。如果两人的回答不相符合,这个移民就会被遣送回国。有时,这一套问题问过亲属后,还要再次盘问移民,整个盘问过程常常要拖上两三天。如果移民无法证明自己的身份,移民官员就认为这位华人所持证件是伪造的。据曾经在此被拘留过的人揭露,检查站里有不少移民官员滥用职权向移民敲诈钱财。那些无法证实自己是合法移民的人,最后都被强行押上船遣送回国。

于是,许多华人设法请人教给对付盘问的方法,以混过移民官员的盘查。有些盘问的内容实在荒唐之极,就连美国政府所认为的合法移民都难以回答。当时华人一致认为,既然美国的排华法案存心歧视和排挤华人,那么华人想尽办法来对付这帮移民官员也完全是合理的。有些移民在旧金山的亲属,便设法买通天使岛上的工作人员,偷偷弄到一份盘问稿的抄件,以便让移民事先准备好答案。这种盘问稿上的典型问题是:你们村子里有多少人家?你家住在什么地方?家里有挂钟吗?挂在哪面墙上?你家大门是朝东还是朝西?你家的供桌是朝哪个方向摆的?背出全家的家谱。你父亲住的房门口有多少级台阶?等等。

为了设法来美国,当年最流行、最易于成功的办法是以“冒

籍子女”的身份入境。说到“冒籍子女”，有这样一段故事：一九〇六年，旧金山的一场地震与大火，毁了全部移民档案。由于已无案可查，华人移民便乘机自称是美国公民。这以后的数年里，又有不少华人移民佯称自己国内有几个孩子——通常是儿子，而这些孩子就会以美国公民子女的身份申请来美国。这些“冒籍子女”的“名额”还常常被转让或卖给他们在国内的亲属和同村人，有时还通过中间人转卖。由于这些“冒籍子女”仅仅在案卷表格上与在美华人有“父子”关系，因此他们一定要事先背熟“父亲”一家的家谱、“父亲”村子的情况乃至“父亲”家里的井和窗户的位置之类的细节。由于移民官员知道新来移民中有“冒籍子女”这回事情，因此后来盘问分外严格。这些移民得事先准备好详细而准确的答案，才能对付移民官那一套套存心难倒他们的怪问题。

旧金山的一位居民吉姆·郭，至今还记得他当年以假冒子女身份来到美国时的情景：

“我祖父早年淘金时就来到了美国。那是一八六〇年前后的事了。他很不幸，钱被抢光，人遭杀害，连尸体都没找回来。祖母常对我们说，祖父挖了不少金子，赚了好多钱。于是我脑子里就想：‘嘿！这倒是个赚钱的办法。我也要去美国。’那时我才十五岁。要来美国的唯一办法就是要先买一张表，一张证明是美国公民子女身份的表。这得花不少钱。我用了价值一百零二美元的金子买到了那么张表，当时在国内那可是相当大的一笔钱。

“于是他们就给你一本大约有二百页那么厚的书，让你去看，去背。那上面写着的全是你必答的问题，你的身

世,你‘全家’的情况,你‘弟兄’的名字和几乎整个村子的情况。因为,一到了美国天使岛移民站,他们什么都问。我在那儿被拘留了三个星期。他们问我:‘家门口有多少级台阶?家里墙上有挂钟吗?’这类问题。你得把答案事先都背出来。他们还问:‘在家里时,你在哪儿睡觉?’我就说:‘跟祖母和兄弟一起睡。’他们又追问:‘你的床位置在哪儿?’对这种问题你都得想好对策。我那时还是挺机灵的,回答他们说:‘有时放在这儿,有时放在那儿。没一定。’”

到一九二二年时,天使岛上被拘留的华人自己组织起来,管理自己的事务和相互帮助。这个组织负责向管理部门反映意见和不满,还负责把政府的各项政策和通知翻译给大家听,甚至还为移民的孩子办起了读书班。实际上它是一个重要的地下联络网,把天使岛上被拘留的人与旧金山唐人街的华人沟通了起来。

拘留营里日常生活环境令人沮丧,被拘留的人受的是非人待遇。在被释放出去之前,他们全被关在反锁着的营房里,几乎没有行动自由。四周有高高的围墙把他们的住处和一个供活动用的小院子围了个严严实实。男女宿舍都是一个个大通间,里面挤满了双层甚至三层的床铺。窗子上糊着黑纸。住在里面的人,没有任何自由活动的余地。连沿墙的厕所里面都没有一块隔板隔开来。营房外面,环抱天使岛的是旧金山湾内凄凉的海水,想逃出去是绝对不可能的。岛上被拘留的人曾多次举行暴动和游行,发泄他们的愤怒和怨恨。经过三十个春秋之后,这片营房被当局标上“易引起火灾的房屋”的字样。终于,一九四〇年的一场大火烧毁了整个办公大楼。自那以后,被拘留的华人才被迁移到旧金山的另一

个地方。直到五十年代初期，对华人拘留审查的做法才被废止。移民入境检查手续改由驻香港或其他移民集散地的美国领馆人员负责办理。

与来自其他国家的移民相比，华人在天使岛上所受的隔离盘问无疑是一场灾难。他们从来到美国的第一天起就被当作犯人对待，这在每一个旅美华人的心灵上留下了永远无法愈合的创伤。多少年来，他们中许多人默默地忍受着艰难的生活环境与恶劣的劳动条件，不敢作任何抱怨。深怕什么地方被抓到一点岔子，过去那段“冒籍子女”的历史被审查出来，便将面临被驱逐或遣返的危险。

唐人街的形成

从天使岛拘留营释放出来后，到旧金山或其他城市去的华人只有一个地方可以安家，这就是唐人街。这种居住区的隔离局面完全是种族歧视所造成的。而对华人住房所作的种种限制，更加剧了这一局面。旧金山是美国最大的华人聚居区。排华高潮时，因为许多华人被迫从农村来到旧金山寻求保护与职业，使唐人街的人口不断增长。到一九〇〇年时，由布罗德韦街、加利福尼亚街、乾尼街和斯托克顿街这四条街所围成的唐人街区轮廓已明显形成。唐人街之内的七条街区便成了华人的“安全地带”。谁要是冒险越出区界，常常轻者遭到辱骂，重者遭顿毆打。美国多年来的排华暴行，使华人总是尽量避免发生冲突。独自一人外出时，更要格外当心。所以新移民一到美国便知道要赶紧住进唐人街。外出时一定要结伴而行，以防不测。当时的唐人街基本上是一个单身汉的社会，由新移民、商人、工厂工人、矿工、铁路工人和农业工人组成。后来大批移民来到了旧金山，唐人街的社会结构也就日趋复杂。华人中逐渐形成了帮伙和社团，也逐渐出现了发展

中的社区所难以避免的各种矛盾。

大多数华人是以村落或家族为单位，吃住在一起。住房拥挤不堪。为了省地方，床都钉在木板墙上，而且都是双层或三层的床。有的房子实在住不下，人们只好轮班睡觉。一切开支在年终结帐，由大伙儿分摊。美国各地唐人街的这种早期生活管理单位称作“坊”。吉恩·殷是这样描写他在纽约唐人街的一段生活经历的：

“我们姓殷的都是堂兄弟，所以全住在一起。大伙儿凑钱，合租了一套房子。谁若不在城里工作，就每逢周末回来一次。要是工作地方太远，比如在两、三个州以外的地方，那就每年回来两、三次看看，或者每季度回来一趟。但是靠近大城市住的人还是设法周末回来聚聚，打打麻将。若是一时找不到工作，也还可以住在这儿。合租房子住就是有这个好处。一般是六至十个人合租一套房子。全部开销大家共同分担。一时找不到工作的人也可以不出钱留住在这儿。不管你工作的地方离开这儿有多远，也都负担一部分开支。”

保留传统文化

由于唐人街内妇女人数极少，使华人社区缺少那种传统的稳定家庭的因素。不过早期的华人还是想方设法保留住自己的文化传统与信仰。几个大的传统节日总要笃诚地庆祝一番。每逢春节（在一月份或二月份，照阴历时间而定），必定要到处用大红喜纸装点起来，少不了放爆竹和舞龙，痛痛快快地热闹一阵。每年春天过清明节；秋天过中秋节，这是中国欢庆丰收的传统节日。华人移民信奉的是儒教、道教和佛教。各地唐人街上都设佛龕供神，

包括关帝爷、北帝、齐天大圣和观音菩萨。在能募集到足够资金的地方，还要修建庙宇，供烧香拜佛、庆祝节日和办理丧事之用。

美国华人的新闻系统也开始形成。华人报刊主要报导世界和地方新闻。最早的华人报纸，如《金山新闻报》和《加利福尼亚中国邮龙报》等，其特色是刊登生意人所关心的消息，诸如货物价格、航运消息等等。还有些刊物是为宗教和政治目的而办的。中国长老会牧师威廉·斯皮尔曾于一八五五年创办过汉英双语报纸《东方》。一些中国的和旧金山华人界的负责人还办了其他各种报纸，宣传他们的主张。美国华人的第一份日报《萨克拉门托日报》也于一八五六年创刊。

在旧金山唐人街和美国其他各华人居住区所开设的各种商店，都在社区生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这些商店不仅出售中国食品、药材和其他中国产品，而且店堂后面还常常是消遣和娱乐场所，可供人们买彩票、打麻将或吸鸦片用；这儿还是银行代办所，工人们可以把工资存放在店主处。这些店堂也是华人移民互通信息的地方。西雅图的洛克丁·殷曾这样回忆道：

“有些华人商店是做买卖的，有些根本不做买卖，只在店门口挂个招牌，以吸引华人来聚聚，不仅亲戚们愿意来，谁都愿意来聊聊，谈天说地，或者教小辈们应当做些什么事和该怎么做等等。有时他们还互相交流国内来的消息。比如我们村里如果有什么事，人们会写信告诉我们，我们在这儿的人便凑到一起商量出个办法，然后给村里写封回信。所以你看，我们常聚在一起聊聊，不然的话太寂寞了，也太闭塞了，什么事情都不知道。”

唐人街的夜晚

一八五二年，一个中国戏院从国内拆运到了旧金山。于是第一家华人大戏院便在美国开张了。自那以后，一般在较大的唐人街里，华人平时都可以在街头看到戏班子的巡回演出。晚上还可以到戏院里看戏，那可是个热闹地方，过道里小贩来回兜售瓜子、蜡烛和桔子等等。演出的节目不外乎是中国古戏的一些传统剧目。题材与内容多种多样：有历史故事，爱情传说，喜剧小品以及报恩故事等。

在经济拮据的时候，赌博便会成风。手里没钱花了，唯一能侥幸发财的办法就是赌。对于在美国的华人来说，想靠工资攒钱，至少要拼命干上好多年。可是如果赌运一来，倾刻之间便可发迹。原先在国内就喜欢玩的麻将、翻摊、白鸽标等，现在都成了唐人街夜间娱乐和消遣活动的内容，但同时也成了冒险和寻求刺激的手段。赌瘾成了许多华工遭殃的祸根。辛辛苦苦挣来的一点钱瞬间便可赌光。要想再攒点钱，就不得不在美国再苦熬上许多年了。

唐人街上夜生活的另一个侧面便是鸦片烟馆与妓院。由于吸鸦片能够一时麻醉自己，可以暂时摆脱生活中的烦恼，因此吸毒在一些华人中很常见。当然，唐人街上几个有名气的烟馆，也常常有外国游客光顾。另外，凡是妇女极少的地方，都会有卖淫现象，唐人街也不例外。当地警察不时查封一些妓院、烟馆和赌场，使情况有所好转。可是在本世纪初的二三十年内，这几种陋俗始终未在唐人街单身汉社会绝迹，只是其程度绝不像美国报纸所渲染的那样严重罢了。

血缘团体

早期唐人街的血缘团体，是按来自华南地区移民的血缘和地缘关系形成的。他们到了美国后发现，要想在这儿开辟新的生活道路，面临着重重困难。于是便在乡土和家族关系的基础上，组成各种互助团体。最基层的组织叫做“坊”，由最亲近的家属和同村人组成。但是每个村子的人数不多，所以后来又根据姓氏组成了较大的团体，叫做“姓氏团体”。这种姓氏团体往往有自己的活动场所，这些场所后来又扩大成为社会活动中心和居住点。规模较大的姓氏团体还自行修建佛龛，举行各种会议和传递来自家乡的信件。每逢过春节，他们都要盛宴邀请全体成员共同庆贺佳节。如果家族内有人死了，他们还负责把遗体、遗物送回老家。总之，这种姓氏团体的宗旨是替同姓人和同乡人办事。

随着华人不断分散到美国各地寻找职业，后来又出现了某些姓氏专门集中在某些城市的现象。比如，姓安的人多半住在菲尼克斯；梅姓和陈姓集中在芝加哥；李姓多数在首都华盛顿；余姓则多集中在匹兹堡。旧金山主要是黄、李、陈三大姓。一旦某个家族的成员在某地站住了脚，他便会捎信给在加利福尼亚州甚至在国内的亲属，让他们到这儿来安家。内奥米·容还记得她家乡的“表兄弟”们当年陆续来到美国的情景：

“记得我小时候是在奥尔巴尼长大的。家乡时常有人到这儿来，我都称他们表兄弟。每来一个人，我家都要带他到城里一家挺有名气的老式商店去买一套上等服装，配上帽子和靴子。买的各种衣服总是够他穿几年的。此外再给他一笔钱，让他去做买卖。有时跟我家一起合

伙做生意，有时他单独一人做。

“只要家乡有人来，这儿总是腾出房子给他们住。而且每逢来了同乡人，我们都高兴得不得了，因为他们会一五一十地数说家乡每个人的情况。只要是同乡人，就都以亲戚相待。所以常常有人说，姓李的人都到这儿来了，确实是这样。以后再来姓李的人，还是到纽约来安家。而且他还会再写信回家去，这样一个接一个，姓李的越来越多。”

会 馆

比“姓氏团体”更高一层的组织叫做“会馆”。它在唐人街的社会和政治领域内有更大的势力和影响。与旅美德国人的移民互助团体相仿，它是华人社区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依照地缘关系组织起来的。在某些方面，会馆与姓氏团体的职能相似，但是它的活动范围要比姓氏团体广泛得多。新来的移民一到，会馆就与他们进行接触，从去码头迎接，负责他们初来美国时的膳宿，到帮助他们找职业，样样都管。在整个旅美期间，移民们时时刻刻都会感到它的影响及权势。甚至移民在离开美国时，都要征得会馆的许可，才能离境。会馆的主要职责是调解会员之间的纠纷，免得把事情闹大，以至告到地方法院去。由于会馆是由商人控制的，因此势力相当大。谁要是不服从它，就会被从华人社区里排斥出去。

旧金山唐人街的华人，主要来自三个地区，分别组成了几个大的会馆。早期移民中的绝大部分劳工来自广东省的“四邑”：台山、新会、恩平和开平。其次是来自中山县的移民。唐人街的大部分商人则来自“三邑”：南海、番禺和顺德。另外还有一部分移

民是来自广东省的一个少数民族——客家人。由于原来在国内相互之间就存在着方言差别与世仇，因此他们各自都成立起自己的会馆。而这又进一步加深了他们之间的裂痕。

华人六会馆

到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末时，各姓氏团体以及各会馆之间的矛盾与世仇已发展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为了解决这个矛盾，旧金山华人界的首领们组成了“中华会馆”。这个组织的英文名称是“华人六会馆”，因为是由六个会馆合并组成的。它充当仲裁委员会，负责全面管辖整个华人界的一切事务。后来，该组织由来自宁阳、肇庆、合和、冈州、阳和、三邑及人和等七个会馆的代表组成。一八八〇年，华人六会馆全力投入了反对排华立法的激烈斗争，并被正式命名为“中华总会馆”。不过许多人仍称它“华人六会馆”。

在旧金山唐人街范围之内，华人六会馆除了管辖各个会馆之外，还办起了华语学校，组织起医疗护理等服务工作，并代表华人界出面抵制了多达二十五项以上的各种排华法令和规定。在唐人街范围以外，华人六会馆则是一个能够全权代表整个华人界的正式机构。

商业公会

早期唐人街的经济结构，主要由三股力量组成：一是商人，经营进出口贸易；二是小业主，开洗衣店、杂货店和餐馆等；三是工人，为华人及美国人开办的企业提供劳动力。三股力量中，势力最大的是商人，因为他们对早期唐人街的形成影响最深。他们控制着各个姓氏团体、会馆，乃至华人六会馆，并充当这些组

织的领导人 and 代言人。他们所拥有的权势，使他们能管辖唐人街华工生活的各个方面。比如，有些华工是靠商人的贷款垫付了来美国的路费的，为了还清这笔高利贷，他们只好被迫为商人卖命。那些小业主也得依附于商人，买他们的股份，因为只有这样做，他们才能逐步获得商人的身份，享有把妻室接到美国来的优惠。

“秋亚公所”可能是加州最早的一个华人商业公会组织。它的宗旨是排解商人之间的纠纷、确定商品最高牌价、缓和商号之间的过激竞争等。但是由于企图控制唐人街经济的各股势力竞争得太激烈，最后它也无能为力。如商业公会中势力最大的是三邑的商人，但四邑商人根本就不服他们，为此不断发生冲突。一八八〇年，三邑的领导人罗堂（音译）遭暗杀。之后的十年内，三邑与四邑之间的怨恨越结越深，先后有六名中国总领事出面调解都无济于事。最后四邑另外自己组织起一个商业公会，叫“客商会馆”。他们千方百计对三邑的企业进行抵制。直到一八九九年中国政府出面强行制止，才算结束了这场纠纷。

到一九〇八年，三邑和四邑的商业公会均意识到还是合并起来利多弊少。最后，在中国总领事的敦促下，终于组成了“中华商会”。该商会成了协调各企业单位的议事机构，并在唐人街以外负责促进整个华人界的权益。对于有损商人利益的移民法和贸易法，它都曾出面提出过抗议。此外，它还与市政部门一起搞了一些公用事业，诸如在唐人街增设邮电分局、添置中国式路灯等等。

秘密会社

为了对付商人在唐人街的独断专行，移民中逐渐出现了另外一种组织，这就是被称作“堂”的秘密会社。这些会社不是血缘与

地缘组织，而是根据各自的信条结合起来的。因为是一种兄弟会性质的组织，所以这些“堂”对那些无钱无势、又没有唐人街各大姓氏团体可依靠的游民来说，特别具有吸引力。

这些最早的堂会组织，是在国内某些秘密会社的基础上所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当时国内曾经出现过一些反对清王朝、要求恢复汉人统治的秘密会社组织，南方的“天地会”就是其中重要会社之一。它的许多会员都曾参加过太平天国起义和广东省的红巾起义。在反清斗争失败后，不少人于十九世纪中叶移民到了北美和东南亚。到了海外之后，他们又在各地建立起秘密会社的海外分社。

夏威夷的一些秘密会社甚至还保留了原先天地会的政治主张。但是到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时，美洲大陆上又出现了另一种性质的堂会组织。这些组织着眼于眼前的利益，目的是控制唐人街的政治和经济大权。许多年内，堂会之间，堂会与各会馆以及与华人六会馆之间，在许多问题上不断发生摩擦与冲突。这些问题包括：反对少数会馆垄断唐人街的经济；在唐人街上争夺地盘从事烟、赌和娼妓活动；进行家族世仇报复，保护各自的结盟兄弟；以及因贫富悬殊而产生的矛盾等等。

在反对排华法案的过程中，由于三邑商人领导层斗争不力，使华人六会馆大大失去了华人界的拥护，它作为唐人街最重要机构的作用也遭到削弱，以致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为控制唐人街而展开的激烈斗争中，逐渐失去了地盘。这时，堂会便趁机扩大自己在唐人街的势力，买通执法机构的熟人，大肆进行非法活动。各组织间在无法和平解决冲突时，便诉诸武力，上街殴斗。直到一九〇六年以后，华人六会馆才在教会和警察的协助下，把堂斗平息了下去。不过小规模冲突一直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还时有发生。

随着堂会成员的年纪渐老，同时唐人街上男女人口比例逐渐趋向平衡，原先堂会赖以生存的烟馆、赌场和妓院等生意也日趋衰落，因此堂会本身的影响也日益减弱。有些堂会逐渐改弦更张，也效法其他的会社组织，成了为唐人街的华人提供娱乐消遣和促进友善和睦的社会活动场所。

唐人街以外的华人企业

秘密会社的活动一般只局限在唐人街范围之内，另外唐人街的合法企业也绝大部分都在华人社区之内经营。但到十九世纪末期，有些商人已积累起足够的资金，便开始了更大规模的经济活动。一部分资金用来投入了国内的现代化建设，比如四邑地区的新宁铁路就是其中的一项。当时在华人商界中，民族主义感情始终很强烈，尤其是由于在美国所遭受的歧视，他们这种感情更加强烈。许多华商界人士认为，在经济迅猛发展的二十世纪，中国唯有实现现代化，才能赢得世界的尊重。

还有些华商合资在美国经营了一些较大的企业。比如一九〇七年，在旧金山办起了“广东银行”，主要吸引华商的资金力量。一九一五年，华商又成立起“中国邮船公司”，以支持国内反对日本侵略的斗争。遗憾的是，没过多久，由于财力不足与经营不善，这两项大企业都被迫于二十年代倒闭了。

有一部分企业还是成功的，而且在整个美国西部发展了起来。比如，一九〇三年时，周崧曾在加州的瓦列霍办起一个小店，两年之后迁到了旧金山。到一九二八年时，该商店已发展成拥有四十五个分店的联号企业。这个联号企业叫做“国民一元货商店”⁽¹⁾，

(1) “国民一元货商店”是该店的英文名字(National Dollar Stores)，其中文店名为“中兴公司”。——译者

至今仍生意兴隆。曾经连任该企业经理三十多年的肯尼思·林这样回忆当年创业的甘苦：

“你知道为什么给它取名叫做‘国民一元货商店’吗？因为最初店里经营的商品全是低于一美元的，……衣服等的售价都定在一美元之内，就像过去有些小店专门经营五美分或十美分的小商品一样。刚开始办这个‘一元货’商店时，生意兴隆极了，店里挤得水泄不通，因为我们的价钱便宜。有些价值一美元以上的商品，我们也只卖一美元。记得有一阵子，我们削价卖一种名牌货床单，整箱整箱地卖，一开箱就是几百条。薄利多销，钱真是没少赚呢。”

“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我们的买卖一直扩大经营到内华达、俄勒冈和华盛顿州，后来还发展到夏威夷群岛。我自己就曾经从加州的斯托克顿迁至华盛顿州的斯波坎，甚至在那儿的一个地下室开起铺子来。后来造船事业兴隆起来了。我又在华盛顿州的布雷默顿另开起一个店。那儿住着不少搞国防工程的人，所以我开的店生意很兴旺，我也分得不少红利。只要店里多赚钱，你就有红利可拿。有些店不赚钱，当经理的就只能靠工资了。”

二十世纪初叶，华商创办的企业中规模最大的一个是纽约的“华昌公司”。这个公司是一九一六年由李国钦博士筹办起来的。此人在国内因发现钨矿而知名。自一九一六至一九三七年抗战爆发前，华昌公司在中美贸易与工程技术合作方面一直独占鳌头。它从中国进口矿砂和农产品，再向中国输出机械和化工产品以及钢

材等。在以后的数年里，因为这个公司专门从事矿物研究，美国政府曾授权它在纽约设计并兴办起一家钨选矿厂；在俄勒冈州的奥尔巴尼建起了一家锆铪厂；还在得克萨斯州的得克萨斯市建了一家炼锡厂。在国际范围内，它甚至还在巴西开发了世界第一大钨矿和两个钨矿，并在玻利维亚和东南亚从事其他矿物的开采。

像“国民一元货商店”和“华昌公司”这两大企业，在当时华人商界中只是凤毛麟角。随着华商资本的增多，有些人也大胆地在石油、矿山、罐头食品和汽车等工业领域内进行投资。不过一般说来，这一时期内绝大部分华商投资经营的都是仅需少量种子基金的企业。由于种种原因，华商在唐人街范围之内经营的一般也只限于小型企业。当时因为华商大都缺乏经营管理经验，加上资金不足，所以根本不是美国企业的竞争对手，连“广东银行”和“中国邮船公司”这样的大型企业，后来也都相继倒闭。三十年代出现的经济大萧条给华商带来了更大的困难。加上在管理制度方面种族歧视性的限制，使华人企业的发展进一步受到阻碍。

但是，夏威夷的情况却不一样。那里的华商一直一帆风顺。到一九三〇年时，华人办的企业在夏威夷经济中已成了举足轻重的一个组成部分。他们也像美洲大陆的华商一样，组成各种“会”以便积累和发展资本。通常是由几个同乡人各出等额资金，建立联合基金。先由其中的一人用全部资金办起某项企业；到了下个月，大伙再凑同样一份资金，供另一个人用来办某项企业。这样每月重复一次，直到每个合伙筹集资金的人都分别办起自己的某项企业为止。

华人社区——唐人街

早期的唐人街是华人赖以生存的一个“单身汉社会”。它为华

人提供了一个熟悉的社会环境和各种互助条件，并对在唐人街以外遭敌视受欺侮的华人提供了某些保护。唐人街在美国社会中完全处于孤立状态，华人之所以肯接受这种孤立的生活环境，是因为他们中大多数人都确信他们在美国的逗留只不过是暂时的，迟早都要离开这儿，告老还乡。在他们心目中，唐人街不过是个新老移民的暂时安身之地，或是外出做季节工的华人回来时的落脚之地罢了。

本来早期华人在美国曾经有到处流动找职业的自由，后来到排华时期这种自由被剥夺了。华人想在短期内致富的梦想也破灭了。他们发现，为了继续挣钱养活国内一家老小，他们不得不长期在美国待下去，单身汉社会再也不可能只是权宜之计了。此外，由于华人在美国劳工运动中被当成了替罪羊，而他们又无力对这种不平遭遇进行有力的反抗，这又使唐人街社区内不断存在着各种愤恨与不满情绪。

以上种种因素，使得唐人街华人社会中领袖人物的作用显得越来越重要。各派对抗力量为了力争在政治上与经济上控制唐人街，展开了角逐。这也是他们在美国社会生活中唯一有权争夺的一块地盘。唐人街内，虽然除了少数华人外绝大部分华人都没有自己的家庭，但是各种这样或那样的会社、团体，却代行着家庭的职能。为此，唐人街作为一个负责组织和管理工作事务的社区，它的作用和影响也就与日俱增了。

第五章 妇女与家庭

直到一九七〇年，美国华人中男女人口比例始终悬殊极大。这一社会现象是多方面的历史原因所造成的。最初是因为华人妇女都情愿留在国内，后来则是美国法律禁止她们移居美国。在早期来美国的华工中，极少有人携带妻室。原因是美国当时正处在向西部开拓的时期，华工的工作流动性极大，根本就不允许他们建立家庭。另外，强烈的家庭观念和传统的乡土风俗，促使中国妇女宁愿留在家乡侍奉公婆，养育子女，守着自己的家。等待有朝一日，丈夫回国，再合家团圆。

男人在美国期间，都按时往家寄钱，并且设法每隔几年就回家探望一次。跟妻子团聚后，往往在家里住上一年左右，待孩子出世后再离家回美国去。不少孩子从小就根本没见到过爸爸的面，直到长大成人后才第一次看到父亲。家里的长子，一到了能挣钱的年纪，就由海外亲朋接济，把他们送去美国帮着父亲挣钱。但是也有许多男人离家之后就再也没有回来——或是出于他们自己的选择，宁愿留居海外，或是出于无奈，经济上遭了不幸，使他们有家难归。对于这些人来说，离别家乡便意味着海外飘零度终生了。

他们起初在美国西部修铁路或者干各种流动性季节活。后来

逐渐进城找到了工作。许多人当意识到他们在美国的逗留不可能是暂时的，一时回不了家时，便开始把自己的妻室接来美国。但在一八八二年“排华法案”颁布之后，美国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法律，限制华人往返于中、美两国之间，而且这个局面一直继续到一九六五年。这些法律对美国华人的家庭生活造成了极大的影响。

一八八八年“斯科特法案”颁布之后，两万多名华工因为听说一旦离开美国就再也不准回来，于是只得只身在美国待下来。想到将要孤身一人在外苦度终生，内心不禁充满了绝望。自一八八二年至一九二四年间，只有进出口商人可携带妻子入境；而一九二四至一九三〇年间，则禁止一切华人携妻入境。

妇女在中国的传统地位

多少个世纪以来，儒家伦理观念一直是维系中国社会的精神支柱。直到十九世纪向美国移民的高潮时期，儒家思想仍然深深支配着人们的道德观念。在儒家思想统治下的中国，历代王朝都靠着一套严格的社会等级制度来维护其统治。按照这种制度，人人恪守固定的社会地位，不得越轨。男(阳)女(阴)生由天命，本无贵贱之分，只是后来才逐渐形成男尊女卑。妇女得遵从“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那套封建礼教。

于是，男女自生下来就受到不平等的待遇。中国有一句俗话：儿子能传宗接代，女儿只不过是泼出去的水。婚姻也完全由父母长辈一手包办，男女要到成亲那一天才能见面。结婚之后，妻子得住进丈夫家里，她的义务是侍奉公婆和养儿育女。而且她一定得生个儿子，才能在丈夫家里得到应有的地位，不然随时都会被抛弃。

早期旅美妇女

矿区和城市里的单身汉社会，为买卖娼妓提供了公开的市场。到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一些“堂”帮开始趁机干起了贩卖妇女的勾当。他们把妇女从国内运来，逼她们卖身做奴婢和娼妓，从中大发不义之财。这些妇女的身价依各人年龄和容貌而定，低则一千美元，高至三千美元。从事猎获和偷运妇女入境的中、美帮伙集团，构成了一个极为复杂的地下联络网。他们常常先把妇女偷骗来，再从一个买主转卖到另一个买主手里。在贩卖和偷运这些妇女的过程中，参与这一勾当的美国代理行政司法官员和警察，可以从每笔交易中捞取五百美元的贿赂。在旧金山，偷运娼妓入境所牟暴利的四分之一，都进了这些美国人的腰包。到一八七〇年时，仅旧金山一地，唐人街上就出现了一百五十九家妓院。

一八七五年起，美国开始制止对“淫荡”华妇的偷运，并通过了一项法令，禁止苦力和“伤风败俗的妇女”入境。唐人街的华商也与基督教传教士一起，努力设法制止对这类妇女的偷运。但是由于参与这一勾当的集团势力太大，涉及到当时美国驻香港领事馆、轮船公司和移民局官员以及相互明争暗斗的各股堂帮势力，因此这股恶风一时难以煞住。在美国排华高潮时期，妇女人数减少，其身价也就更高。随着从事娼妓活动的堂帮势力日益猖獗，加之移民关卡的腐败，娼妓贩卖活动也就变本加厉。当时美国报刊不断谴责华人伤风败俗，但事实上美国其他移民开的妓院并不比华人的少。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期间，除了华人妓女外，美国还有来自德国、西班牙、智利、法国以及美国本国的娼妓。

许多华人妇女完全是被拐骗到“金山”来的。王阿素(音译)的

身世就是一个典型的实例：

“我十九岁那年，家里来了一个人，他告诉我母亲说，美国有好多好多金子，只要到那儿去，就准能赚钱。就是削土豆，一天也能挣七、八块美金。要是肯干活，就更能赚大钱。他说他是个洗衣工，赚的钱可真不少。当时他待我很好，我母亲也喜欢他，就答应让我跟他走，做他的妻子。我只当自己就是他的妻子了，对他真感激不尽。

“刚来旧金山时，我们住在唐人街的一家旅馆里。过了大约两个礼拜后，一天，突然有个女人来找我。她年纪轻，很漂亮，全身上下都是绫罗绸缎。她告诉我说，我并不是惠耀⁽¹⁾的妻子，说是她给了惠耀一笔钱，要他帮她买一个婢女，所以我该归她所有，得跟她走。我当时怎么也不肯相信她说的话。我以为她纯粹是在骗我。所以那天惠耀一回来，我就问他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那个女人要这样来骗我，她想干什么。没想到他竟然告诉我说，这是真的，他确实不是我的丈夫，他根本就不想要我。还说这种事在旧金山到处都有，大家都这么做，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就这样，阿素被迫进了妓院，当了七个月的妓女。有一天，在一次聚会上她偶然被父亲的一个朋友碰见。她不敢承认自己是谁，生怕给父母丢脸。可是那个人还是认出了她，并且追问道：

(1) “惠耀”即把王阿素带到美国去的那个男人的名字。——译者

“你怎么会落到这个地步？”他说他愿意帮她的忙，于是她才一五一十把事情全盘告诉了他。十天之后，她被旧金山的一个教会慈善机构营救了出去，这个机构的负责人是唐纳丁娜·卡梅伦。

自一八九五到一九三八年间，卡梅伦(唐人街上都称她为“姆妈”)经过数十年不懈的努力，救出的华人奴婢和妓女不计其数。在许多华人的大力支持下，她与玛格丽特·卡伯特森以及外国教会西方文化部(成立于一八七四年)一起，采取了一系列的行动，设法营救这些妇女。但是与此同时，堂帮也派出打手，四处追寻这些被救出的人。因此她们一旦逃出妓院，就得立即隐藏起来，直到卡梅伦通过法律途径把她们解救出来，才算真正获得自由。有一次，为了营救一名妇女，卡梅伦曾前后三十次奔波于法庭内外，为她据理力争，终于使她脱离虎口。

这些妇女被救出之后教会提供两种出路由她们选择——或回国，或留居美国。一般说来，愿去愿留的人数大致是各占一半。不少人留下来，结婚成了家。大多数妇女都无比庆幸自己有了选择生活道路的自由。最早的一批华人女医生中，有一位就曾经是教会营救出来的婢女。

妻室移居美国

直到本世纪初，中国仍有许多家庭为生活所迫而不得不把家里身强力壮的男人送去海外谋生。与此同时，国内工业的发展也开始使妇女传统的社会地位起了变化。许多妇女在沿海城市新开的纺织厂或其它工厂里找到了职业。经济发展的需要压倒了传统的习惯势力，终于把妇女从农村家庭里解放了出来。也就在这个时期，美国的华人也开始接他们的妻室来美国安家了。因为他们考虑到，留在美国生活，固然要受凌辱与歧视；但是国内的战乱与贫穷，

使日子更加难熬。在美国，只要肯拼命干，日子总还能过得下去。再加跟初来美国时的颠沛流离生活境遇相比，现在城市里的工作与生活条件也比较安定了。这一切，都促使他们开始考虑要在美国安家定居了。

华人的妻子多半都是只身一人远涉重洋来到美国的。她们一上岸，就得在天使岛上被隔离、盘问，有时甚至被无限期地拘留在那儿。不少妇女，永远告别了土生土长的家乡来到这块完全陌生的土地上，心里充满着忧虑与恐惧。因为对她们来说，不仅周围的一切都是陌生的，就连即将与她们共同生活的丈夫都从来没有见过面。在那个包办婚姻的时代，有些华人是自己回国娶亲的，也有些人的婚姻完全是别人包办的。家里的亲友替他们在家乡物色好一个妻子，他们只在美国等她来成家。多蒂·孟就有过这样一段经历：

“我七岁那年，母亲就去世了。九岁时，父亲也离开了人世。只好去香港一个表兄家住。后来从美国来了一个人，那年他十九岁，我大约也该十九岁了。他就把我娶了。他是在加利福尼亚出生长大的，这桩婚事完全是包办的。我就这么来到了美国。那是一九一七年的事。先到了檀香山，接着来到加利福尼亚。一到了这儿就被隔离在那个岛上等了两个礼拜。是天使岛。”采访者：“那儿还有别的女人吗？”

“当然有，好多好多，还有年纪很轻的女孩子。她们有的已在那儿等了整整一年了。既回不了家，又出不去。那儿规定我们同一时间吃饭，同一时间睡觉。有的人是因为丈夫在美国才来的；有的人是来找父亲的。

都逃脱不了盘问和审查。”

过了天使岛这一关，办完入境手续之后，她们的丈夫就来把她们接走，带到拥挤不堪的唐人街去。那儿就是他们的家了。原先单身汉住的房子，现在把单间屋的墙一打通，就算是住家用房了。住房多半都在杂货店或洗衣店的后间，也有的在店堂阁楼上。

妇女挣钱养家

在美国安下家来以后，凡是丈夫开店营业的，妻子都帮着一起照顾生意。比如她们可以在杂货店里当店员，在餐馆里当厨师和招待，或者在洗衣店里帮着洗、熨衣服。

华人不管定居在哪儿，只要是开店做生意的，都得全家大小一起帮着干。汤米·张的一家就是这样。他父亲原先是铁路工。后来，在二十年代里，全家去亚利桑那州的塞利格蒙定居了下来。这是一个美国西部的小山城，住着一百来个华人。

张的父亲开了一辈子餐馆。去世之后，家里人又接着开下去。那年他的大儿子才十六岁。后来全家又搬到了亚利桑那州的另一个地方去住，开了个大饭店，还有舞厅。当地牧民常骑着马到饭店来，把马往门前柱子上一拴，就大步走进店里吃饭或者娱乐。很有点西部牧民的特色。

华人不管是开杂货铺还是开百货店，也不管是开洗衣店还是开餐馆，家里的生活总是与经营的生意分不开。店里的生意都得夫妻俩一起张罗，孩子渐渐长大，也得教他们学着在店里帮忙干活。按照儒家的传统观念，父亲总是一家之长。不过在美国的华人家庭里，孩子们从小就知道父母两人的话都应该听。

到二十世纪初期，华人妇女所起的作用已经相当大了。每逢

谈到这个话题，孩子们都会流露出对母亲的敬佩。维拉·钟还记得她母亲玛丽·李·钟当年在夏威夷是怎样帮助她父亲开展牧师工作的：

“每个礼拜天，她都为全教区的教友准备一顿午餐。那阵子可没有超级市场供应面包。所以每到礼拜六，她上午一忙完家务活就开始忙着烤面包，还得自己挤牛奶，拌牛油。还要做薄荷酱等。

“碰到父亲忙的时候，母亲还会骑着马替他去看望教友。她还能帮着劈木头、擦煤油灯。家里屋旁有一口井，都是她自己动手打水上来。因为那时候还没有自来水管子。

“常听母亲说，当地的华人都十分亲近、和睦。每逢做礼拜，方圆五英里内的人都会来。少数有钱人家骑马来，这是当时唯一的交通工具。他们平时也常到我家来玩，还总是带来满满一篮子好吃的东西，都是自家地里种出来的。临走的时候呢，我母亲也总是不让他们空着手回去，每次都把她自己做的面包啊，果酱啊送给他们带回家去。”

如果丈夫不是开店的，妻子就得到外面找点工作，帮着家里挣些钱。比如出去帮人家剥虾仁，在服装店里做衣服，或者去水果罐头厂干活。有些妇女甚至是家庭经济的主要支柱。就拿王世珠（音译）家的情况来说吧。她丈夫在一次堂帮械斗中受伤致残。为了养活一家人，她得天天去罐头厂干活，从早上六点一直干到晚上八点。每个礼拜干六天活，能挣九点五美元。除了进厂干活外，她还打点零工，如洗对虾、做衣服等等，以便增加收入。那年月

里，只要能靠双手干活挣点钱，不管收入多么微薄，都能替家里分忧解难。

当初为适应早期唐人街上单身汉的需要所建立起来的各种组织，诸如姓氏团体、劳工团体以及堂会等，现在都无法满足妇女与家庭的需要了。为了建立新的家庭，为了应付这个完全陌生的环境所带来的种种困难，妇女们只好求助于早年来美的华人妇女。她们往往能帮助排除些忧患，也能帮助解决一些在唐人街或郊区安家过程中遇到的具体困难。此外，教会和慈善团体也给有困难的妇女或教友提供某些帮助。

玛格丽特·梁·刘是二十几岁时来到美国与丈夫共同生活的。怀第三个孩子时，她丈夫不幸去世，全家便从得克萨斯州迁到了旧金山。

玛格丽特·刘这样回忆她当年独自一人拉扯大三个孩子所历尽的艰辛：

“我那时候每个礼拜得干六天活，有时还带些活儿回家来做——靠绣花挣点钱。平时从来没空到别人家去玩。只是偶尔隔壁邻居过来坐坐、聊聊天。礼拜天嘛，照样要在家里干活，还要带三个孩子去做礼拜。我是又当妈妈又当爸爸。没法子。我得干活挣钱养活孩子。后来还学会了做夜礼服，做结婚礼服等等，……”

“就这样，我干了整整五十二年活，一直干到七十二岁。真算劳累了一辈子。”

保留民族传统

做母亲的主要职责之一，是把中国的民族传统一代代传给孩子们。让他们了解祖国的文化，懂得各种礼节，懂得尊敬长辈。

逢年过节，她总要准备各式各样的节日佳肴，全家庆贺。中国最大的传统节日要算春节了。伊迪丝·黄曾经这样回忆她小时候过年时的兴奋心情：

“每到过年，家里总是里里外外打扫得干干净净。母亲用平日省下来的钱买回家好多大米——因为一年之初的富裕，意味着整年都有好运气。当然我们家买不起很多东西，但总也要样样都置办一点。还买好多桔子。还准备许多红包⁽¹⁾。不过我们家钱少，红包内包着的并不真的是钱，而是核桃。妈妈会把它们摆在满屋各处。最叫人高兴的是第二天清早一醒来就会发现许多红包，而且都分给我们自己保存起来。亲朋们来家玩时，也会送我们红包。再就是各种各样好吃的东西。嘿，妈妈做的菜味道就别提有多美了。……新年早上一大早就是一顿美餐。我们祝妈妈新年好，祝妈妈长寿，还给她鞠躬、敬茶。爸爸那时候不在家，要是在家，也是同样一套礼节。”

每逢过节那天，孩子们白天去学校搞庆祝活动，妈妈们就在家里忙饭菜。她们还学来了一些外国人过节的风俗习惯。比如她们也跟美国人一样过感恩节和圣诞节。过感恩节时，美国的传统是吃火鸡。而她们呢，不仅会烤火鸡，而且还用中国的烧法，在火鸡上涂一层酱油，再在火鸡肚子里塞满甜糯米、蔬菜、火腿和

(1) “红包”指用红纸包着的钱，作新年礼物用，以示吉利。——作者

虾米等等，别具一番风味。

埃丝特·唐在谈到这个话题时，曾经说道：“我们能有今天这一切，能像今天这样长大成人，得感激我们的父辈们。”如果说是前辈们为他们保存了自己民族的文化，那么现在他们的责任就是如何把传统文化与当代文化融合起来。埃丝特是这样讲的：

“记得在唐人街上有过一只大烤炉和一只大滑轮。这个滑轮能吊起八十磅到一百磅重的猪肉，再把它放进那只特制的烤炉里去烤。每逢结婚办喜事，都可以花钱请人帮忙烤整只猪。他们还会帮忙把猪肉切好，连同结婚点心一起分给大家吃。还记得我弟弟满月时，家里也请了不少客人来。我们在电线杆上挂了长长的一串爆竹，劈劈啪啪响了足足有半个钟头。他们还给弟弟头上戴顶小白帽，颈上挂个金锁片。虽然我们不是很富裕的人家，但是爸爸妈妈觉得还是应该热热闹闹地庆贺一番。

“所以你看，我们家还是很注重传统文化的。虽然我已经是第三代华人了，但是许多好的传统我始终还保持着。在美国西南部有着各种文化，有墨西哥文化，印第安文化等。我们生活在美国，当然要算美国人了，但在我们身上还有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我们家的做法是，汲取各个民族的文化，来形成自己丰富多彩的生活方式……这样我们就有了最完美的文化。我们都喜欢这样。”

重男轻女这一传统观念，始终在美国华人中保留着。来到美国后，由于妇女在家庭生活中作用越来越大，情况有所改变。但是，几千年来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根深蒂固，至今难以消除。信

奉基督教的人家，男女比较平等。但是总的说来，男孩子在家庭经济中总是挑大梁的，也更注重受教育。如果家里父母都工作，那么待在家里照看弟妹的准是女孩子。有些女孩子得一直等到弟妹妹长大些后，自己才进学校读书，那时候往往已经是十岁或十二岁了。

孩子帮工

华人家里的孩子，不管男女，从小都得学着干活，帮助父母分担一部分劳动。年龄稍大点时，做的活也更多更重。比如开洗衣店的人家，孩子从小就得学会摺手绢、叠毛巾；大些以后，就学着熨衣服或干些更复杂的活。孩子们在学校里学的英文，很快就超过了他们的父母。因此在家庭与顾客打交道时，孩子们的英文总是大派用场。

有些妇女把做衣服、剥虾仁、做人造花等零星活带回家来做，也都是教孩子们一起帮忙干。等孩子长到十几岁时，就要整个夏天都外出打工了。或进城里，或在附近乡下，干些临时活。孩子们的收入常常是家庭收入不可少的一部分。哈里·周还记得他小时候在加利福尼亚干活儿的那几个夏天：

“爸爸自从残废后就完全丧失了劳动力，因此妈妈不得不一人干两个人的活儿。我们两个孩子那时候刚出世不久。妈妈又没有文化。我们俩总算没学坏。家里的不幸使我俩从小就格外懂事。知道该帮助父母分担些忧患。刚到十六、七岁时，我们就去乡下帮工摘苹果。一天能挣一点二五美元，每年有两个月的活儿可干。从早上六点钟一直干到晚上，才挣一点二五美元，而且还得扣去

吃住费用。当时孩子们都是这样帮家里挣钱的。一个夏天干下来，大约能净挣四十来个美元。挣来的钱，我们总是一分不少地全部交给爸爸妈妈。”

保罗·雷的童年是在美国西北部太平洋沿岸度过的。他记得那儿的华人经常利用当地的自然条件，额外挣点钱，或者弄点吃的东西回家。大人外出干活儿时，总是带着孩子们一起帮忙：

“我是在西雅图唐人街长大的，我家住的那条街叫‘广东巷’……附近许多人家都靠种菜卖菜过日子。我家也不例外。除了卖自己种的菜外，全家——爸爸、妈妈、我和弟妹们——还到不远的地方去弄些水芹回来。那时候西雅图的人口不多，水芹到处长得很茂盛。我们常乘着爸爸的车子出去采，采回来就卖给唐人街上的餐馆或菜店赚些钱。……”

“另外，我们还同别人家一样，常到方特勒罗伊及艾基岬的海滩上去挖蛤蜊。不是为了卖，是自己家里吃的。还到别处海滩上去捞海带。有一种海带可以吃，我们把它洗净后晒干，还可以带一些到中国乡下去。记得还有好几次我跟爸爸和妹妹到半山腰上或者到伦塔附近去挖野姜根，……是做草药用的。”

这些在洗衣店、餐馆、杂货店或者狭窄龌龊的唐人街住房里长大的第二代华人，刚刚出生时，都是家里的宝贝，可是很快父母就指望他们赶快长大成人，懂得孝敬父母，学会本领帮家里挑起担子。郭莉莉虽在家里是九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但也无例外

地从小就得帮着家里干活，

“得学会拣虾，剥虾仁做罐头。我们从小就都干这种活儿。剥一磅虾能挣六、七个美分，我们兄弟姐妹几个都一起帮着剥。白天到店里剥，晚上店关门之后，我们还带回家去剥。也学着剥蛤蜊肉，剥一箱蛤蜊能挣一美元。每箱蛤蜊都是四、五十磅重。我那年才五岁，手都够不到干活儿的长台子，他们就在我脚下垫上两只箱子。干活儿的地方潮湿极了。我就是在那儿学会剥蛤蜊的。”

“七岁那年，我就开始学着做衣服。妈妈在服装厂工作。刚八岁时我就已经会做娃娃罩衫了。”

白天如果哥哥姐姐们都到店里去照顾生意，那么留在家里的弟弟妹妹就没人照看了。这种自小就被丢在一旁、无人照料、缺少爱抚的生活环境，无疑对孩子的成长和身心健康都有很大影响。可这也没办法，因为那种中国式的大家庭结构（孩子都有老人或其他大人照看）在美国这个新的社会环境里是不可能存在的，原因是这时候在美国还只有两代华人。

子女教育

许多做父母的华人都深信，要想改变他们子女的社会经济地位，关键在于受教育。尤其是男孩子的教育，家里特别注重，总是鼓励他们尽量利用免费进公立学校读书的条件，刻苦用功。家长们一心指望让孩子们多受点教育，将来能有更多的选择职业的机会，免得像他们自己一样成年累月地在洗衣店、餐馆和杂货店里从早到晚没日没夜地干。也有的家长希望子女能学些现代化的科

学技术知识，将来好回国去为祖国的现代化作贡献。

与此同时，华人还十分注重让子女有机会学习中国语言和文化。一八八四年，第一所华语学校在旧金山创办起来。随着第二代华人孩子的增多，华语学校逐渐遍及美国各地的华人区。孩子们在“英语学校”放学之后，每天都要再进“华语学校”去学中文。父母还希望他们在两种学校里都要用功读书，都取得好成绩。

许多孩子在小学毕业之后，还被送回祖国继续读中学，再受几年中国的教育。在国内，他们往往同从澳大利亚、古巴和其它美洲国家回来的中国孩子一起念书，重新学习祖国的语言和文化。容爱文(音译)就是归国读书的孩子中的佼佼者。一九〇四年，他通过了竞争性很强的省级考试，并被授予硕士学位。也有不少归国学生后来又返回美国，去接替父亲或祖父的家业。

这些归国读书的孩子回到美国后，都会感到极度的不适应。因为在国内时，他们都是“秀才”，被家里人或保姆娇宠惯了。而回到美国后(一般说来这时候正赶上读高中)，情况却截然不同。在家里，得在父母开的店里从早忙到晚；在社会上，又被当做二等公民对待。

几乎所有的家长都尽力省吃俭用积些钱送孩子回国去读书。这个事实表明，祖国的文化遗产在他们心目中是何等重要、何等珍贵。有朝一日定回祖国——这是许多华人深藏在心底的一个强烈愿望。而把自己的子女送回祖国受教育，正是为将来回去报效祖国做好准备。

许多华人孩子在美国各地的学校里都是白人同伴们歧视和嘲弄的对象。生活在这样一个处处遭歧视的社会里，做母亲的不得不花费大量的心血来教育孩子，让他们保持民族的自豪感。加州第一所华人公立小学教师艾丽斯·冯·余至今牢牢记住她妈妈教

导她的一句话，这也是许多中国母亲教育子女的一句话：“要为自己是个中国人而感到自豪”。

“我在加州一个矿区城镇——华盛顿城——长大。那儿的孩子们对我们可坏啦。一看到我们到学校去，就冲着我们喊脏话。什么‘支、支、支那佬，坐在铁轨上’呀，还出什么‘依唷唷唷唷’等怪里怪气的声音，真能气死人。不过我们根本不理睬他们，因为家里大人告诉我们，‘别去理他们，那都是些野孩子。我们还是尽量对他们好，因为我们比他们文明。’只有想起大人们讲的这些话，才能压住心里的怒火。至今在美国社会里仍存在着‘身份危机’的问题。人们弄不清自己究竟是不是美国人。根据出生，我们自然是美国人。法律上也承认我们是美国人。但是实际上，他们永远也不肯接受我们是美国人这一事实。我们的外表的确跟他们不一样。可是父母和亲人们总是告诉我们：‘肤色跟他们不一样又有什么关系。我们有灿烂的文化，有优秀的传统。要用我们的所做所为让他们知道，我们什么都比他们强。长大以后好好念书，将来回国去好好报效祖国和人民。’所以我心里想的始终是将来如何回去为祖国人民效劳。”

华人的孩子有时候发现，对付种族歧视的最好办法，就是针锋相对地跟他们对着干。学校不单单是个学习读书、写字、做算术的地方，它还是社会的缩影。因此华人孩子从念书的时候起，就学着对付周围的环境，学着为自己在美国社会里争取应有的地位。杰克·唐还记得他在美国西南部读小学时的一段生活：

“年纪大的华人一向十分注重孩子的教育问题。我父亲也是这样。他曾经说：‘我就是累死累活，也要挣钱供你们念书。你们要是不能比他们更强，至少也要跟他们一样。只要念书比得过他们，将来就能在社会上站得住脚。用不着去跟他们打架。’

“我那时也有个倔脾气。听到墨西哥人喊我中国佬，就气炸了肺。现在想起来，觉得何必跟他们生气。我就是中国人，你能怎么样！可是若有人叫我支那佬，那可不得另当别论。我不爱听别人这么叫我，纯粹是侮辱人。不管谁这么叫我，我都要给他点颜色看看，好好教训他一通。

“我还记得中学里发生过的一件事。一天，上课的时候，一个家伙走过来问我一道题该怎么解。他冲着我说：‘喂，支那佬，这道题你是怎么做的？’我顿时跳起来狠狠教训了他一顿。老师走过来问我：‘怎么回事？’我说：‘他要我帮他解一道题，我现在就用‘支那佬’的办法来教他。’”

有家难团圆

有些美国华人，终生只能把自己的亲人留在记忆中，藏在心坎里。他们忠实地履行着自己的义务，按时往家寄钱，养活妻儿和双亲。也有少数华人，自知这一辈子是无论如何没有能力把妻室接来美国了。万般无奈，只好跟美国的墨西哥妇女、夏威夷妇女或印第安人妇女成了家。所幸的是，他们的文化传统往往有许多相似之处。比如说，印第安人与华人对于人的今生与来世都有

着共同的信仰，对于家族或部族也都十分敬重。这就使他们能够相互沟通、彼此尊重。他们之间通婚人数之多，以及他们的子女往往继承着父母双方最优秀的传统这一事实，就足以证明他们的文化是相通的。

也有些华人一直等到美国移民法律有所改变之后，才把别离多年的妻室接来美国。比如亚利桑那州的食物商方兴桑（音译），就曾与他的发妻被阻隔在大洋两岸，熬过了三十四个漫长的春秋。这是他沉痛的回忆：

“我是一九一七年回国去成亲的，直到四十年代，他们才改变了移民法，允许华人做美国公民。我申请了五次，才拿到一张公民证。等到把妻子接来美国，已经是一九五一年了。三十多年哪！我回去过七趟，生了五个孩子，但是一个也没活下来。有的是因为难产，有的是生了病死去的。我这一辈子呵，太苦啦。三十多年来，她在家乡独守空房，而我，孤身一人流落异乡。”

唐人街的变迁

随着唐人街单身汉社会的败落，那些当初主要是为光棍而开设的烟馆和妓院都相继关闭，但赌博之风依然未减。烟馆和妓院一关闭，堂会的势力也大大削弱，因为它失去了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一向不断骚扰各地唐人街的堂帮械斗，也最终在商会和家庭的舆论谴责和压力之下，通过签约修好的办法宣告了结。

随着家庭的不断增多，唐人街的社会面貌也起了巨大的变化。无数乐融融的家庭，取代了昔日孤寂冷清的单身汉社会。家庭，

这时已成为华人社会结构中最现实、最基本的成分。随着时间的推移，唐人街上的行人中，人们看到的是越来越多的已婚妇女与怀中婴儿。那些标志着十九世纪唐人街那段历史的拖着长辫子的男人与裹着小脚的女人，则已在逐渐消失。

唐人街的这一代新人，为了改变华人在美国的形象，为了回击和驳斥社会对华人的诽谤——什么“华人不是婢女便是堂帮打手或者大烟鬼”云云——曾经作出过不懈的努力。因为他们意识到，假如他们要在美国安身立命，要在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那就一定得建立起稳定的社会秩序，树立起民族的尊严。一九一一年满清政府的垮台和中华民国的成立，曾在华人心中再度唤起了对祖国的无比自豪，并在全美国华人界里激荡起强烈的民族主义感情。他们多么希望一个强盛的中国能跻身于世界强国之林；多么渴望祖国能为她的海外儿女争得尊严。

第六章 本世纪前半叶的回顾

孙中山先生的业绩，不仅永载中国和世界史册，而且在海外华侨中也妇孺皆知。在老一辈旅美华人的心目中，孙中山既是一位革命先行者，又是一位播火者。他不仅与他们有着同样旅居海外的生活经历，而且在他们心中点燃起了建立强大新中国的希望之火。当二十世纪初叶蓬勃发展的革命形势日益迫近之时，他们曾经在物质与道义上给予了这场革命以无私的援助。

孙中山先生于一八六六年出生于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县)。他的村子就坐落在澳门以北三十英里的地方。十九世纪后半叶，澳门一直是华工移居海外的一个重要集散港口。孙中山幼年在家乡读书，接受启蒙教育。他有一个叔叔曾经参加过太平天国起义。小时候他常听这位叔叔讲述太平天国的故事，所以从小就对太平天国的领袖十分崇拜。一八七九年⁽¹⁾在他十三岁时，就被送到夏威夷去找他的哥哥孙眉。哥哥当年也是按照华人移民的传统做法由另一位亲戚带到夏威夷去谋生的。孙中山在这里，面对着一个

(1) 根据胡绳著《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一书和纽约《北美日报》发表的关于孙中山与哥哥孙眉的故事一文，孙先生去夏威夷应是一八七八年。
——译者

崭新的知识世界，潜心读书。在一所教会中学读书的三年期间，他开始接触到西方的民主思想。这些民主思想后来在他创建新国家的理想中都有所体现。

据说孙中山在回到家乡翠亨村后，把村里一尊道教偶像给砸了。因为在他看来，这尊偶像是迷信与压迫的象征，而迷信与压迫恰恰是他新的基督教信仰与创建民国的进步思想的两个大敌。他这一举动，在村子里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也许是因为这个缘故吧，他被送往香港一所医学院读书，打算在一个英国教会医院里当内科医生。在香港期间，他结识了不少反对清政府的爱国志士，并且常常与他们一起探讨关于组织革命团体的想法。这促使他最终放弃了从医的打算，开始了革命生涯。一八九四年，孙中山在夏威夷建立起兴中会。此后若干年里，他又陆续在世界各地华侨中建立了十五个以上的分会。这个遍及世界各地的秘密社团组织的成员，都是矢志为促进中华民族的繁荣与富强而献身的仁人志士。

一八九五年，兴中会试图在广州举行起义占领省政府的第一次革命行动失败了。孙中山的几位同志不幸被捕并惨遭杀害。孙中山得以幸免，逃往海外。在这之后的数年内，作为流亡中的中国革命运动的领袖，孙中山先生又在欧洲和日本等地继续从事政治与社会理论的研究，并在亚洲和美洲进一步加紧组织革命力量。比如，他在美国建立的组织曾经发行过一次公债，为革命筹募军饷。公债券面上印有青天白日旗帜的图案，面值均为当时中国流通货币的十元，革命成功后可以兑换成十元美金。此外，他们还利用旧金山和夏威夷出版的中文报纸推动这项运动。

改良运动

事实已越来越有力地证明，中国传统的王朝制度是无力对付

内乱外患与天灾人祸所造成的种种社会矛盾的。自十九世纪九十年代至二十世纪前十年，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活跃着改良派与革命派两股政治势力。以康有为和梁启超为首的改良派，于一八九八年企图通过光绪皇帝的力量，变中国的君主专制制度为君主立宪政体，并提出了一套促进中国现代化的纲领。年轻的光绪皇帝接受了维新主张，随即颁布了旨在整顿官府腐败、改善中国经济、教育状况和政府机构的数十道除旧布新的诏书。但是慈禧太后为了镇压这次变法，发动了一次宫廷政变，废除了皇帝颁布的一切诏书，处死了一批改良派人士，并幽禁了光绪皇帝本人。

当时日益深入人心的反对外来入侵的观念，按理讲也应该包括反对满清在内，因为满族对汉族来说也是异族。在各地起义此起彼伏的形势下，满清政府能否维持其摇摇欲坠的统治，显然完全取决于它随应时势的能力。果然，在一九〇二年，慈禧太后提出了一些所谓变法主张，并试图推行一八九八年曾提出过的若干主张。教育便是这次变法中的一个最重要的领域。全国上下开始推行一种新学制，其课程内容是中、西方教育思想结合的产物。一九〇五年又进一步废除了科举制度。大批中国学生纷纷出洋留学，去学习祖国现代化所需要的各种科学技术和经济知识。当时赴日留学的人数最多，也有相当一部分人去美国攻读大学。自一九〇一至一九二〇年间，赴美留学人数为两千四百名，而一九二一至一九四〇年间，则高达五千五百名。

数以千计受过西方教育的留学生回国之后，都在他们各自所学专长的领域里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例如一九一八年毕业于耶鲁大学的晏阳初先生，回国后便投身于河北省定县的农民扫盲运动。到三十年代中期，他所从事的平民教育运动已取得显著成绩。

孙中山与国民革命

然而，改良运动远远不能解决中国社会日趋严重的问题。孙中山与他的同志们在一八九五年广州起义失败后，继续在国内外交集力量，准备新的革命行动。一九〇五年，孙中山首先在日本的华侨中建立起革命的中国同盟会，继而在新加坡、布鲁塞尔、旧金山、檀香山、广州和湖北等地建立了支部。孙中山经常以各种身份作掩护，奔波于海内外各地，努力从事革命宣传，以把国内外同胞团结在他的三民主义旗帜之下——民族主义（驱除鞑虏，反对满族统治）、民权主义（推翻封建帝制，建立共和政体）及民生主义（平均地权）。

二十世纪以来，海外华侨中的改良派与革命派之间出现过多种分歧。各派报纸和组织之间也展开了激烈的“笔战”，而且双方都赢得了自己的一批支持者。是孙中山先生在美国各地进行的多次演说，才使敌对的双方团结在他的民族主义旗帜之下。虽然开始时美国和其它地方的华侨对孙中山的主张曾有过怀疑，但最终都成了他最热烈的拥护者，并纷纷以慷慨捐赠的行动给了革命以巨大的支持和鼓舞。部分旅美华人甚至组织了军事训练，准备一旦需要，便参加革命军作战。

二十世纪前十年内，中国各地革命力量曾先后十次试图举事、夺取政权，但均遭失败。到一九一一年时，人们的情绪已怒不可遏，革命形势迫在眉睫。终于在这年十月十日，爆发了武昌三千名新军将士的武装起义，迫使当地满清政府官员纷纷逃离武昌。革命军这一义举立即得到了全市自发反满势力的支持。虽然当时同盟会成员没有直接参加十月十日的武昌起义，但是他们很快便在全国各地组织动员起革命力量，支持和响应这次起义。到十二

月时，中国南方和西北一些省份也相继脱离了满清政府，宣告独立。

中华民国的诞生

一九一二年一月，南京临时政府宣告成立，孙中山先生就任临时大总统。消息传来，全美华人无不欢欣鼓舞，奔走相告。在纽约，孙中山所领导的“少年学社”组织了一次两千人的庆祝大会。纽约唐人街居民涌上莫特街、佩尔街和多亚街，夹道观看并热烈欢呼唐人街上青年的游行队伍。青年们手里高举着玩具枪支和崭新的中华民国国旗。与此同时，在旧金山、芝加哥、洛杉矶和其它各地，庆祝活动也达到了高潮。连孙中山先生的哥哥孙眉所居住过的那个偏僻幽静的小山城库拉毛伊，也沉浸在一片狂欢之中。威利·方曾经这样回忆道：

“他们当年就在这条大街上游行，然后再从那边返回到会址去。足足有两英里长的路。游行队伍刚好从我家门口走过。你知道吗，队伍中有吹唢呐笙箫的，有打锣敲鼓的，欢声雷动，锣鼓喧天，好不热闹！他们走过门口时，我们还放烟火爆竹一起助兴哪。大伙儿高兴极了，全都卷入了游行庆祝活动。还赤着脚呢！那会儿，大伙连鞋子都没有一双！”

正在人们兴高采烈欢庆胜利的时候，北京满清政府却在阴谋通过袁世凯来反对革命力量。当时孙中山先生虽已出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但是他表示，只要袁世凯肯与他合作，他愿辞去此职。同年二月，待袁世凯迫使清皇朝退位之后，孙中山便立即将

总统职位让给了他。

袁世凯一上台，便醉心于独揽军权，而对于国民振兴中华的呼声则完全置若罔闻。一九一六年袁世凯死后，中国立即出现了军阀混战时期（一九一六至一九二八年）。这个时期里，全国到处是军阀割据，各军阀在农村大肆劫掠，抢财夺粮，横征暴敛，致使全国重又陷入一片混乱之中——贸易中断、鸦片泛滥、铁路失修、灌溉瘫痪、水涝成灾。军阀们只知保全其自身利益，全然不顾民众死活，国人继续在贫困与灾难中挣扎。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并没有在中国建立起一个有效而稳固的共和体制，民族主义与反帝思想也还没有真正为人们所理解。显然，当时把辛亥革命党人团结在一起的唯一力量，看来仅仅是推翻满清皇朝这一共同的愿望。

北洋军阀占领北京后，成立了北京政府。它立即得到外国政府的承认，因为他们意识到，这个软弱无能的政府将有助于维护他们在中国的利益。而对于孙中山在袁世凯出卖革命之后于一九一七年在广州所组织起来的护国军政府，西方列强却不予理睬。孙中山继续努力向国民宣传他的三民主义思想。当时在西方国家中，苏联是唯一赞同孙中山先生主张的。到一九二三年时，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已发展成为“反帝”思想。遗憾的是，在他还没有来得及进一步制定并重申他的革命计划时，孙中山先生便于一九二五年与世长辞了。

由孙中山所创建的中华革命党改组而成的国民党，于一九二七年经历了一次政治大分裂，导致了一场十年内战。以蒋介石和国民党内非共产党支持者为一方，以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为另一方之间的十年内战，对于旅美华人的政治生活及华人社区的政治力量所产生的影响巨大而又深远，至今依然可见。只是由于日本

军国主义入侵的威胁，才使这两股敌对政治力量之间的斗争一度暂趋缓和。

侨胞支持抗战

一九三七年，日军入侵华北，中国抗日战争就此爆发。旅美侨胞在“美国华侨统一义捐救国总会”的领导下，立即在美国各地组织起来，积极投入了支持抗战的爱国运动。他们通过义演、义卖、捐款、捐寒衣等形式，为抗日军队和难民筹集款项，支持抗战。整个八年抗战期间，旅美侨胞为抗日共募捐了五千六百万美元。此外，侨胞们还在美国各地发起“一碗饭”募捐活动，赈济抗战及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灾民。

与此同时，旅美侨胞还开辟了另一条战线。在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他们在美国各个重要港口设置纠察线，抗议美国公司向日本出售和运输废钢铁以及其它物资。此外，他们还向国会议员、政府官员和报社投书，呼吁抵制日货。下面便是一例：

“民主国家的公民们该用什么办法来制止日本侵略者的野蛮暴行呢？至少有一件事我们可以做，那就是用抵制日货的行动来表示我们的抗议……不许日货上岸，不许美商经营日货。

“阻止美国向日本侵略军出售汽油、石油、飞机、废钢铁和其它一切军用物资。请把这封公开信在您的朋友中间传阅、散发。

为了正义与和平

孔长初⁽¹⁾(音译)”

(1) 这是孔长初于一九四〇年一月十八日在檀香山散发的一封公开信。——作者

艾丽斯·冯·余曾经这样回忆当年旧金山华侨青年带头参加抗日救亡运动的情景：

“我那时候在唐人街工作，我们全都投入了抗日救亡运动，忙得很哪。还组织过各种抗议活动。记得有一次，大伙儿穿着棉线袜子参加游行，抵制日本丝织品，抵制日货。没有一个人穿丝袜子，因为那都是日本进口的。大伙儿手举抵制日本丝袜的标语牌，脚上穿着棉线袜，虽然粗糙得很，可我们全不在乎。

“我们还搞‘一碗饭’服装表演，展出中国各个朝代的古装服饰，青年们还表演舞蹈，进行义演募捐。当时这一类活动很流行。回想起当年的情景，不禁对青年人充满了敬佩。只要给他们机会，他们能发挥多大的才能啊！年纪大的人也相信我们的本领——写呀，演呀，帮助青年人搞各种表演呀，等等。我们甚至还乘着包车去其它各个小城镇搞演出呢，像圣马特奥、瓦列霍、格拉斯谷等地方都去过。”

华人日趋同化

投身于抗日救国运动的这一代华裔青年，大部分都从未到过中国，可是他们却把中国称为祖国。说来也许有些奇怪，本来这一代青年完全有权利把美国称作是自己的家，因为他们所接受的大多是美国主流社会文化的影响。在他们的全部生活中，不管是在学校里还是从报纸、广播、电视上，所学到的也全都是美国的一套思想与观念。

为了能跟他们的美国同伴相处，这一代华裔青年一味追求美国中产阶级的价值观念。结果，他们的父母（第一代美国华人）都

吃惊地发现，在这些孩子身上中国的传统文化已经丧失殆尽。家庭里经常出现两代人之间的冲突。对于这一现象，在华裔美国作家刘裔昌⁽¹⁾和黄玉雪⁽²⁾的笔下都有所描绘。美国人所崇尚的那种独立自主、敢作敢为和富于进取的美德，与他们父母亲所信奉的那一套儒家守旧观念，完全是格格不入的。

两代人的矛盾最突出地反映在男女约会和婚姻问题上。孩子们都不肯接受父母给安排的婚姻，坚持要自由恋爱，自己选择配偶。下面是内奥米·钟的一段回忆：

“记得姐姐十八岁那年，家里来了一个说媒的。说什么某某人想娶个媳妇，还说什么他的职位相当不错等等。我父亲是个中国人，姐姐又到了该嫁的年龄。我们那个小镇的周围没有中国人家，而父亲又偏偏希望我们能嫁给中国人。反正我记得当时有人想娶我姐姐。可是姐姐呢？本来就少言寡语，现在知道了这件事，又气又恼，常常暗自流泪，身体也垮了。再说，我们那时候的想法已经相当美国化了。姐姐常常赌气地冲着父亲喊：‘请您别管我们的婚事好不好！’结果那桩婚事自然没有成功。到我长到十八岁时，又有人来说媒了。我干脆告诉父亲：‘爸爸，您就别再为我操这份心了。’到这时候，父亲总算明白了，我想这时候纽约唐人街的所有华人都意识到了，想再为子女包办婚姻是无论如何也行不通了。”

(1) 刘裔昌的英文名字为Pardee Lowe。——译者

(2) 黄玉雪的英文名字为Jade Snow Wong。——译者

这一代华裔青年，为自己创造了一套特有的美国生活方式。他们衣着入时、紧随潮流。身穿时髦的衣裙或浣熊毛皮大衣，又能讲一口地地道道的美国俚语。他们是美国电影的忠实观众，无比迷恋瓦伦蒂诺⁽¹⁾，也都是克拉克·加布尔与卡罗尔·隆巴德等好莱坞影星的狂热崇拜者。从跳舞到体育运动，从时髦的衣着到最新式的车型，他们无一不效仿白人同伴，亦步亦趋。玛丽·沈还记得当年她们那个城市里华裔青年的各种社交活动：

“我刚来休斯敦时，青年们经常聚会的一个地方是市内那个玩保龄球的球场。那时候虽然我们家家也都有自己开的冷饮食品店或者杂货店，但是只要有朋友从外地来到休斯敦，大伙儿总是一起到玩保龄球的那个地方去聚会。人很多。我们全都会玩保龄球。结束后要是时间还早，比如才晚上六、七点钟，便总会有人提议晚上再接着去他家一起跳舞。于是大伙儿便会拥到他家去，跳袜子舞。什么叫袜子舞呢？就是只穿袜子不穿鞋跳的一种舞。有唱机和唱片伴奏。还会有油炸土豆片、三明治以及各种饮料茶点招待。大伙儿常轮流到各家去跳舞、聚会。爸爸妈妈也总是带着一起张罗招待客人。”

华人青年从小就懂得，长大之后应当跟华人恋爱、结婚。爱德华·王与埃米莉·王回忆道，当年在美国南方时，虽然大家离

(1) 瓦伦蒂诺是美国无声电影时代的著名男演员，二十年代时尤为出名。——译者

得很远，但是男女青年仍然经常聚会：

埃米莉：“他们并不给你物色对象。但是你心里都很明白。

我还在很小的时候就知道，长大了要跟华人结婚。”

爱德华：“大约在三十年以前吧，可能是二十二岁左右，我们都是青年人了。那时候还同在中学读书时代一样，美国南方的种族歧视现象仍然相当严重。我们只能跟其他的华人孩子交往，因为白人孩子不肯跟我们来往，我们把他们看作是所谓‘圈外人’。虽然我们跟其他孩子一样进中学读书，在学校里也不错，可是到下午三点钟一放学，就是两回事了。另外，父母也一再嘱咐我们，长大了无论如何要跟中国人结婚。那时候，我们这些华人孩子常常聚在一起开舞会。”

埃米莉：“在密西西比州，不管哪儿有什么盛大聚会，华人青年都会从全州各地远道赶来参加。”

爱德华：“记得那时候，我们常常星期六驱车从圣安东尼奥一直开到新奥尔良或休斯敦，去参加那儿的周末舞会，还要连夜再赶回家去。后来我在读口腔学的时候，就已住在休斯敦了。那会儿，圣安东尼奥也常有舞会，而且都在星期日晚上，因为星期六家里开的店还得开门营业，只有星期天才休息。我们常常中午出发，驱车一直到下午五点钟才能到那儿。先在某个朋友家里洗个澡，接着就去参加舞会，一直跳到深夜一、二点钟离开那儿驱车赶回休斯敦。第二天早上八点钟还得赶到学校去上课呢。”

一般说来，华人的就业范围很有限，不是自己家里开店经营，便是在某些服务性行业里找点工作，因此家庭经济常感拮据。而他们的子女，因为受报纸、广播、电视以及白人同学的影响，往往梦想将来能有一个较优裕的生活环境。玛丽·沈这样回忆道：

“那时候，看橱窗成了我们的一种课余爱好，因为我们很喜欢橱窗里摆的商品，可是又买不起。虽然知道同伴们身上穿的那种衣服我们是没条件买的，但是还是爱带着羡慕的心情到市内去逛逛，看看橱窗。于是课余看橱窗便成了我们的一种消遣。”

寻求美国之梦

按理说，华人移民的子女一出生就应该是合法的美国公民了。但是他们的肤色却使他们无法享受到跟白人平等的权利。虽然越来越多的华裔青年都能读到大学毕业，都有能力利用自己的才智与专长对美国社会作出贡献，然而走遍偌大一个美国，华人大学毕业生竟找不到一个能够发挥他们业务专长的工作。在职业市场上，他们总是受歧视，竞争不过白人。万般无奈，这些从化学、物理、工程专业毕业出来的大学生，最后只得被迫进了餐馆、洗衣店或杂货铺。也有的人设法积些钱在唐人街上自己开业做生意，除此再也没有别的出路了。戴维·金曾经在纽约开过一家洗衣店，他这样谈到华人当年就业的艰难：

“那个时候，纽约的华人唯一能找到工作的地方是洗衣店。用美国人的话说，华人只配当洗衣工。也有在餐馆工作的，但不像如今那么普遍。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

之后，情况才有所好转。在那以前，哪怕你受过高等教育，也找不到任何别的工作。记得有个华人，是哥伦比亚大学的毕业生，照样找不到工作。那是一九二九或一九三〇年前后的事了。结果他只好在唐人街闲待着，一事无成。哪儿去找工作呢？他们根本不理你，压根儿就不把你放在眼里。你有什么办法？因为这个人也是哥伦比亚大学的毕业生，硬是不肯在洗衣店或者餐馆里混日子。那个年月，还不如不读书的好。索性没有文化，倒也情愿一门心思闷头干活儿。”

华人妇女有时候能在大酒家或者旅馆里找到工作，一般是在衣帽间当女招待，或是开电梯、卖香烟。也有当舞女的。在老板们眼里，华人妇女能为他们的生意增添某种异国情调，因此往往愿意雇佣一些长得标致的华人妇女，还要用中式服装把她们打扮起来，以招徕顾客。因为在一般美国人心目中，华人妇女的脸庞儿要用华人的服饰来衬托，方能显出她们的姿色和风韵。

少数人有幸能在唐人街以外的美国公司里找到工作。不过这些人也有他们的苦衷，往往被夹在两种世俗观念中间，陷入左右为难的处境。比如埃米莉·刘就曾这样讲起她二十年代末在旧金山一家保险公司当职员的情景：

“这里有各种偏见。白人排斥我，华人又妒忌我。怀疑我怎么会在美国人开的公司里找到工作。其实我是在天主教会的帮助下找到这份工作的，也是最早在这个公司里工作的华人妇女之一，不管人们信不信，就是这么回事。后来，我还逐渐把一个又一个中国女孩子介绍

到这家公司来。说起这家公司的种族偏见，也有点怪。他们一概不雇佣黑人、犹太人和天主教徒，但是却收华人。不过华人虽然能进这个公司，但日子终究不好过。后来在大萧条的那些年里，有的白人就当着面对我讲：‘你有什么资格在这儿工作？按理说你只配在唐人街上当洗衣工。’”

少数华人美术家、作家和演员，则利用他们的民族文化特长来谋求职业。不过他们是否受欢迎，往往取决于他们能否创造出一般美国公众所期望的那种华人形象。比方说，当演员的常常得装出一本正经的样子来模仿孔夫子的说教。当年梁宏（音译）和他的“中华四重唱”演唱小组就是一例。一九二一年，当梁还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读书时，就被邀请参加了第一个华人四重唱演唱小组，并且进行巡回演出。下面是他的回忆：

“我们先是在旧金山各地表演，后来又去了檀香山，在‘自由大戏院’演了一段时间。回来后，经理认为我们这个班子足以轰动百老汇大街，于是就带我们去了纽约。……谁知到了那儿，没人相信我们能演得好。所以他们根本不理我们经理的话，就把我们打发走了。

“最后，总算有一个爱尔兰经理开口了，说‘好吧，我来雇你们一次……不过只能签一个礼拜的合同，去布法罗演出。’

“于是我们去了布法罗。结果出乎我们的预料，也出乎所有人的预料，我们在那儿居然真地成了轰动一时的人物。他们把我们的演出称作‘红极一时’。那位经理

说，‘演出开始后，他们曾一度不得不中途停下来，因为没有人听得懂他们在唱什么。’我们赶紧说，‘也许你们不喜欢中国歌，下面我们就来支美国歌，你们可能会喜欢的。’

“灯光渐渐暗了下来”……你知道吗，整个剧场鸦雀无声，静得连一根针落地都能听得清清楚楚。听众们都屏息想听一听这些唱‘古怪中国歌’的人是如何来唱和谐动听的‘中国布鲁斯’的。……结果，一曲唱完，四座皆惊，整个剧场沸腾了起来。嘿！他们做梦也没想到我们会唱得这么好。自那场演出之后，场场成功。于是我们作为世界上第一个也是独一无二的华人四重唱演唱小组，在美国和加拿大一直演唱了十四年。都是一帆风顺。”

另外还有一些华人，凭借他们的才能和机遇，在事业上成了出类拔萃的佼佼者。黄宗霁⁽¹⁾便是一例。自二十年代一直到一九七六年他去世前的半个世纪里，他在电影摄影艺术方面的造诣，使他的名字成了好莱坞电影摄影技术的同义语。早在一九一七年，他曾经在洛杉矶唐人街上看过几次拍电影的场面。后来他在“拉斯基名星电影制片厂”里找到了一份工作，当扫地工人，每周薪水十美元。不久，就被提升为助理摄影师。继而又在女演员玛丽·米尔斯·明特的坚持下提升为电影摄影师，原因是这位女演员对他的摄影艺术十分钦佩，除了他之外拒绝跟任何摄影师合作拍片。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间，黄宗霁一步步攀上了艺术的顶峰。在他五十二年的电影摄影生涯中，他曾先后与好莱坞一流名导演巴斯

(1) 黄宗霁的英文名字是James Wong Howe。——译者

比·伯克利、马丁·里特以及约翰·斯特吉斯合作，共拍摄了约一百二十部故事影片。一九五五年拍摄的《玫瑰文身》与一九六四年拍摄的《赫德》两部影片，使他两次荣获奥斯卡金像奖。斯特吉斯曾赞誉他为“电影摄影界最伟大的艺术大师。”不容置疑，美国电影事业能取得今天的成就，与黄宗霭富有现实主义洞察力的摄影艺术是分不开的。

回中国去——这是第二代华裔青年经常谈论的一个话题。他们在大学里所选的课程，如工程学、医学、营养学、教育学以及各门理科课程，也都对将来报效祖国直接有用。虽然他们极少有人到过中国，但却经常谈论“回去”的事情。他们对中国的了解是通过多种渠道的——他们的父母、华语学校、与国内亲友的书信往来、报纸上的介绍以及与中国留学生的接触。这些留学生对祖国的无限深情，常常强烈地感染着他们。由于这一代华裔青年在美国处处感到遭歧视、受排挤，因此他们（尤其是受过大学教育的青年）备加渴望有朝一日能回国去为祖国的现代化事业献身。事实上，他们中不少人已与中国赴美留学生一起返回了祖国，或者回到国内的大学里继续深造。

在美国长大的华人学生与从中国来的留学生，经常在校园内促膝畅谈中国的未来。华侨学生基督教联合会及中华基督教青年联合会等组织，每年都在美国东海岸的银湾和西海岸的塔合湖地区举办联谊会。这些活动促使美国出生的华裔青年与中国出生的青年学生之间建立起一种志同道合的友情。下面这封于一九四六年写给《国民》杂志的信，虽然其作者来自夏威夷、美国和中国三个不同的地方，但它却表达了这些青年渴望建立一个富强的新中国的共同愿望。

“亲爱的先生们：

连日来美国报刊所连接不断报道的关于中国内战的消息，使我们这些在美国读书和工作的中国青年无不忧心忡忡。这不仅因为内战将意味着我们国内的亲人将要蒙受多年的苦难，而且因为报纸上某些自相矛盾和不可靠的报道有可能使我们失去美国人民的友情与谅解。

我们认为，报纸对于中国国内冲突的不可避免以及对中国的分裂这一面强调得过多；而对于如何尽快找到一条合理公正的途径来解决国内矛盾，并且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民主政府这一全国人民的基本愿望和共同心愿，却报道得太少……。

我们相信，我们下面所重申的这几个观点，是代表全国人民的真诚愿望的，不管他们属于哪个党派：1) 中国必须统一……；2) 中国一定要民主……；3) 中国一定要维护国家主权，绝不屈从于任何外国的军事侵略与经济控制；4) 新政府务必要致力于改善人民的生活。

珍妮特·钟、梅·殷、
埃德温·郭、韦林顿·李、
谢利·马 敬上”

争取平等权利

第二代美国华人发现，他们在美国出生这一事实，并不能确保他们同其他美国人享有同样平等的权利。在种族歧视被合法化了的一个很长的时期内，华人曾多次提出抗议，为改变自己的境遇进行过长期不懈的努力。早在一八九五年，林华耀、林藻基和

吴根⁽¹⁾三位华人就组织了一个叫做“同源会”⁽²⁾的团体。目的在于维护在美华人的权益。该团体总部设在旧金山，后来又发展到其它各个城市。一九一五年时，同源会的英文名字改为 CACA⁽³⁾。作为美国华人民权运动的先驱组织，同源会曾经对各种歧视性的排华法案以及在学校和其它公众场所出现的种族隔离现象进行过坚决的斗争。同源会的宗旨是鼓励美国华人采取积极行动，通过参加选举和要求民主权利等途径，为自己争得在美国社会中应有的地位。

还有许多华人为争取经济权利也进行过多次斗争。一九二九年，旧金山的洗衣业工会“西福堂”就曾组织过两千多名会员举行了为时一周的大罢工，关闭了旧金山所有的洗衣馆。这次罢工使工人们争得了每天工作十一小时的权利。一九三三年成立的“纽约华人洗衣工联合会”（其成员发展至三千二百余人）也曾为反对各种排华法案进行过多次斗争。在本世纪三十年代美国经济大萧条时期，华人还加入了美国失业大军的行列，共同参加各种游行示威，迫使美国国会通过了“全国复兴法案”。一九三四年，“华工中心”还参加了旧金山市的总罢工，几乎关闭了唐人街上全部的商店和企业。这一维护工人阶级大团结的举动，大大加快了华裔工人加入美国工会组织的进程。

在一九三七年大萧条时期，得克萨斯州曾经企图把华人排挤出食品杂货行业。但是圣安尼奥的华人界立即组织起来坚决进行

(1) 林华耀、林藻基和吴根的英文名字分别是 Water U. Lum, Joseph K. Lum 与 Ng Gunn。——译者

(2) “同源会”的英文名字是 Native Sons of the Golden State。——译者

(3) CACA 的全称是 Chinese American Citizens Alliance。——作者

抵制，使这次排华阴谋遭到了失败。罗莎·唐·吴曾经代表华人食品商向州参议院提出一项措词激烈的声明。这项声明当时成了报纸的头条新闻。她跟中国领事以及一位美国墨西哥人代表所一致抨击的那项州议案，规定在得克萨斯州只有美国公民或者有可能成为美国公民的外侨才享有财产所有权。她提醒州参议员们不要忘记，当年正是华工(包括她父亲在内)为美国修筑了铁路，从而大大地促进了美国经济的繁荣。

她义正词严地向州参议员们指出：“当年在这儿修铁路的华工有一千二百多人，而如今这个州只有七百名华人了。我们现在就是代表这七百名华人说话的。”当提出这项州议案的参议员富兰克林·斯皮尔斯告诉她说，作为一名华裔美国公民她可以跟他享受到同等权利的时候，她驳斥道：“不错，我知道我有这份权利，但是我也没有忘记我的血缘。任何人根据我的肤色可以一眼就断定我是个华人。你们如果通过了这项议案，那么将来我若想租一份地产，你知道我得经过多少周折、得费多少口舌吗？你要明白，并不是人人都知道我是美国公民。”

在辩论过程中，吴还进一步指控圣安东尼奥的美国联号商店是这项限制华人企业发展的议案的炮制者。最后，华人在这次反对“外籍人土地法”议案的斗争中，不仅取得了胜利，而且杜绝了类似事件在其它各州重演的可能。

旧金山学校里的种族隔离现象由来已久。早在一八五八年，加州公立教育部门负责人安德鲁·莫尔德就提出要把黑人、华人和印地安人的子女一律驱出公立学校。两年之后，加州便通过了一项立法，规定为非白种人孩子另设学校。但是该立法对于为华人孩子另立学校一事，却只字未提。多年来华人一直要求为自己的孩子开设学校，但是这个问题始终未得到解决。直到一八八五

年，一名华人就他的八岁女孩要求进泉谷公立小学读书一事向法院提出起诉，法院作出了对原告有利的裁决之后，才迫使加州修订了原立法，同意专为华人孩子另设学校。于是“华语小学”迅速开办起来。这就是现在的克莫道尔·斯托克顿小学。这所小学至今仍是旧金山华人区的一所主要的华语学校。

二十世纪初，旧金山某些华人曾为取消学校内种族隔离现象作过多次努力。一九〇二年，王希(音译)博士就他女儿被从克里曼小学开除一事，向法院对教育部门提出起诉(这所小学比华语学校离他家更近)，但是被法院驳回。一九〇三年，旧金山一部分华商再次向州一级立法机关呼吁，要求结束学校种族隔离现象，结果也没有成功。

学校种族隔离现象直到以后几十年内随着公众舆论对华人看法的逐步改善才渐渐消除。这里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在加州某些小城市里，要维持专为少数华人孩子所开设的小学，费用太昂贵。于是华人小学与白人小学便逐渐合并起来。看到这一做法并没有引起什么乱子，慢慢地，越来越多的学校也都合并了起来。许多大城市也都跟着这样做了。不过，直到本世纪三十年代时，某些地方的排华分子仍然坚持反对华人与白人学校合并。

密西西比州便是一例。那儿的华人孩子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始终被排斥在公立小学之外。彼达·林·陈曾这样回忆当时华人孩子受排斥以及她父亲为此上告最高法院的情景：

“我出生在密西西比州迪诺特镇。哥哥和姐姐也都在那儿出生。在我进罗斯代尔的一所小学读到三年级时，密西西比州定出了一条法律，不许任何华人孩子进该州的小学读书。原因是这样的：当时在密西西比州克利夫兰

市，一部分华商开了一个食品批发店。白人发现在经营上不是华商的对手，于是出自职业上的妒忌心，或者随便你怎么称它吧，便做出了那个决定。按照这条法律，非白种人都得为自己的孩子另设学校。

“接着，他们就通知我们不准再去学校读书了。爸爸不服气，到法院告他们。花了一大笔诉讼费，一直告到美国最高法院。可是最高法院竟又将这件诉讼案退回州法院去裁决，声称各州有权决定允许哪些孩子进他们的公立小学读书。官司打输了，我们只得离开密西西比州，搬到了阿肯色州去。后来我是在阿肯色州读完小学的。”

在美国所蒙受的种种不平，曾经促使年青一代华人考虑将来回到中国去，回到他们祖祖辈辈生活过的那遥远的国土去。然而，二十世纪前半叶国内动荡不安的政治局势，却又迫使他们打消了这一念头，不得不寄人篱下在美国继续待下去。内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再一次的革命将会给中国、给唐人街带来多么巨大的变化。中国啊，祖国！随着岁月的流逝，你的形象也幻影般地变得模糊了，淡远了。

第七章 历史性的转折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是美国历史上具有多重含意的日子。对于美国政府和绝大多数美国公民来说，日本偷袭珍珠港事件是美国对日本和其他轴心国宣战的强大动员令。对于日裔美国人来说，它意味着一场灾难。从此，大批在美国的日本人遭到肆意监禁。而对于美国华人来说，美国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则给他们创造了一系列的有利条件。现在回想起来，这些条件为华人作为一个少数民族进入美国社会和取得自身发展，带来了重大的转机。

美国大规模的军事动员，造成了国内劳动力的不足；战时工业的发展，更加剧了对劳动力的需求。数十年来一向对华人紧紧关闭的工厂大门，今天终于对他们敞开了。美国和中国现在又结成盟国，并肩作战反对共同的敌人。因此，成千上万的华裔美国青年被造船厂、飞机制造厂和其他各种工厂招聘雇用。许多受过专门训练的华人建筑师、工程师、化学家和技术员，生平第一次找到了跟他们所学专长有关的职业。这使他们终于脱离过去为养家糊口而在唐人街上做的各种生意。

华人社会学家谭金美⁽¹⁾一九四二年写道，第二次世界大战使

(1) 谭金美的英文名字为 Rose Hum Lee。——译者

全美国的华人社区发生了质的变化。大批华人劳动力离开唐人街，进入了美国工业领域，使唐人街上的华人企业遭到很大挫折。在餐馆里工作的华人变得寥寥无几，有些餐馆干脆关闭了。费城和匹兹堡的某些华人企业为了维持下去，不得不派车到其它大城市唐人街去接送华人来上班。明尼阿波利斯市唯一的一家华人礼品商店，由于生意难以为继，店主索性把店产变卖，投资到战时工业里去。

谭曾经这样写道：“当纽约唐人街的华人听说第一批征兵对象是华裔美国人时，高兴得跳了起来，把嗓子都喊哑了。有些不够年龄的男孩子想用‘虚岁’瞒过去，因为中国的虚岁往往要比实际年龄大一至两岁。可是他们的出生证却使他们露了马脚。因此他们只好再耐心地等下去。”蒙大拿州比龙特市共有十一名适龄华人青年，全都应征参加了各种形式的战时服务。

在俄勒冈州波特兰市，曾有一支由三十三名华人飞行员组成的分遣队，在珍珠港事件之前由美国派往中国，到蒋介石的部队里服役。另一部分华人青年参加了美国空军作战部队。旧金山的华人为红十字会募捐了一万八千美元，还认购了三万多美元的国防债券。

一九四四年，洛杉矶约有三百名洗衣工转业进了造船厂，建造了“华胜号”轮船。加州许多造船厂里，华人男女青年也与其他美国青年一起，承担起电焊、金属切削、钢件装配、电气、机械等项技术性工作。还有八千名华人青年应征入伍。过去对他们入伍的种种限制现在都被迅速取消了。华人第一次有资格在美国海军和海军后备队当见习兵，而过去只许他们当炊事兵和膳食管理员。

但在某种程度上，歧视仍然存在。美国国家航空和宇宙航行

局现任礼宾司与社会事务部负责人威廉·德宾在回忆他当年申请参加美国海军飞行训练时这样讲：

“我亲耳听到过一个美国海军军医说过这样一句话：‘中国佬永远也别想穿上美国军装飞上天去。’在给我做体格检查时，他就明讲：‘我想让你知道，我要想尽办法让你过不了体检这一关。’我瞪了他一眼，回敬他一句说：‘你如果真要这么做，那将是一个美国海军军官对另一个美国海军军人所做的最可耻的事情。’我当时就是这么冲着他讲的。”

结果，那个医生真的没让他通过体检那一关。但是他不肯罢休，后来找了别的医生，再次做了检查，最终还是进了美国海军。

杰克·董也曾说过，战争一来，华人找工作容易得多了，可是在同事的相处中他也发现，美国人对华人的偏见并没有完全消除：

“二次大战期间，我在戴维斯空军基地工作。我所做的是领班的工作，但是却得不到这个头衔。他们给我的也是领班一级的津贴，相当于高级机械师的工资。但每月发津贴的时候，他们都要说‘我们不希望中国佬向美国人发号施令’。我那时在军械部门工作，担负领班的全部职责，但是空军基地指挥官却对我说：‘董，我们要你担任这项工作，但是请别要求有这个头衔。’那是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情况。现在要好一些了。”

“加入空军之前，我也曾开过一个杂货店。记得有一次，一个大约是来自美国东部的妇女，来到我的店里买东西。选了满满一篮子物品之后，拎着篮子到门口来付钱。抬头一眼看到我，她便问道：‘你是中国人吗？’我说：‘是的，太太，我是中国人’。她丢下篮子，一句话也没说，拔腿就走出了店门。当时店里看到这番情景的人全都笑了起来，他们问我，‘喂，怎么回事？你说什么话把她得罪了？’那个时候碰到这类事情，我们只好忍气吞声。”

走出唐人街

尽管歧视现象仍然存在，但总的说来，由于华裔青年入伍作战，美国人民开始相信华人是忠于美国的公民了，当时曾组织了一个华人特种步兵师去中国参加抗战。不少华裔士兵在中国期间，意识到他们已经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被美国化了，因而放弃了原来想战后留在祖国的念头，一心向往的是回美国后把那里的生活安排得更好一些。

当时由于战争对劳动力的需要，美国工厂的大门再次向华人敞开，这不禁使人想起数十年前，也正是华人弥补了美国劳动力之不足，成了修筑铁路和发展加州工业的一支重要力量。到本世纪四十年代时，已经出现了一代新型华裔美国公民。他们自小在美国学校受教育，接受过各种职业训练，为将来从事蓝领和白领工作做好了准备。加上他们的父母一向十分注重孩子的教育，多年来他们所学的科学文化知识今天终于找到了充分运用的机会。这一代华人在各个新的工作领域里，都表现得相当出色，这不但使他们进一步赢得了社会的重视，也为后来数代华人工人、学生、

青年学者和小企业主在美国取得应有的社会地位铺平了道路。他们已不须再拘囿在唐人街上找职业了，也不必再考虑只有回祖国去才能实现个人的理想、发挥自己的业务专长了。

华人在美国社会地位的提高，也使他们心理上起了某些变化。哈罗德·吕在回忆当年纽约唐人街上侨民的心情时这样说：

“到本世纪四十年代时，华人才开始被美国人当作朋友对待。因为这时华人与美国人对付的是共同的敌人——日本人和德国纳粹分子。转眼之间，华人也成了美国之梦的一部分，这完全是一个不同的时代了。唐人街的华人都为自己是中国人而感到自豪。我的一个兄弟在二次大战时也应征入伍。看到自己的亲人穿上军装，心里着实很骄傲。这使我们觉得自己也是这个社会中的一员了。那时战争刚刚结束，变化大极了。”

撤销排华法案

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中两国间出现了空前的合作局面。然而一系列排华法律条款依然存在，这使美国政府处境十分尴尬。既然华人已不再是对美国社会与经济的威胁，那么，为了进一步加强同盟国的军事力量，也为了驳斥日本关于美国反对一切亚洲人的恶意宣传，废除各种排华法律自然便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

经过多次努力，几番周折，排华法案最终被撤销了。一九四二年五月，成立了“撤销排华法案公民委员会”。该委员会由一百八十多名非华人成员组成，目的在于教育广大公众，进行有利于华人的宣传。最初，美国劳联对撤销排华法案持反对态度，但是劳联的基层组织和产联都采取支持立场。另有一些狭隘爱国团体，

如“五月花后裔会”、“美国革命女儿会”以及“美西土生会”等，也都持反对态度。

采取支持立场的主要是各教会团体、企业机构、慈善团体、自由派组织以及像作家赛珍珠等一些。一九四二年，国会议员沃伦·马格纳森向美国众议院提交了一项撤销排华法案的议案，并在众议院通过。之后，又在佛罗里达州参议员查尔斯·安德鲁的积极推动下，于一九四三年被美国参议院所通过。

从此，国会立法取消了当时移民方面的一切排华法律，每年准许一百零五名中国血统的移民入境。其中百分之七十五的名额是给来自中国本土的中国人的。更为重要的是，这项议案规定在美华人享有移民归化权利，允许他们加入美国国籍。

在废除排华法律之后的十年间，根据移民配额制度，平均每年只有五十九名华人移居美国。为了把华人移民数控制到最低限度，他们对来美的移民进行反复筛选，规定了四类人可优先入境。这四类人是：美国所需要的技术人员；二十一岁以上华裔美国公民的双亲；永久居民的配偶与子女，以及这三类人的某些亲属。

所幸的是，另外几项法案使华人的移民限额又稍有增加。根据一九四六年“战娘⁽¹⁾法案”规定，凡是男性华裔美国公民的妻室儿女均可以“非配额”移民身份入境。自一九四八至一九五三年间，移居美国的华人中，有百分之九十是分离多年之后前来与丈夫团圆的妇女。至于女性华裔美国公民的丈夫与子女，则直到一九五二年才获准以“非配额”移民身份来美国。此外，根据“安置流离

(1) “战娘”即“战时新娘”，指军人在国外服役时娶的异国新娘。——译者。

失所人员法案”，一九四八到一九五四年间，又有约四千名华人移居美国，或改变原有身份在美国长期定居下来。这就是那些在一九四九年共产党接管中国之后暂时不愿回国的中国留学生与专业人员。

一九五三至一九五六年间，根据“难民救济法案”，又有两千名国民党难民在配额之外获准入境。根据同一法案，还有九万名德国难民也移居美国。在推行了六十多年排华政策之后，美国终于开始向华人敞开了大门。自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六〇年，共有四万四千七百二十名华人移居美国或成为美国永久居民。

战 后

这些法律上的变化，并没有像某些人所担心的那样导致大批移民蜂拥而入，或造成美国国内劳动力的泛滥。然而，这些新法律对于旅美华人来说，却意义深远。这意味着华人可以申请成为美国公民，可以在政府部门就业。而对许多少数民族移民来说，政府部门的工作，是他们就业的一个主要领域。以上这些变化，加上地方与州政府法律的相应改变，使华人得以在后来的许多年内逐渐扩大了就业范围，增加了工资收入，获得了购置房地产的权利，搬进了更为理想的住宅区，有了从事法律、医学和科学研究并在这些领域里就业的资格，并且通过选举或任命担任各种公职。

据哈罗德·吕回忆，随着各项新法律的实施，女性华人移民人数不断增多，这给纽约唐人街华人社区的生活带来了明显的变化。

“战争一结束，入伍青年都复员归来，不少士兵把妻子也带回美国，顷刻之间，这些非美国出生的华人都成了美国公民。一旦成为美国公民，他们对美国的看法也改变了。除了态度的变化，人数上也有了变化。新来的人越来越多。这时来的移民多半是家属和‘战时新娘’⁽¹⁾。于是唐人街上不仅有美国出生的华人，而且也有了美国境外出生的华人。华人社区随之开始扩大，交通和通讯联系也更为方便，越来越多的华人家里装起了电话，车费也降了价。一句话，经济状况迅速好转。生活一富裕，华人立即开始往其他住宅区迁移。这时正巧意大利移民区也在向外扩大，许多意大利人越来越富，不少有钱人家离开城市迁往郊外，于是华人很自然地搬进了这些住宅区。

“妇女人数的增加，扩大了劳动力市场。纽约增建了许多家工厂。到一九五〇年时，很多妇女都在生产装饰用小珠子的工厂里找到了工作。一九五〇年到一九五一年间，妇女就业机会骤增，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开始在华人区出现。”

许多退役华人士兵，根据“美国军人权利法案”，战后纷纷进了大学读书或学一种专门职业。玛丽·沈曾回忆道：

“凡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应征入伍的士兵，战后

(1) “战时新娘”原指军人在国外服役时娶的异国新娘。在此指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美国境外跟美国华人士兵结婚的妇女。——译者

都享受美国政府为他们提供的免费上大学的待遇。我丈夫也是这样进大学的。他学的是空调和冷冻技术，后来就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和业务工作了。多数开店做生意的华人家庭，他们的子女现在的职业多半是医生、技术员、工程师、制图员和建筑师等。可见这一代华人，与经营‘夫妻店’的父母亲那一代，已经完全不同了。他们都从事某种专门化的职业。有的人是自己办起了企业，也有的人在别的单位里工作。”

从本世纪四十年代后期开始，各州便先后取消了一系列排华法令，诸如“外籍人土地法”、“禁止华人与白人通婚法”、“限制华人住房法”等等。一九五二年，在排华一向搞得最凶的加利福尼亚州，也撤销了州宪法中的种种有关歧视华人的条文。在此以前，加州于一九四八年便取消了禁止华人与美国人通婚的规定，然而在其他各州，直到一九六七年经美国最高法院做出裁决后，才宣布取消了这类法律。

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华人社会地位的逐步改善，他们的身份也由侨民变为美国的一个正式少数民族了。从此，华人开始跻身于美国主流社会。其重要标志之一，是华人有权参与美国各级竞选活动。第一位被选入美国州一级立法机构的华人，是亚利桑那州的邓悦宁⁽¹⁾。那是一九四六年。此后，加利福尼亚州华人江月桂⁽²⁾于一九五六年当选为加州中小学教育厅成员，一九六六年又竞选州议员成功，当选为加州众议员，一九七五年继而当选

(1) 邓悦宁的英文名字为 Wing F. Ong。——译者

(2) 江月桂的英文名字为 March Fong Eu。——译者

为加州州务卿。邝发良⁽¹⁾于一九五九年当选为夏威夷州第一名参议员，他也是进入美国国会的第一名亚裔美国人。

五十年代时，华人在美国竞选活动中已表现十分活跃。在较大的唐人街内，华人还组成民主党与共和党两党候选人核心小组，分别支持两党竞选活动。这些活动标志着华人已跨出唐人街传统的派别组织，开始登上了美国社会的政治舞台。

二次大战期间，华人通过战时就业加入了美国劳动大军。战后虽然他们继续留在各个工业部门工作，但在企业里要想升迁却是困难重重。华人工程师麦礼谦在回忆他的亲身经历时，这样说道：

“当我准备进大学读书时，父亲一再对我说，为什么不进造船厂做工呢？那儿赚钱多嘛。还常跟我念叨说，他工作过的一家服装厂的经理就是个大学毕业生，还是个矿业工程师呢，但到头来不还是干起了服装这一行！”

“后来我在比奇特尔公司找到了工作。我是一九五三年进这家公司的。公司里面总共也没有多少华人，所以我都认识他们。现在这个公司里华人多了，约占公司总人数的百分之十。记得我是我所学的那门学科中的第一个被提升为高级工程师的华人，我学的是机械工程专业。不过，等我升任这一职务时，已是一九六二或六三年的事了。可见华人升迁的机会是极少的，比一般的白人要困难得多。”

(1) 邝发良的英文名字为 Hiram Fong。——译者

五十年代里，华人开始大批大批地离开唐人街，搬进市郊的住宅区。比如，在旧金山，越来越多的华人在里士满与松赛特这两个地段购买房子搬了进去；纽约也有越来越多的华人搬进了昆斯与布鲁克林这两个区居住。虽然居住方面的种族隔离现象这时已有所消除，但是仍有不少地段不肯接受华人居民。艾尔·杨还记得他父母想在旧金山里士满地段买房子时的一段经历：

“开始时我们到处碰壁。真是这样。因为那个地段过去从来没有住过华人。当时我爸爸是陆军中校，也算是美国陆军中军衔最高的一名华人军官了。他在里士满那个地段看中了一幢房子，打算买下来。那已经是二次大战以后了。可是他们硬是不肯卖。后来没办法，爸爸只好让他在军队里的一位好朋友（我记得他好像是一个有一半德国血统的美国人）先买下这幢房子，然后再转卖给我爸爸。这说起来真有点令人啼笑皆非。”

五十年代的美国

在经历了漫长的战争岁月之后，美国人民开始全力以赴致力于建设繁荣与和平的生活。由于世界上不少国家在医治战争创伤和恢复经济过程中，都需要美国的援助，这便使得美国银行与企业在国际经济领域里独占鳌头。在美国国内，二次大战期间国防工业的发展，使衰退了的经济重新得到复苏；工人人们的普遍就业也使他们的生活水平得到提高。十年前，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总统为对付经济大萧条而采取的各项“新政”措施，如公共工程、社会生活保障制度、劳工组织改革、最低工资限额以及财政和金融改革等项计划，这时仍在继续不断地改善着美国人民的生活状况。

从四十年代开始，白领工人人数开始增长。到五十年代时，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白领工人人数超过蓝领工人的现象。随着经济收入的不断增多，美国的中产阶级陆续从市区迁往郊区居住。为适应这一需要，类似宾夕法尼亚州的莱维敦型的中产阶级住宅区，雨后春笋般地在全国各地迅速发展起来，而且造价也并不昂贵。由于大批中产阶级家庭迁往郊外，也使美国城市居民的种族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仅在十年之内，从美国十二个最大的城市迁往郊外的白人居民就有二百万之多，代之而迁进市区的则是一百万零八千黑人以及其他少数民族的居民。

五十年代的美国，也是一个追求划一的时期。各大公司企业十分强调集体力量，对个性有所限制。不少公司甚至对雇员的着装都有统一规定。学校里也推行规范化的生活方式。历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斯塔特曾写道，纽约的一所中学一度规定七年级至十年的学生一律得上“家庭与家庭生活”这门课程，主要是引导学生讨论“发扬学校精神”、“学会与人相处”以及“如何使别人喜欢你”等问题。

五十年代，电视取代了收音机，进入了美国人民的家庭生活，成了人们的主要娱乐形式。各种电视节目，如《知者莫如父》、《奥兹与哈里特》等，向人们介绍了理想化的美国家庭生活。一时间，美满家庭、天伦之乐，成了家家户户所追求的生活目标。而美满家庭的标志，不外乎是妻子带着围裙料理家务、照看孩子，等待丈夫下班回来处理一天的大事。至于市郊中产阶级家庭所持的生活态度，则是“比阔气、赶时髦”，富了还要富，好了还要好。

中产阶级的美国华人

对于美国华人来说，五十年代是一个相对平静的时期。绝大

多数搬出了唐人街的华人，对他们新获得的社会地位都感到心满意足。他们梦寐以求的美国之梦眼看就要实现，因此虽然社会上仍残存着某些歧视现象，他们已不再多加理会。现在他们所竭力追求的是如何让美国中产阶级承认自己，并设法成为他们中的一员。难怪在这一代华人的家庭生活中，已经极少找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痕迹了。他们的孩子往往只能听懂中国话，但已经不会说了。连中国话在美国到底还有多大价值，都成了人们争论的问题。比如，查尔斯·陈就这么说：

“我们的孩子都已经不会说中国话了。二次大战期间，我们一家住在底特律，周围接触的人全都是些大学生。那儿有一所幼儿园，记得幼儿园里一位妇女劝我们说，孩子小时候，先别教他们说中国话。等他们进了小学以后再教。不然的话，他们一进小学就会发觉自己说的话跟别的孩子两样。那会使他们产生自卑感。

“后来那儿办起了一所华语学校，于是我们就把孩子送去学中文了。两个孩子由不同的教师教，结果学回来的中国话连发音都不一样。放学回家来，各自都说自己的对，俩人还常为这件事吵起来。我一生气对他们讲：‘得了，你们华语小学干脆就别去了！’专门去学中文的，可回家来连个‘一’、‘二’怎么说都搞不清，还要为此吵架，上这个学校还有什么意思。我的看法是，要是我需要用中文做谋生手段的话，我一定会去学着读、学着写。但实际上，中文对我来说跟回文一样派不上什么用场。”

对于走出唐人街进入市郊白人住宅区的华人来说，要适应美

国文化，就意味着丢弃过去他们所熟悉的唐人街上的生活方式。这个适应过程，对一部分华人来说一直延续到今天。下面是埃尔西·黄所说的一番话：

“我出生在美国，受的也是美国教育，因此我并没有全部保留中国的文化传统与习惯。但是我还是有选择地继承了一部分我们认为好的东西。我至今仍很重视并保留着不少中国的文化传统。可是我女儿这一辈就不同啦。越来越多的中国孩子和白人孩子结了婚。因为他们跟白人孩子们一起上学读书，白人孩子的想法和生活习惯对他们来说可能更熟悉、更适合。”

然而，政治上较为敏感的华人这时已注意到，美国社会仍继续在对华人施加种种限制。因而他们呼吁建立像“全国有色人种权利促进会”与“全国城市居民联盟”一类的美国华人组织。他们并且提醒华人说，美国工厂和各专业部门的大门现在之所以向华人敞开，是因为战时缺乏劳动力的缘故。一旦经济繁荣时期过去，首当其冲受到打击的肯定还是各个少数民族。

整个五十年代里，美国各地唐人街的人口日趋减少。凡是继续留在唐人街的人，都有他们各自的原因。比如，商人愿意住得离他们开的店近一些。年老孤独的单身汉，由于语言上的障碍和经济上的难处，只能住在唐人街上，况且唐人街还有一些他们赖以生存的互助团体。至于那些新移民，只有那些在唐人街上有家的才肯留在那儿。除了以上几种情况外，华人总的趋势是想方设法离开唐人街，搬进白人住宅区。比如在纽约，一九六〇年华人的总人口是三万二千人，而留在唐人街的只剩下了四千人。

麦卡锡主义与唐人街

美国在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所建立起来的庞大军事机构，并没有随着战争的结束而撤销。相反，在与苏联争夺世界霸权的日益加剧的紧张局势中，它被作为一支随时可以动用的军事力量继续保存了下来。一九四九年中国革命的成功，进一步动摇了美国在世界经济与世界政治舞台上的霸主地位。对于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一九四九年所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美国当时拒绝予以承认，而继续与逃往台湾的蒋介石的“中华民国”政府保持外交关系。这时，国民党的势力便趁机利用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敌视政策，加紧扩大它在唐人街上的影响。他们的政治立场反映在当地的华人报纸上，也渗透到华语学校里和一些较保守的唐人街华人组织之中。后来在朝鲜战争与麦卡锡主义猖獗时期的反共狂热中，国民党势力更是有恃无恐。“反共同盟”在唐人街四处追查左翼分子。在日益嚣张的反共气焰中，任何倾向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情绪与行动都会遭到镇压。

一九五五年，美国驻香港领事埃弗雷特·德鲁姆赖特声称，许多华人都是非法侨民，并且怀疑他们当中有些人可能是共产党特务。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埃德加·胡佛持同样怀疑态度。由于担心美国政府这一黄祸论调重新抬头，各地“中华总会馆”的代表于一九五七年组成了“全美华人福利会”，在国会进行游说，反对大规模迫害和驱逐华人移民。结果，美国政府制订了一项“坦白计划”，要求那些凭伪造移民证件入境的华人自行坦白。而美国政府则据此重新考虑他们的身份。在旧金山和其他地方总共处理了数千起此类案件。很快，同情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华人便发现，这项“坦白计划”的矛头在很大程度上是指向他们的。《旧金山时代

报》社长黄运基⁽¹⁾先生，就是这次“坦白计划”中受牵连的一位华人。他在谈到自己的亲身经历时这样说道：

“我祖父来美国时，用的就是Chuck这个姓。自然后来我父亲也用了这个姓，而且成了美国公民。我也是沿用这个姓成为美国公民的。

“他们搞这次‘坦白计划’用意很清楚，就是想利用‘坦白’材料来迫害那些他们认为是对美国不友好或不忠实的华人。这正是我所遇到的情况。他们逮捕我，审讯我，并且利用我父亲的坦白材料来指控我。可是他们却没有利用这份材料去找我父亲的麻烦。……如果你们认为当初的做法是犯法的话，那是我父亲或者我祖父的事，与我无关。显然，他们搞的这次所谓‘坦白计划’完全是警谋对付某些人的。

“他们想把我驱逐到台湾去。可是我在美国的所作所为都是反对蒋介石政府的，赶我到台湾去岂不等于让我去送死？于是我请了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和其他一些学校的教授们一起替我辩护，证明根据我在美国的政治活动，美国政府想把我驱逐到台湾去是绝对行不通的。自那以后，我一直在与美国政府坚持不懈地进行着斗争。”

这一“坦白计划”，使唐人街的进步力量受到极大挫折。进步人士随时受到被驱逐出境或剥夺美国公民身份的威胁，他们的组

(1) 黄运基的英文名字为Maurice Chuck。——译者

织也被迫一个个解散。“旧金山华侨民主青年团”与“加省华工合作会”两个华人组织，就是麦卡锡主义时期的牺牲品。

搁浅了的中国留学生

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加入旅美华人行列的还有另一部分人，这就是为数大约五千人的一批非美国出生的华人。他们当初来到美国的目的，或是接受高等教育，或是接受专门训练与从事研究工作，或是出任贸易代表，或是前来谋求职业。一九四九年共产党政权建立以后，他们发现自己已在美国“搁浅”，回不去中国了。这些人当中的大多数是在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哥伦比亚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伊利诺斯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密执安大学和华盛顿大学等校攻读学位的研究生。

唐纳德·蔡是一九四一年来美国的。先在波莫纳学院学习，后来就读于麻省理工学院。在谈到那一时期来美的中国留学生身上所蕴藏的智慧与才能时，他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

“虽然我本人是自费来美国的，但是我知道当时许多中国留学生都是靠中国政府奖学金来的。要拿到这样一份奖学金是十分不容易的，得通过层层考试与竞争，进行严格的选拔。今天在美国之所以有这么多杰出的华人专家、教授等等，就是因为他们当中很多人当年是凭奖学金前来美国读书的优秀学生，……但来到这儿不久，战争就爆发了。这对于他们中有些人来说是欲归不能了；也有些人则决定客居异乡不再回国去了。后来他们都成了很有成就的人。”

蔡还谈到，虽然当时他们通过不同的渠道解决学费来源，但是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奋发读书，获得真才实学，将来回去报效祖国；

“像其他许多学生一样，我们当中好多人也都靠自己打工赚钱求学。我就在图书馆、装订间里打过零工，还当过家庭教师。每小时工作能赚三毛五分美金。一个月大约做五十个小时的工，能挣二十到二十五美元。中国研究院也给我们一点各种名目的奖学金，可以解决部分学费，但主要得靠自己做工，那确实很辛苦。

“读研究生的时候，我进了麻省理工学院。我父亲过去也在这所大学就读过，那是一九一〇年前后，他学的是采矿工程。不知他们是不是考虑到这个因素，就接受了我，而且给了我一部分奖学金。但数目远远不够付学费的，所以我设法又去佛蒙特州斯普林菲尔德的一个机床厂工作了两个月。我把这次做工也当作学徒和实践的机会，因为当时我们所有的学生都打算学些实用的本领将来回国去好派用场。根本没有留下来的念头。”

滞留在美国的这一批留学生和专业人员中，绝大部分是说官话的北方人。除了偶尔去唐人街的餐馆品尝一下中国饭菜或者去买些中国小商品外，这些北方人发现他们与早年来美国的广东人及其家属极少有共同之处。他们操的是不同的方言，各自有不同的社会团体，又有着各自不同的经历。这些北方学者和学生面临的最大困境是生活目标的改变与职业前途的渺茫。本来，他们凭着在美国所学的知识，回国后完全有保证获得一个相当理想的专业工作和优越的社会地位。然而如今在美国由于社会地位未能确定，

使他们失去了这一切机会。因此，最使他们灰心的是两个因素：一是丧失了社会地位；二是职业全无保障。因为在美国这个社会里，流离失所的外国移民不仅没有资格取得公民权，而且由于美国的种族歧视政策，使他们想要找到一份工作都极为困难。

在以后的许多年里，台湾、香港以及东南亚各国人才外流现象一直没有间断过。到美国来攻读研究生课程的外国学生，一旦在他们从事的学术领域里找到了合适的工作，就不再回本国去的，不乏其人。五十年代来美国读书的药理学家何本(音译)是这样解释他为什么要留在美国的：

“我的家在新加坡。事实上我很喜欢那儿的生活，因为那是我的家乡。后来，我和弟弟一起到美国来读书。我们俩人都毕了业，并先后结婚成了家。他后来回新加坡了，现在新加坡医科大学任副教授。他是一个昆虫学家，而作为一名昆虫学家在新加坡是很有前途的。但是我作为一名药剂师、一个药理学家，要想搞些科学研究工作，美国的条件与机会要比新加坡理想和优越。美国既有从事科研的机会，又有科研经费的保证。这就是我留在美国的主要原因。”

凡是在非美国出生的华人学生比较多的大学里，都有各种华人学生团体。除了组织舞会、远足等活动外，他们还在春节和其他一些传统节日举行庆祝活动。有时甚至还为其他学生创作和表演一些民族文艺节目。华人同学在大学毕业后，往往相互之间继续保持各种联系。比如，根据赫伯特·金回忆，当年“休斯敦华人职业俱乐部”就是这类性质的一个华人学生团体：

“华人职业俱乐部的前身是‘中国大学生俱乐部’。后

来因为该俱乐部成员年龄渐大，新来的大学生也不再加入，原有的成员们都有了职业，所以我们就把名称改为‘华人职业俱乐部’，那是大约八年或十年之前的事了。一九七五年我曾担任过该俱乐部主席。当时俱乐部成员大约包括三、四百个家庭吧。其中大部分人都是从事专业工作的。本来这主要是个社交俱乐部，后来大约在四、五年前，我们商量想把这个社会活动团体改为一个专门为唐人街服务的机构。于是我们决定搞个基金会，为华人学生提供奖学金。两年前，我们便创建起一个常设基金会，资金来源于俱乐部成员们的捐赠和一年一度的舞会活动。目前我们已拥有永久性基金一万至一万五千元，利用这笔基金的利息，提供奖学金。”

战后的年代里，美国出生的华人开始享受他们在战争中效忠国家与辛勤劳动的果实。美国华人进入了各个新的职业领域，迁入了新的住宅区，登上了新的社会政治舞台。华人社区本身的结构也发生了巨大变化。目前在美国的华人包括以下三部分人，即：来自华南的早期移民——现在都成了唐人街上的单身老人；美国出生的华人——现在多住在城市郊区；非美国出生的华人学生与专业工作人员。虽然他们的生活经历各不相同，世界观各异，然而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他们都曾得益于美国对华人态度的改变。如今，他们在社会上总算有了立足之地；美国，终于成了他们的家。

第八章 模范少数民族的苦衷

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华人已以一个崭新的民族形象出现在美国报纸、广播与电视上，并且被称作是美国少数民族的典范。一九六六年，《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上刊登过一篇题为“美国一个少数民族的成功史”的报导。在这篇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文章中，华人被誉为是一个成功地熔进了美国民族大熔炉的模范少数民族。文章写道，“在美国正为少数民族问题而感到头痛之时，有一个少数民族，这就是拥有三十万人口的美籍华人，却正在凭借他们的刻苦与勤奋而赢得社会财富与尊严。”

文章强调指出，美国华人的成功史说明了各少数民族在美国都是可以获得成功的；同时对日益高涨的民权运动的必要性提出了疑问。文章说，“在人们要求政府耗资亿万美元解决美国黑人及其他少数民族生活问题的时候，三十万华人却在独自奋发向前，不乞求任何人的施舍与恩赐。当然，并非所有的华人都已富裕。许多人，尤其是刚从香港来的新移民，都还很穷，甚至连英语也不会讲。但是大部分华人都凭着这个民族特有的吃苦耐劳、勤俭节约和自强不息的传统精神，在奋发向前。”

对于这篇报道，华人界的传统领导势力表示颇为欣赏，他们认为华人确实一向自食其力，而且将来也不会乞求别人。那些在市郊住宅区安了家并且在唐人街以外找到了职业的中产阶级华

人，对文章中所流露的赞扬口吻也表示十分满意。在受尽了多年的歧视和冷遇之后，他们对今天所获得的社会地位感到称心与满足。苦干精神与学业上的成就，似乎终于帮助他们敲开了一向对他们紧闭的大门，使他们获得了汇入美国主流社会的新机遇。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篇关于美国华人成功史的报道写得未免过于夸张了。诚然，在六十年代，华人的经济状况的确有了明显的改善。根据一九七〇年的统计数字，华人家庭平均收入要比其他民族的家庭平均收入高。但是，如果我们再进一步分析一下其他有关统计数字，就会发现，家庭收入（尤其对美国华人来说）并不能说明一个民族经济状况的改善程度。纵观四十年代、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的全部统计数字，不难看出，虽然男性华人的职业状况已有相当改善，但是他们的个人收入却一直大大低于全国平均个人收入。而且，为了维持一家人的生活，许多华人家庭的妇女和孩子也往往得一起做工。由于华人家庭成员通常说来比一般美国家庭的成员要多，因此他们的家庭总收入可能要高一些，但是均分到每个成员头上的实际收入却低于美国的人均收入。而目前的情况是，由于对这些统计数字缺乏全面的分析，加上政府一向认为华人有能力管理好自己的事务，因此对华人中实际存在的问题缺乏足够的重视；对发展华人社区公共事业所需的资金，政府也很少提供拨款。不仅如此，所谓“模范少数民族”这一提法，也在人们心目中把华人与其他各少数民族全然割裂开来。但实际上他们之间有许多相似之处，存在着许多共同性的问题。比如，跟其他少数民族一样，华人也面临着住房、就业、健康等问题，在适应双重文化的过程中，也遇到了种种困难与挫折。

新移民涌入唐人街

美国华人在六十年代经历了重大的社会与经济变革。他们所面临的各种问题也日益明显地暴露出来，迫使政府不得不加以正视和承认。一九六五年，美国通过了一项“移民国籍法修正案”。由于该修正案取消了原来带有种族歧视性质的“国籍配额制”⁽¹⁾，使华人移民数字空前剧增。新移民法规定，东半球每个国家每年可以向美国移民两万名。东半球移民总限额为每年十七万。西半球每年移民总限额为十二万人，不规定每个国家的限额。香港，作为英属殖民地，每年可以向美国移民六百人。

对于东半球国家，该修正案还规定有八类人可以优先移居美国，以便让移民家属可以不受移民名额限制，以“非配额”移民身份前来美国团聚，也便于让具有专门技能的人优先入境。这样一来，有两类华人开始涌入美国。一类是在美华人的家属，包括许多与丈夫分离三十多年的老年妇女。她们多半都与亲属住在唐人街上。另一类是专业技术人员。他们学识较高，英语流利，大都在城市郊区定居下来，并找到了相当不错的职业。

美国华人的口从一九六〇年的二十三万七千二百九十二人猛增到一九七〇年的四十三万五千零六十二人。到一九八〇年时，非美国出生的华人已占美国华人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五十四，

(1) “国籍配额制”旨在维护一九二四年美国移民法与一九五二年的沃尔特—麦卡伦法案。该配额制度规定，各国来美国的移民人数，要根据一九二〇年的美国人口的国籍比例配给。比如，假若华人只占美国人口的百分之一，那么每年获准入境的移民总额中只有百分之一的名额可以分配给华人。由于排华法案在美国已延续了两代人之久，使华人人口比例直线下降。可见，“国籍配额制”显然对欧洲国家的移民有利，而对世界其他地区（如亚太地区）的移民极为不利。——作者

超过了美国出生的华人数。成千上万的新移民在旧金山和纽约唐人街上安了家，使五十年代以后一度由于华人向市郊迁移而冷落了唐人街再次充满了新的生机。这时在美国除了祖籍广东省的早期移民以及一九四九年滞留下来的华人留学生和专业人员以外，又增添了一大批来自香港、台湾和东南亚的华人新移民。他们与前者所不同的是大都全家一起移居美国。但又与前者有共同之处，即对于美好生活的憧憬立刻被严峻的生活现实所取代。摆在他们面前的是一个困难重重的华人社区。

唐人街的住房问题

早在六十年代末期，华人区就已拥挤不堪。现在每年成千上万的新移民不断涌进唐人街，使这一状况日益恶化。随着美国各地房价不断上涨，许多低收入的华人都设法搬进唐人街居住，因为这里的房价相对低廉。不会说英语的移民又只能住在唐人街，否则在别处根本无法生活。结果到一九七〇年时，旧金山唐人街的人口密度达到了旧金山其他住宅区人口平均密度的十一倍，在全国居第二位。美国唯一比旧金山唐人街还要拥挤的地区便是纽约唐人街了。那儿的华人从一九六〇年的四千人猛增到一九七〇年的两万四千人。

想搬进纽约和旧金山唐人街居住的华人不计其数。六口之家挤住在两间一套的房子里是司空见惯的事，室内既无暖气设备也没有热水供应；浴室和厨房还得跟别家合用。有些人家里挤得实在没办法，只好把大些的孩子送到亲戚家寄住。

由于住房紧张，要想在唐人街租一套房子，至少得付给房东几百元甚至几千元的押金。因而大部分原有住户都无力迁进新住处，所以腾不出空房子。这样一来，那些想找间空房子搬进去的

新移民自然也就毫无指望。住房紧张到这种地步，房客也就再也没有讨价还价或者抱怨的余地。为在这儿有个栖身之处，不少人只得在那些年久失修、岌岌可危的房子里住下去。

美国房屋及城市发展部门，一九七二年曾经做过一次调查，发现旧金山唐人街的房屋多半是一九〇六年大地震后不久建造起来的，就住房条件来说，在整个美国西部倒数第一。“平园”住房工程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一些矛盾。但由于从一九五〇年到一九五二年间只造了二百三十四套住房，直到一九六一年才又完成了一百九十四套，因此这一住房区转眼又处于饱和状态。结果，旧金山华人区的住房问题仍然没有解决。后来到一九七九年，另一处新的住房工程“美邻园”才又破土动工。这一工程可解决一百八十五套住房。

再看一下纽约的住房状况吧。七十年代末，在仅跨九条街区的纽约唐人街中心地段，密密麻麻地挤满了五百多家饭馆和零售商店，还有两千三百一十八个住房单元，里面住着九千九百多人。整个华人区住房的百分之八十五都是一九〇一年以前建造的。由于当时造房标准极低，现在这些房子随时都需要修缮。只有百分之二的住房装有电梯。面对这种局面，部分华人领导人于六十年代中期开始着手讨论如何解决华人住房问题，并提出了建造“孔子大厦”的计划。这项工程已于一九七八年全部竣工。整个建筑群包括容纳三千人的住房，一个小学和一个商业点。这项工程是由中华总商会和唐人街房屋建筑联合会发起，由纽约市政府资助兴建的。

华人就业问题

在就业方面，美国华人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并非失业，而是半

失业。很多原来在香港、台湾和其他地方做专业技术性工作的人来到美国之后，发现由于多种原因无法充分发挥他们的专长。有些人是由于语言的障碍；有些人是因为原来的职业资格证书或文凭得不到美国的承认而无法找到适当的工作。在建筑行业等领域里，华人就业仍然相当受歧视，他们仍然被工会排斥在收入较高的工种之外。许多人为了养家活口，只得屈就于各种工资微薄而且有失身份的职业。不少人要同时兼做两三种工作，所得收入才够维持生活。例如西尔维亚·李的父亲原先在香港是一位会计师，到了美国后只能当一名食品杂货店的管理员和看门人，连妻子、女儿也不得不生平第一次出来找工作做：

“爸爸当时只能在杂货店里找到工作，活很重，而且工作时间很长。每天得干十小时，每周干六天。收入仍然低得可怜。妈妈也只好出去找工作，当裁缝。我和两个妹妹也得工作，帮着一起干裁缝活。上午去上学，下午到缝纫厂去做衣服。以前从没干过这一行，进了厂以后才学起来。不过你若真想学一样手艺，倒也并不难。”

像李家这种情况，在华人中很普遍。家中只要是能干活的全得出去工作、挣钱，经济上才过得去。妻子一般都在缝纫厂、罐头厂或其他工厂干活，一起帮着“挣饭吃”。华人已婚妇女的就业率要比白人或黑人已婚妇女就业率高。据一九七〇年统计，全美国已婚妇女总的就业率是百分之三十九，而华人已婚妇女的就业率为百分之四十八。她们的收入往往是家庭经济来源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整个七十年代里，唐人街妇女，特别是那些刚来美国的新移

民中的妇女，她们的主要就业范围仍然仅限于服装业。一九七八年，全纽约一千多家服装厂中，就有四百家集中在唐人街上，雇用了约一万二千名华人妇女，占服装工业总劳动力的百分之十。纽约的华人服装工人有百分之九十的人都加入了工会，可以享受失业救济金和医疗保险。这是仅有的两项福利待遇。这些工厂里的生产条件十分恶劣，素有“血汗工厂”之称，而且计件工资又低，但是由于这些妇女都挑着家庭经济的重担，大部分人宁肯默默忍受这一切，也不愿公开抗议。工会只注重在某些具体事情上为工人讲话，而在涉及劳动契约合同之类的重大问题上却很少出面维护工人利益，所以工人劳动条件改善甚微。加上服装工厂数目太多，企业主们往往利用工厂之间的激烈竞争，拼命压低工人的合同价，使工人备受剥削。结果，她们拿到手的工资自然也就被压到了最低限度。

在较大城市的唐人街里，男性华人的主要就业范围仍局限于餐馆。在那里工作，享受不到任何福利待遇。没有病假，没有假日，也没有养老金。许多在唐人街上找不到工作的人只好到别处去找活干。不少市郊餐馆雇用他们，并用运货汽车接送他们上下班。有时为了上班方便，他们便设法住到离餐馆较近的地方去，这样离自己的家就远了，每周只能回去一次。

帕特·黄十几岁的时候，全家十一口人从香港移民到了美国。为了维持生活，开始时一家人分散到新泽西州、康涅狄格州和纽约三地在中国餐馆里帮工。几年以后，全家一起积攒了些钱，便自己开起自家的餐馆。黄说，他真希望离开餐馆这一行，去干点别的工作，可是家里又离不开他，

“我在店里每天至少得干十二个小时的活儿，有时甚

至于十四个小时。开餐馆是个苦差事。我们兄弟几个都不喜欢这一行。倒不是怕苦，而是想做些别的能施展自己才能的工作。找工作当然也不容易，不过要找的话还是可以找得到的。但是我得为家里着想，为父母和兄弟们着想呀。”

汤姆·谭是六十年代中期随全家从香港移居纽约的。他说，当时若在唐人街以外找到个职业，是会令人羡慕不已的：

“刚到纽约时，我在布鲁克林的一家洗衣店工作。店里备有大型洗衣机，专门洗床单、桌布等。一天干下来，晚上到家倒下就睡，人完全累垮了。第二天又得一大早起身赶去上班。在那儿干了几个月后，换了个工作，在饭店里又干了几个月。后来，我设法在梅西百货公司⁽¹⁾找到了一份工作，做仓库管理员。这件事当时在一些华人中简直成了一大新闻。我想他们一定觉得，在梅西公司找到工作就意味着往唐人街以外跨出了一大步。在他们心目中，华人能在这么有名气的大公司找到职业，实在令人难以置信。”

华人健康问题

唐人街拥挤不堪的住房条件，是造成华人健康状况恶劣的一个重要原因。一九六五年在旧金山进行的一次健康普查表明，华

(1) 梅西百货公司(Macy's)是美国规模最大和最有名的公司之一。全国各大城市都有分公司。——译者

人结核病患者人数居全市首位，而且其死亡率竟是白人与黑人死亡率的三倍。华人死于心脏病与癌症的人数也很多，原因恐怕是缺乏及时的诊断与治疗。一九六七年“旧金山华埠⁽¹⁾北岸区经济辅导委员会”对华人健康状况作了一次调查，发现华人当中有百分之三十四的人从未进行过全面体格检查。至于从未进行过牙科和眼科检查的人数就更多了。

造成华人健康状况不良的另一个原因，是唐人街地段医院里缺少懂两种语言的医生，致使许多华人非到病情十分严重时是不肯进医院看病的。有些病人的死亡就是由于病人本身或其家属不懂英文而无法把病情向医生讲清楚所引起的。甚至还有有的病人是因为家属不会说英语、无法及时叫到救护车而不幸丧命的。

住在唐人街的华人在七十年代里患高血压与精神病者也很普遍。据纽约唐人街保健医院院长汤姆·谭分析，这类病症多半是由于在适应美国文化与环境的过程中遇到种种挫折，给精神造成极大压力而引起的。对年纪大的人来说，尤其如此。然而出于种种顾虑，诸如承认患有精神病会给自己带来不光彩，会有损于华人的“一向有能力管理好自己事务”的形象等，致使这些病症往往被设法遮掩起来，不仅没有引起华人社区的足够重视，甚至也没有得到这方面的专家们的重视。下面是谭院长讲的一席话：

“华人的自杀率特别高，过去几乎是全国平均自杀率的四倍。七十年代里，情况稍有好转。总的看来，男性华人自杀率比女性华人自杀率下降得快一些。以纽约为例，女性华人自杀率至今仍为纽约市平均自杀率的两

(1) 华埠即唐人街。——译者

倍。年纪大的妇女中，比例更高一些。华人自杀率之高，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深思。它反映了华人精神上经受的巨大挫折。因为每一起自杀案都是与精神上极度的压抑和心理上难言的苦闷分不开的。

“目前，各种预防自杀的研究项目与措施，已在美国各地展开，唯独华人区被撇在一边。这岂非怪事！须知华人区的自杀率在全国居首位。可是许多人片面地把唐人街当成理智与美满家庭的典范，声称它不需要任何外界帮助，无须在这里推行什么预防自杀的措施等等。这种论调甚至出自许多自杀问题专家之口，实在荒唐之极。”

现在唐人街上许多华人仍然相信中医和中草药的疗效，而不相信西医。原因是多种多样的。至于究竟哪些人相信中医，哪些人相信西医，哪些人两者兼信，这往往因他们的年龄、出生地、医疗经历、所受教育以及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而异。一九七〇年对波士顿唐人街二百名华人所做的一次调查表明，华人在对待采取何种医疗方法的态度上有着很大的差异。随着华人社区的不断扩大，开展医学研究、发展医疗事业已显得越来越重要和迫切了。这些研究工作与将采取的各种医疗措施，不仅应当充分反映美国华人的文化特征，而且应当考虑和体现各类华人的不同要求。

青年帮伙集团问题

由于父母终日为生活奔忙操劳，唐人街上许多华人青少年疏于管教，家里住房又窄小，关不住他们，于是便整天在大街上游

荡。而唐人街又是个不折不扣的少数民族聚居区，充满了各种矛盾，使这些青少年有一种极度的压抑感。据戴维·陈分析，由于华人家庭经济状况长期拮据，使原有的各种问题变得更为严重：

“不少青年从国内来，不懂英语，唯一的出路是进厨房学烧菜。为什么就不能找个英语补习班去学点英文呢？有许多东西是可以学起来的。现在唐人街上不少孩子都变坏了，什么原因呢？过去华人的孩子一向是规规矩矩、尊敬家长、奉公守法的。现在怎么会变得完全相反了呢？依我看是他们来到美国以后，家长一天到晚忙着干活、挣钱，根本没有空暇顾及教育自己的孩子。这怎么行呢？你只顾干活、挣钱，孩子肯定要出毛病的。现在华人中确实还有许多问题需要帮助解决。”

许多移民青少年在适应美国文化和生活方式过程中，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他们与弟弟妹妹们不一样，弟弟妹妹年纪小，学起英语来很容易。他们要学可就难多了，尤其如果整天只跟说中国话的伙伴在一起，英语就更难学好。许多人对上学又没兴趣，都半途辍学了。但是也有些孩子很争气，在学校里能努力跟上去。过去在旧金山教中国孩子英语的一位华人教师梅布尔·钟曾经这样回忆她的学生在学习英语和适应美国文化过程中所碰到的一些问题：

“许多学生从香港来到美国时刚十几岁，很少有人懂英文，有的一字不识。家住在唐人街里，同时又要学会适应美国生活方式，的确很不容易。虽然他们小小年纪，

但都人小志大，有决心尽最大努力学些本领，将来好做一番事业。

“为了鼓励这些九年级的孩子学好英语，我在黑板上写了一条规矩：只许讲英语。有一次，我问一个学生为什么前一天没来上课。他不会用英文回答，就用中文说了三个字‘移民局’。我立即告诉他‘移民局’的英文是‘Immigration Station’，而且把英文写在黑板上给他看。谁知这时坐在后排的一个学生竟冲着我说：‘你自己明明也是中国人，却不肯讲中国话。’我告诉他说：‘中国话我是肯讲的。但是现在我是你们的英文老师。’”

在课堂之外，这些新移民的孩子们发现他们美国出生的伙伴都不会说中国话。的确，这两类孩子中间在语言和文化方面有着不少差异，而且随着唐人街变得越来越拥挤，这些差异和矛盾也越来越明显。久而久之，他们编了一些俚语和绰号相互奚落和攻击。美国出生的华人被叫做“ABC”⁽¹⁾，外号是“竹心”，比喻这类华人孩子是丢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人，像竹心一样空洞。反过来，这些美国出生的华人孩子又把国外出生的华人孩子称作“FOB”⁽²⁾，外号是“竹节”，比喻他们像竹子的节头一样僵硬而不易同化。

渐渐地，ABC和FOB双方青年各自成立了俱乐部，并结成了两伙集团，目的是在唐人街上自己有个帮伙，必要时可以求得保护。六十年代里，由于移民青年人数迅速增多，争夺地盘的斗

(1) ABC是“American-born Chinese”的缩略语，意为“美国出生的华人”。——译者

(2) FOB是“Fresh-off the boat”的缩略语，意为“刚刚下船登岸的人”。——译者

争日益激烈。不少辍学的帮派集团成员被堂帮所利用，给他们雇用去当赌馆的看门望风人。加入帮派的人胆子变得越来越大，动用的武器也日益精良，武斗规模不断升级，以至到六十年代末期，这些帮派之间的凶杀与仇杀事件层出不穷。

旧金山州立大学教师胡裕⁽¹⁾曾一度是旧金山“华青帮”的代言人。在解释旧金山帮派集团形成的前因后果时，他曾这样讲：

“翻开过去的报纸，你会发现不少关于五十年代末期华人帮派集团及少年犯罪等问题的报道。我那时大约十四、五岁，不少跟我年龄相仿的孩子都是那个时期来到美国的。由于对美国学校生活很不习惯，他们逐渐都辍学了。后来就相互打架。那时候，一般说来，从国内来的孩子长得个头小些，美国出生的孩子个头大点儿。论打架，公平合理的打法当然应该是一对一，但是如果你只有一百一十磅重，而我有二百磅重，那怎么行呢？于是有一天，国内来的孩子们聚在一起商量，决定用‘中国式的打法’跟美国出生的孩子干仗。什么是‘中国式的打法’呢？就是讲义气，一人帮大伙，大伙帮一人。有人要找你打架，你就说，‘好吧。我六点钟在朴次茅斯广场等你。’于是我们一伙十个人全都跟去，一起揍他一个人。‘华青帮’一开始就是这么形成的。还有，他们来到美国后，对学校不感兴趣，又找不到职业，父母一般说来也都混得不怎么样，于是孩子就学着偷窃，而且尝到了偷的甜头，觉得钱来得容易。

(1) 胡裕的英文名字是George Woo。——译者

“事情再发展下去，便出现了悲剧——相互残杀起来。其实互相残杀的双方，原来都是‘华青帮’一伙的人。甚至彼此都记得谁的生日是哪一天，记得怎样一起出去偷东西和相互接济等。但后来这些‘华青帮’的成员都成了各个新帮伙的头目，而帮伙之间又不断相互厮杀，结果不少人都惨死在殴斗中。”⁽¹⁾

一九六八年二月二日晚上，胡裕曾经在人权委员会举办的一次公众听证会上，代表“华青帮”就唐人街青年问题发表激昂的演说。在华人各界组织成员以及美国新闻界人士面前，他列举了华人青年中存在的种种问题，激烈地谴责唐人街当局对这些问题采取漠然置之的态度，并警告当局说，如不及时采取措施，华人青年中还会出更多的乱子。他认为，华人青年中出现的这些问题与美国穷人中普遍存在的问题相类似，只不过华人更多一层语言不通的困难罢了。

在这以前，华人中的问题一向在华人社区内部解决，现在居然一反传统做法把问题公开到听证会上来，使在场的听众都十分震惊。但是，中华总会馆代表兼人权委员会华埠顾问余河当即在会上发言，表示对“华青帮”决不能作任何让步：

“他们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没有任何悔过表示，而且也没有表示将来要改邪归正。他们已经对华人社区造成了极大的威胁。如果我们答应他们的要求，对他们作出让步，那就意味着更多的像他们这样的人将惹出更多的

(1) 这段话是胡裕一九七九年在接受编者采访时所讲的。——作者

麻烦，造成更大的威胁。”

结果，“华青帮”要求联邦政府资助的提议遭到否决，最后这帮人分裂成几派，各奔东西。有的人仍在唐人街上厮混；有些人投靠堂帮找到了职业；也有少数人决心另谋正路，改过自新。

纽约的青年帮伙集团主要是靠唐人街的堂帮给予支持的。他们在堂帮开的赌馆里看门、当保镖，以便挣点钱并混个住处。后来这些集团势力逐渐变大，相互间的对抗也日趋激烈，以后竟发展到向唐人街上各大餐馆和商店公开勒索钱财混日子。美国报纸、广播等对华人帮伙集团的殴斗、抢掠事件进行大肆宣传，结果使旅游者都闻风却步，不敢接近唐人街。旅游者一减少，唐人街的生意随着大为萧条，敲诈钱财已不再可能。最后这些人又把活动转到市郊各餐馆去了。

戴维·殷过去曾做过“兄弟会”负责人。这个兄弟会原先是青年帮伙集团的一个社会服务机构，后因资金不足而解散。据他说，如果华人青年当时有适当的受教育和就业机会的话，许多人本来是不会走上拉帮结伙这条邪路的。

“在唐人街上帮伙头目或帮伙成员的日子并不好过。一天到晚提心吊胆，总怕有人在你背后捅上一刀把你干掉。一年到头在恐惧中过日子。钱，自然可以捞得到；花天酒地固然也挺痛快，但恐惧心理怎么也摆脱不掉。可是这些人又没有别的出路，只好孤注一掷走这条路。假如有别的出路的话，他们是肯丢掉这一行洗手不干的。”

六十年代中，所谓模范少数民族的神话与唐人街上矛盾重重的无情现实形成了多么鲜明的对照！那些在旧金山的格兰特大街与纽约的莫特大街⁽¹⁾上逛橱窗的游客们，恐怕是想不到在这两条大街背后生活着的华人在健康、住房和就业等问题上的烦恼的。

由于唐人街官方领导人多年来所追求的一直是改变和提高华人在美国人心目中的形象，因此他们不愿意把华人社区内实际存在的许多问题张扬出去。旧金山中华总会馆在一九六七年十月二日发表的一篇新闻稿中，对于唐人街的变迁是这样看的：

“今天，新移民的不断涌入，使唐人街人口猛增，大大超过了历史上最高记录的一八八〇年的华人人口数字。华人不断向美国移民，而这一人口增长趋势又非任何华人组织所能控制，仅仅这一个因素，就足以搅乱整个唐人街的正常社会秩序。”

虽然中华总会馆对唐人街存在的问题也不得不承认，但它却又急于强调华人社区的光明面。这篇新闻稿一再指出，华人社区所存在的这些问题在美国其他各民族中同样也存在。言下之意，美国报纸对唐人街的问题的报道是言过其实了。而且它一再向读者表明，作为“华人的代言人”，中华总会馆是完全有能力解决唐人街的各种问题的。

(1) 旧金山的格兰特大街与纽约的莫特大街都是唐人街上的主要繁华街道。——译者

第九章 促进社会变革

在本世纪六十年代，美国国内局势的动荡与华人社区的变迁，使二次大战后美国华人期望获得平等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的梦想，逐渐成为泡影。一批批新移民来到了美国，但展现在他们面前的是一个问题成堆的唐人街——住房短缺、健康状况可悲、失业问题严重。即使是那些生活在市郊的中产阶级华人，虽然已置下了房屋，也获得了“白领”职业，但他们也发现自己的实际生活水平与“美国之梦”仍然相距甚远。事实证明，“华人是模范少数民族”与“华人不需要外界的帮助，他们已经在美国社会中取得了很高的成就”等看法，无论对居住在唐人街的华人，还是对生活在市郊的华人来说，都是有害无益的。它使得唐人街的华人所面临的种种问题得不到应有的重视，所需要的款项也得不到政府的资助。而那些生活在市郊的中产阶级华人，为了保持和无愧于他们业已取得的高度成就和堪称楷模的行为举止，则不得不多方面承受过分的压力。到六十年代中期，一系列的因素终于促使华人向社会强烈呼吁，要求对他们所面临的种种问题予以正视，并决心组织起新的力量促成社会变革，重整唐人街。

民权运动的启示

促使美国华人积极行动起来投身于六十年代的社会变革的重要因素之一，是美国的民权运动。作为美国当代社会变革的先导，民权运动所提出的理想主义口号，后来也推动了美国的大学生、妇女、关心第三世界问题的活动家、反战分子以及穷苦阶层民众所进行的社会变革斗争。

早在一九五四年，美国最高法院便否决了学校教育中的种族隔离制度；继而又宣布，在一切公共交通、娱乐场所、公园和其他各公共场所出现的任何形式的种族隔离现象均为非法。但是美国黑人发现，这些法律条文并没有给他们的社会处境带来多大的变化。于是他们便开始组织声势更加浩大的民权运动，为自己争取被剥夺了的民主权利。可是由于政府缺少有力的措施来保证有关法律的贯彻实行，以至社会上各种种族歧视现象依然存在。

马丁·路德·金和其他美国黑人领袖与黑人组织所提出的非暴力斗争思想，确曾把成千上万的黑人吸引到民权运动的行列中来。但是，六十年代期间，由于黑人区一再遭到警察的袭击，使黑人再也按捺不住暴力反抗的情绪。到一九六五年，一些日益壮大的黑人组织，如黑色穆斯林和黑豹党等组织，逐渐成了民权运动的主要代表力量。虽然一九六四年与一九六五年的民权法案以立法的形式规定反对种族歧视，但这毕竟只是写在纸上的条文，真正得以付诸实施的寥寥无几。黑人社区日益恶化的生活条件，激起了黑人群众越来越强烈的不满，终于在一九六五年与一九六七年，分别在瓦茨与纽瓦克两地爆发了两起黑人暴力骚动事件。

民权运动，以及在它的推动下所出现的其他领域里的各种抗议活动，促使许多人在政治上觉醒起来，年青一代的美国华人也

不例外。多琳·德是在旧金山长老会金马伦堂工作的一名华人，她在回忆自己为何投身这场社会运动时，曾这样说道：

“一九六四至一九六五年，在伯克利校园内兴起了一场言论自由运动。我当时之所以卷了进去，完全是出于自己的良知。原因是我发现当时各种组织并不都有在斯普罗广场发表各自观点的权利。这实在令人难以理解，这太不民主了。我顿时想到，自小在我们脑子里由美国政府所灌输的一整套观念，现在统统都站不住脚了。我感到，一定要明确表示自己的立场：这究竟是不是一个该关心的问题？难道我上大学纯粹是为了来念书的吗？”

“加入了学生运动以后，我又在‘为美国服务志愿队’里工作了一年。因为我认为，除了抵制上课或搞罢课以外，还应该为公众做些事情。离开了‘为美国服务志愿队’之后，起先不知该做些什么，后来有人介绍我到金马伦堂来工作。我发现这儿所从事的工作与众不同，他们不仅帮助青年人，而且也帮助成年人解决各种困难，或是帮他们做些具体事情；或是给他们上些英语课，以便使他们能在社会上找到工作；或者是给他们上美国同化课，帮助他们成为美国公民。自那以后，我便下决心献身于社会服务工作了。”

社会服务机构的出现

一九六四年，美国总统约翰逊提出了“伟大社会计划”。随后，全国各少数民族聚居区便开始创办起各种社会服务机构。比如纽约市，成立了一个综合性的社会服务机构，叫做“华埠策划

委员会”。一九六五年夏天，该委员会利用政府拨款办起了一个“首创”计划和一个青年服务项目，吸引了不少华人专业工作人员、社会服务人员和大学生回到唐人街来。他们发挥各自的专长，有的办起了英语班，有的为社区做些其他工作。在谈到“华埠策划委员会”初创时期的工作以及华人如何支持这项工作的情况时，哈罗德·雷说：

“华埠策划委员会在一九六五年刚成立时，社会上还没有出现其它以华人为主体的社会服务机构，当时实际上也没有社会服务活动。于是到我们这里来寻求帮助的人不断地多起来了。我们就设法使其他机构，尤其是教会，认识到华人区迫切需要开展某些社会服务工作，而且可以得到一些政府拨款。

“志愿参加这项工作的大部分人是第二代美籍华人。他们经历过二次大战和朝鲜战争，而且对唐人街的一切都了若指掌，几乎认识这儿的每一个人。他们对唐人街上长大的孩子尤其关心，希望能通过自己的努力，帮助那些学坏了的孩子回到正路上来。志愿参加这项工作的人多半是医生、护士和教师。“华埠策划委员会”的早期工作，全是靠他们协助开展起来的。

“支持我们的人很多。工作越是有成效，吸引进来的人就越多。自六十年代起开始办起的全部社会服务项目，都是这批人自愿参加开展起来的。因为他们了解这项工作的意义，愿意为之献身出力。”

尽管一开始人们的工作热情很高，但是要在唐人街卓有成

效地开展社会服务工作却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它要求参加这项工作的人员不仅要了解唐人街的历史，而且要建立一整套工作网络，还要对政府主办的各项服务工作有个正确的态度。纽约和旧金山的服务机构开展的活动表明，服务工作的过程，也是工作人员与服务对象相互了解的一个过程。莉兹·杨曾经在纽约唐人街参加过社会服务工作，工作对象是青年帮派集团成员。她发现要做好这项工作，单单靠她过去学过的那些“社会服务”知识是远远不够用的：

“我们是真心实意地想帮助这些孩子，但总是帮不到点子上。我原有的那点本领、那套工作方法远远不足以应付这项工作。因为我发现我并不了解他们从小生长的那个社会环境。更深一层来说，我不了解这些中国孩子看问题、想问题的方法，因为我自己已经相当美国化了。而且我连中国话也说不好，想跟他们谈话、沟通思想都很困难。

“后来，我在亨利学院教‘亚裔美国人问题研究’这门课。为了上好课，我读了大量的书，尤其是有关华裔美国人和亚裔美国人的历史方面的书。结果发现，了解这段历史后，许多情况和背景都弄清楚了。当时我想，要是在搞那项社会服务工作以前就对这些历史有所了解的话，在帮助那些帮派集团孩子的过程中，许多问题就会容易解决了。”

在旧金山唐人街上，联邦政府还拨款设立了“经济辅导委员会”等机构，目的在于帮助新移民，尤其是穷人，适应美国生活，

设法在美国生存。这些机构的工作范围包括开设英语辅导课、提供医疗服务和就业机会以及组织食品救济工作等。

唐人街社会服务机构对美国华人问题所采取的是一种全新的态度。设立这些机构这件事本身，以及它们的服务宗旨，都使唐人街存在的种种问题公开化了。随着这些由政府资助的各种服务机构在全国各地唐人街的设立，华人已不再像过去那样孤立于美国社会之外了。以前由唐人街地方团体所开展的各项服务工作现在都由新建的服务机构承担了下来，而且邀请了许多年长的华人一起参加这项工作。此外，社会服务机构工作人员还对华人界的政治问题不断提出新的看法，从而对唐人街官方领导阶层提出了新的挑战。

美国青年的影响

促使华人积极参与社会活动的因素有许多，除了民权运动与社会服务机构的影响外，广大美国青年的影响也是一个重要因素。随着二次大战以后出生的一大批婴儿长大成人并开始参加选举、进入大学读书和应征入伍，他们开始对当今各项重大问题发表自己的见解。这一代为数众多的美国青年，凭借自己在人口比例上所占的优势与所持的理想主义观点，构成了美国社会中一支被称作“反主流文化”的力量。他们认为美国是个极端追逐物质利益而完全抛弃了人性与博爱的社会，并通过民间音乐的流行歌手与摇摆音乐家，唱出自己时代的心声。他们向美国现实生活领域中的一切传统观念提出了公然的挑战。从服饰到发型，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到人们的举止行为，无一不在他们反对之列。

六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初，是美国青年把一般的叛逆情绪发展为针对各种时弊的抗议行动的转折时期。在美国大学校园里的

华人学生，虽然有些人仍对社会上的游行示威不闻不问，一心只顾埋头念书；但也有不少人已感到，不能不起而倾听美国青年的呼声，加入他们的行列，并最终把从他们那儿所学到的一切溶进自己的亚裔美国人的生活中去。

越南战争

美国对越南战争的干预，激起了千千万万美国人的强烈抗议，使他们进而掀起了一场席卷全国的反战运动。亚裔美国青年则站在这场运动的最前列，他们把自己的命运与大洋彼岸惨遭美军凝固汽油弹杀戮的亚洲同胞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他们认为，越南战争也像二次大战与朝鲜战争一样，对生活在美国的亚裔人的处境有着深远的影响。由于美国在越战中的敌手是亚洲人，因此亚裔美国人的形象无疑在美国公众舆论中遭到极大的损伤。

据亚裔美军士兵讲，越战前在海军陆战队新兵训练中心举行的军事演习中，他们总是无例外地被指定扮演“东方佬”的角色。参加过越南战争的诺曼·纳卡姆拉一九七〇年在一本回忆越南战争的书里曾这样描写美国士兵的残无人道：

“在有些美国士兵的眼里，越南那块土地上根本没有什么越南人可言。因为他们脑子里被灌输了大量的法西斯种族主义教育。在他们看来，在越南居住的并不是什么人，只不过是一群低人一等的动物而已。由于头脑里充满了各种荒诞的念头，完全丧失了人性，因此他们对亚洲人民犯下了种种野蛮罪行。”

从越南战场回来以后，有些美国士兵仍然未能改变对亚洲人

的看法。有时在街头碰见年轻亚裔美国妇女时，他们竟然会联想起越战期间遇到过的女友和妓女，甚至用轻佻下流的越南话进行调戏。

就连美国儿童身上都渗透着越南战争的影响。每逢在校园里和亚裔孩子打起架来，美国孩子都会骂他们是“东方佬”、“支那佬”、“日本佬”、“斜眼儿”等等。亚裔孩子本来就有自卑感，这些蔑称更使他们对自己的身份和价值多了一层疑虑。

亚裔美国人在全国各地组织了大规模的反战示威，并发表激烈演说抨击越南战争的种族主义与帝国主义性质。他们还编了“胡一胡一胡志明，越南一定胜”等歌谣，显示了亚裔人民的团结必胜精神。他们还进一步指出，美国政府对待越南问题所持的种族主义立场，在它对待国内各少数民族问题的态度上同样有所反映。

开展亚裔美国人问题研究

六十年代末期，美国各地大学校园都成了当代重大问题的辩论场所。有关课程设置的辩论尤为激烈。政治上的觉醒与传统的民族自尊心，促使来自第三世界的大学生不断举行示威游行，强烈要求各个大学开设种族问题研究等课程。

华人大学生最早投入了于一九六八年和一九六九年分别在旧金山州立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举行的第三世界大学生罢课示威活动。经过了多次激烈甚至暴力的斗争，这两所大学当局最后终于同意开设种族问题研究课程。紧接着，全国各大学的学生也都纷纷仿效，采取了类似行动。比如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和纽约市立大学的学生们，都是通过示威游行等方式来争取开设“亚裔美国人问题研究”这门课的。因为他们发现通过正常的行政渠道是

解决不了问题的，只得组织游行活动，公开宣传他们的要求与主张，才能奏效。连规模较小的奥克兰地区米尔斯私立女子学院，也是在群众集会与静坐示威的压力下，才被迫同意拨款增设了种族问题研究专业的。

美国种族问题研究课程中，包括对亚裔问题的研究。开设这门课的目的是研究亚裔美国人的特性、历史、文学、语言及社会问题。多少年来，为了在美国求生存，为了赢得美国主流社会的承认，第二代和第三代华裔美国人曾舍弃了自己的传统文化。直到现在他们才意识到，原来他们的民族确实有着一部值得他们引以自豪的历史；有着他们自己的传统文化。他们不禁开始思索这样一个问题：在追求美国化的过程中，他们究竟失去了多少宝贵的民族遗产与文化！

莉兹·杨至今还记得她跟父亲之间关于如何做个美国华人的一席谈话和她本人自我认识的一段过程：

“记得我曾经对父亲这样说过，我首先是个美国人，承认自己是中国人并没有什么光彩。可是父亲对我说，将来总有一天我会想要知道做一个中国人应当知道的一切。我当时觉得父亲真是老古板，满脑子都是不合潮流的老观念。然而，他说的话竟然千真万确。我终于真的想知道关于中国人的一切了。在我多年自我否定、不肯承认自己是中国人、是亚洲人之后，我是多么渴望真正地认识我自己。多么想知道我身上失去了多少宝贵的东西，多么想知道我究竟是谁，我自己的民族文化究竟是什么样子，我的祖先究竟是什么样子，我需要把这一部分空白填补起来。我要做一个有血有肉的实实在在

的人，一个完整的人。可是现在，我像一副残缺不全的拼板。我要把失去了的东西寻找回来，才能了解我自己。我只有承认自己是中国人，才能真正地认识我自己。”

那些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在市郊白人区里长大的华人青年，也开始到唐人街来寻本溯源，找自己的根。不少亚裔美国人问题研究课程规定，凡是回到自己社区参加某种形式社会服务工作的学生，都可以拿到这门课的学分。通过这门课程，他们发现在美国的华人、日本人、菲律宾人等，都有着类似的移民经历，类似的奋斗史和类似的同化过程。通过研究社区，他们还看到，华人社区的现状就像一潭波纹不兴的池水，已有几十年没有发生过剧烈的动荡与变革了。

唐人街的青年

战后出生的华裔婴儿逐渐长大，新移民中的青少年又一批批涌入唐人街，使这里的华人青年人口猛增。可是华人区为他们所提供的居住条件和活动场所却始终十分有限。拿旧金山来说，供唐人街青年和市郊青年进行社交和娱乐活动的场所，一向仅限于圣玛丽教堂、金马伦堂、男青年会和女青年会这几个地方。可是到了六十年代末，这几个场所已远远容纳不下他们，而且也难以满足他们的各种需要。结果出现了拉帮结伙打群架、殴斗逐步升级的状况，最后还酿成了数起谋杀与仇杀事件。

由于有些帮伙青年有过犯罪活动，声名狼藉，以致使唐人街上的社会青年，不管他们是否参与帮伙集团活动，都为此而感到处境窘迫，日子很不好过。在没人过问，无处求援的情况下，一部分美国出生的无业青年于一九六七年组织起一个自助性的团

体，取名“清流社”。该社的发起人之一亚利克斯·辛(音译)是这样解释当时为什么要组织这个团体的：

“我认为凡是在唐人街长大的青年都有某种社会意识，不可能没有。因为他们都知道，他们今天之所以陷入种种困境不能自拔，这不是他们个人的过错，是社会原因造成的。他们在唐人街以外的社会里没有前途，找不到出路，而在唐人街上同样也没有出路。他们有苦闷，有烦恼，却无处诉说。这难道不是社会问题吗？从六十年代中期到末期，他们开始探索自己的出路。在这种形势下所出现的第一个华人青年团体便是‘清流社’。它的英文名称原意是‘合法出路’⁽¹⁾。当时我们买下了这所弹子房，用它作社交场所。大伙常聚在一起，倾吐苦闷，探讨出路。弹子房本身的营业还可以有一部分收入。这些收入可派各种用场，特别是常用来支付打官司请律师的费用，因为不少人的问题与法律有关。此外，还组织过记者招待会，向外界揭露唐人街上存在的问题。这些活动使不少人开始觉醒起来。在清流社的影响下，出现了大批进步青年。他们的主要工作是向社会揭露唐人街面临的困境。”

华人界不少知名人士都支持清流社的活动。中华男青年会和女青年会也是它的主要支持者。但是警方始终不承认这个团体的

(1) “清流社”的英文名称Leways是由Legitimate Ways(“合法出路”之意)两字合成。——译者

合法地位，并且经常对清流社总部进行骚扰。甚至对一些据说是抗拒逮捕的青年采取暴力行动。此外，由于缺少像中华商会这类势力较大的华人组织的支持，他们难以得到较好的就业机会。加上清流社受到多方面的压力，如房租涨价、成员被控在街上挑起殴斗事件等等，结果两年之后，清流社便不得不放弃它原定的组织职业训练、扩大就业机会、开展文化教育和娱乐活动等目标，停止了活动。

清流社的结局使华人青年感到愤懑和震怒，也促使其部分成员在政治上迅速觉醒起来。由于唐人街的亲国民党分子指控清流社是共产党组织，并加以百般敌视；也由于清流社部分成员对新中国和毛泽东思想日渐了解，他们开始用政治眼光看待周围的世界。通过对唐人街社会现状的分析，他们得出结论：唐人街必须进行根本的社会变革。于是一九六八年他们又建立起一个革命组织——“红卫党”。亚利克斯·辛担任该组织的情报部长。他在讲述该组织成立经过时，说道：

“当时黑豹党的革命主张吸引了一大批青年。他们的口号是推翻现存的社会制度。于是清流社的部分成员开始与他们进行联系，这样，黑豹党的活动范围便扩大到唐人街。

“黑豹党的目标是把唐人街上帮伙集团青年组织起来。他们来到了清流社，向华人青年宣传毛主席的思想，讲解革命道理。他们还常散发一本‘红书’，给那些常聚在那儿的人上政治课。结果许多听众都受到了他们思想的感染。

“后来这里较激进的一部分人认为，单靠清流社本

身和合作资本主义的主张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他们认为需要建立一个革命组织，解决唐人街面临的各种实际问题。于是就成立了红卫党。它的纲领基本上是按黑豹党的纲领制定的。就这样，他们便开始在华人区内开展——或者说是试图开展起革命活动。”

红卫党开展过这样几项工作：一、为儿童提供早餐，给部分华人提供免费用膳，在唐人街放映电影连续片等。二、发动了五千名华人联名写请愿书，抗议当局关闭唐人街上唯一的一所结核病诊所。三、越南战争期间，红卫党部分成员专门攻读了有关反对征兵法的课程，与“亚裔法律服务处”一起，帮助一千多名华人青年争取到了缓役资格。

红卫党曾多次与国民党的支持者发生激烈的甚至暴力的冲突，并采取了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立场。这一勇敢的举动，打破了自麦卡锡时期以来唐人街左派政治势力长期处于沉默状态的局面。只是由于人们对十年前那场迫害仍然心有余悸，因此对红卫党的宣传反响不是很大。一九七二年，旧金山的红卫党与纽约唐人街的义和拳组织合并，成立了一个全国性华人组织。其宗旨是更深入地用马列主义观点阐明和研究唐人街问题。

华人社会组织起来

华裔社会活动家们都很清楚，联邦政府对付贫困的某些措施和各类社会服务机构，只能暂时缓和一下唐人街长期以来所存在的复杂而根深蒂固的矛盾。为了对唐人街的政治与经济结构进行广泛而深刻的变革，在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初，美国各大主要城市的唐人街里都纷纷建立起各种进步的华人组织与机构。为了

适应华人社区的需要，为了在唐人街的穷人、老年人、新移民和工人中开展工作打下基础，他们设法把左派理论的各种观点付诸实践，为社区创办起多种为群众服务的社会项目。

比如六十年代后期，在旧金山乾尼街八百号街区陆续出现了不少亚裔美国人组织，都是由华人社会活动积极分子和旧金山地区的大学生组织起来的。像“乾尼街艺术工作室”就是专为华人社区的艺术师们开辟的一个活动场所。“华人进步会”与“义和拳”负责在唐人街举办工人与学生的研讨会，开办幼儿园，放映电影，并在内部组织马列主义、毛泽东理论的学习。“亚裔法律服务处”专门为华人处理征兵及其他法律事务。“大众书店”专门经销来自中国的各种进步书刊。一九七一年成立的“亚洲人民中心”与“为民社”曾经组织过为唐人街上三百户人家提供食物补助的活动，此外还开展各种文化政治活动，举办英语班和暑期青年活动班，组织政治学习小组，并且还创办了一份双语报纸《为民报》。“五四合唱团”专门创作和演出有关政治题材的音乐节目，其首场演出就是一九七三年在“亚洲人民中心”的底楼举行的。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学生和唐人街部分女成衣工还办起了“华埠合作服装厂”，目的是抵制原有一些服装厂对华工的剥削。

“国际旅馆”就坐落在乾尼街沿街商店铺面的楼上。后来这儿成了抗议当局只管城市发展，不顾穷人利益的集会地点。几年以前，黑人住宅区已经首当其冲，成了市区改建规划的牺牲品。现在，唐人街、马尼拉城和日本城⁽¹⁾也都面临着同样的威胁了。这几个地区都是旧金山的主要房地产地段。为了增加这几个地区的房地产收入，地产商们打算把旧房屋统统铲平，重新建造一个庞大

(1) 马尼拉城和日本城都属亚裔民族居住区。——译者

的商业区，外加几个停车场。这些要被铲平的房屋多半是供穷人和老年人居住的廉价旅馆房子。难怪居民们和社会活动家们都把这种市区改建工程称做“市区搬迁”。

即使市区改建规划也包括了重建新住房这一项目在内，然而由于新房子的房租太贵，拆迁户根本支付不起。许多人被迫迁出原住处之后，不得不分散到旧金山各处另找便宜住房。结果市区改建规划不仅毁了原住房，而且也毁了华人社区本身。当年“国际旅馆”的居民曾经坚持他们有权居住低价房屋，而拒绝搬出。他们还通过诉诸法律和示威游行等方式，进行反对迫迁斗争。斗争持续了将近十年，可是最终还是在一九七七年被迫搬了出去。在最后一次冲突中，警察们竟然手持棍棒，有的甚至骑马上阵，冲散支持反迫迁斗争的人群组成的层层人墙，把居民们全部赶出了“国际旅馆”。

七十年代中，旧金山唐人街上还有另外二十多幢住房的居民，也曾组织起来，进行反对迫迁、反对增加房租和抗议不安全的住房条件的斗争。其中最成功的一次是一九七八年的平园⁽¹⁾罢租斗争。这场斗争坚持了四个月之久。“平园住客协会”主席乔治·李讲述了他是怎样参加这次罢租斗争的，以及斗争的前后经过，

“一九七八年八月二十三日，一个小女孩从这幢房子的阳台上摔下来，当场摔死了。人们立即组织起来，要求设安全值班员。房产当局声称他们没有钱，雇不起值班人员。我们跟他们讲理，说别的居民楼都有安全值班员，我们也应当有。他们居然回答：‘那你们就去要吧。’”

(1) “平园”是一幢华人居民大楼。——译者

于是我们便开始拒付房租。我们把这次行动叫做‘罢租’。那是一九七八年十月份的事情。斗争坚持了四个月。最后他们害怕了，开口答应给我们提供这个，满足那个。我们这才停止了罢租。这不，自那以后，我们总算有了大门，有了安全值班员。

“其他社区组织都支持我们的这次行动。而且支持我们的人很多。还有社区的负责人也支持我们，大学生也都支持我们，才使这次罢租斗争取得胜利。组织斗争就得要有外界力量的支持，尽管他们不一定直接参加斗争，但是只要他们支持你，情况就大不一样，你会受到很大鼓舞。”

在纽约，也成立了各种亚裔组织，公开阐明他们的观点。这些组织包括曾参加过反战运动及美国其他主流社会运动的“美亚裔行动会”；包括专门组织亚裔社区工人运动的“义和拳”和“亚裔平等就业协会”；包括开始用文艺形式表达亚裔人文化特征的“地下艺术工作室”和杂志《桥》；包括用马列主义观点研究解决社会问题的“亚裔问题研究小组”及其他不少类似组织；还包括专门提供法律咨询与教育基金的“亚裔法律辩护与教育基金会”等。

纽约的华人学生和专业人员还协助下东城⁽¹⁾医疗保健中心开展一些活动。该保健中心是一个由联邦政府资助、为华人社区提供医疗服务的机构。华人社会活动积极分子们发现，虽然唐人街的许多居民过去都在附近的“高云诺医院”看病，然而这个医院的八百名医务人员中，却只有百分之二十五是华人。结果，由于医生

(1) “下东城”指纽约市曼哈顿区南端沿东河一带。外来的贫穷居民多住在这里。——译者

与病人之间的语言不通，经常发生误诊和错治的情况。为了引起社会各界对这个问题的重视，为了呼吁为华人提供更好的医疗服务条件，华人社会活动家们于一九七一年在唐人街组织了一次大型的“华埠保健展览会”。在为期十天的展出中，整个唐人街变成了一个免费诊所。一百多名社区志愿服务人员、大学生和专业医务人员，向两千五百多名华人居民散发了卫生常识小册子，并为他们量血压、检查结核病和眼科疾病等。唐人街社区对这次保健展览会的反响极大。结果不久便建立起了一个“华埠医疗诊所”。

另有一部分社会活动积极分子，利用“孔子大厦”的建造为例，针对纽约建筑部门拒绝雇用少数民族工人一事，进行了抗议斗争。事情发生在一九七四年。当时围绕唐人街上的“孔子大厦”住宅建筑工程所发生的这场风波，历时长达三个月之久。矛盾的焦点是建筑承包商拒绝雇用亚裔建筑工人。这次抗议活动是由“亚裔平等就业协会”成员与其他亚裔失业工人联合发起的，继而得到了黑人和波多黎各人的支持。示威人群一度使整个建筑工程陷于瘫痪状态。在协助组织纠察线支持这次抗议活动的人群中，有“金龄会”的老年人，也有服装厂的工人。后者是利用工作间歇时间参加游行活动的。斗争也付出了代价，仅在前两周内，就有五十七人被捕。

参加这次抗议活动的甚至还包括唐人街官方组织的部分成员。中华公所主席李文彬曾亲自率领“亚裔平等就业协会”的代表出席调解会议。尽管斗争中出现过行动部署和策略上的意见分歧，一度使斗争力量有所分散，但是那段时间上下团结一致的斗争，还是取得很大成效的。这一场涉及中华公所、政府官员以及建筑承包商三者的十分棘手的政治官司，终于在一九七四年七月获得了

解决。解决的办法是安排亚裔建筑工人就业。这场官司虽说是打赢了，但是华人社会活动家们都清楚地意识到，类似这种斗争以后还会继续发生。因为在美国建筑行业中，并没有明文规定必须雇用少数民族工人。

一九七五年，在美国又发生了一起规模空前的群众性华人抗议示威活动。这次斗争进一步显示了华人维护社会正义的决心。事情发生在一九七五年五月十九日。两万名华人走上纽约街头，强烈抗议美国愈演愈烈的警察暴行。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原香港建筑师、当时在纽约唐人街的餐馆里当服务员的于彼得，在四月二十六日目击了一起汽车事故，当发现警察无理对待围观人群中的一个人时，他当即提出抗议，结果反遭警察毒打，并且以破坏警察执法的罪名被逮捕。这件事激怒了华人界，抗议示威活动持续了整整一个星期。最后一天抗议斗争达到了高峰，示威的人群从唐人街莫特街直奔纽约市政厅。那天上午唐人街上的工厂、商店和餐馆几乎全部停止营业，让职工们参加示威游行。许多商店门上都贴了“停止营业，抗议警察暴行！”的标语。

夏威夷的亚裔人由于在岛上生活的历史较长，占岛上的人口比例也高，因此面临的少数民族平等权利问题不像其他地方那么严重。他们更关心的是经济利益方面的问题，如企业开发、旅游事业和组织工会等等。华人曾经与夏威夷土著、日本人、菲律宾人、朝鲜人以及白人等一起为维护土地权和社区利益进行过多次斗争。一九七〇年在克库卡拉玛发生的抗议行动，就是夏威夷现代历史上这类斗争的首例。这次抗议是由卡拉玛谷地的农民、居民及其支持者所发起的一场反迫迁斗争，但是没有获得成功。最后这片土地还是被凯色-依特纳公司征用，修建起一个高尔夫球场，并为中产阶级和高收入家庭造了一片住宅区。

以后几年中，奥塔镇、魏荷-魏肯谷、沙岛、唐人街和其他一些地区也接连发生过居民抗议迫迁的斗争。此外，唐人街上一个由学生、青年工人和从美国大陆读书回来的大学生所组成的叫做“第三臂”的组织还办起了医疗站，组织起街区周末活动，并创办了一份由伊洛干诺语⁽¹⁾、华语和英语三种文字出版的报纸。当檀香山的居民得知市区改建规划将迫使他们迁入房租昂贵的新住宅时，立即成立了“人民反对华埠迫迁”组织，进行抗议。因为他们知道，强迫他们搬进高房租的新住宅无异于强迫他们迁离唐人街；而迁离唐人街则意味着华人社会的解体。

整个七十年代里，美国各大主要城市唐人街的进步组织，不断引导华人进行反对剥削、抗议高房租、反迫迁和要求增加社会福利等斗争。在解决诸如一九七五年旧金山中西服装厂工人的罢工斗争，和七十年代末纽约市华人餐馆要求组织工会的斗争等等涉及亚裔工人利益的一些劳资纠纷中，华人社会活动积极分子也都起了积极的支持作用。为了缓和唐人街存在的种种矛盾，华人居民和社会活动积极分子们曾办起医疗中心、食品合作社、托儿所、日托班、社区多种服务中心等服务项目，还成立了旧金山的“亚裔人法律决策委员会”和纽约的“亚裔法律辩护与教育基金会”等法律机构。

尽管有不少进步组织不断地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着各项工作，然而也有些亚裔组织却由于政治上的分歧或由于失去了斗争的目标而一个个相继解散。例如几个反对越南战争的组织就是由于后一个原因而解散的。社会上对一九六八年至一九七五年间出现的亚裔人运动所普遍提出的批评认为，社会活动积极分子对于唐人

1) 伊洛干诺语为一种菲律宾语言。——译者

街和其他亚裔人社区所存在问题的认识还只停留在表面上，并没有真正地理解。不过尽管如此，他们在这个时期所起的作用还是不容低估的。他们在组织游行、设立纠察线方面，在各工地以及许许多多的会议上所付出的心血与精力还是卓有成效，颇有收获的。如，在大学里开设了种族问题研究课程；各社区建立了直接为社区居民服务的社会服务项目等等。他们对亚裔人问题的大声疾呼是对所谓“模范少数民族”神话的有力挑战。虽然这些进步组织没有能力改变唐人街的权力结构，但是他们激进的观点却对传统的领导阶层和社会现状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

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初，对于在市郊长大的华裔青年来说，是一个回到唐人街去追寻那失去了的民族文化的时期（他们的父母早在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里就已离开了唐人街），而对于那些在唐人街里长大的华裔青年来说，这也是一个奋力表达自己心声的时代。随着一九六五年以后大批新移民涌入美国，华人社会所面临的问题也与日俱增。华人社会活动积极分子们指出，要改变唐人街目前严重的社区现状，靠任何传统方式都是无济于事的，非从政治上寻找出路不可。

第十章 摆脱社会偏见 树立华人形象

纵观整个美国华人坎坷的历史，华人的形象始终被束缚在一套由社会成见所编织成的模式之中。虽然在对华贸易开始以来以及鸦片战争之后，华人的形象有所改善，但是要确切地描绘出美国华人的特征，却至今还是一项十分艰巨的工作。美国华人是美国少数民族的典范吗？他们全都是开餐馆和洗衣店谋生的吗？华人妇女全都富有异国情调而举止娴静吗？长期以来，由于报纸、广播、电影、电视等舆论工具对华人所作的充满偏见的描绘与报道，又因为与华人的接触交往十分有限，因此许多美国人至今仍把华人视作一个怪癖的民族，对于华人的生活以及华人对美国社会的贡献所知甚少。

美国人对华人的看法，主要是由两个因素造成的。一是美国国内的经济因素。比如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加利福尼亚州出现的劳工斗争中，华工就被当成了替罪羊。明明是各大企业巨头榨尽了工人人们的血汗，但是一幅幅漫画却把华人丑化为吞噬美国财富的蝗虫，从而轻而易举地嫁祸于华工。另一个影响美国人对华人看法的因素是中美两国之间的政治关系。当两国关系友好融洽时，华人的形象便是正面的；当两国关系紧张时，华人的形象则被颠倒成反面的。而这些早期形成的反面形象，又被美国报纸、刊物

甚至教科书在美国人当中大肆渲染。进入二十世纪，随着电影和电视的出现，这些视觉艺术也被用来充当了歪曲华人形象的工具。而且，由于电影、电视都是十分受人欢迎的消遣娱乐形式，因此，它们对形成美国公众心目中的华人形象，更是起着潜移默化、不可低估的诋毁作用。

从“黄祸”到“签语饼”⁽¹⁾

还在早期的无声电影时代，华人就被描写成为具有古怪文化传统的人物。这些电影无不成为当时的排华工具。里面出现的华人不是伤风败俗的恶棍，便是古怪可笑的庸人。当年由美国莫特斯柯普和贝奥格瑞夫影片公司所制作的这类影片有《爱管闲事的华人》（一九〇三年）、《华人异教徒与主日学校教师》（一九〇四年）、《黄祸》（一九〇八年）以及《傅满楚》（一九一四年）等。

一九一九年，迪·沃·格里菲思拍摄了著名的无声影片《残花》。片中出现的华人角色，为后来的华人银幕形象开了先例。这部电影原名为《支那佬与白人女孩》。影片中的男主角是一个“黄种人”，由理查德·巴塞尔迈斯扮演；女主角是一个受欺凌的白人女孩，由莉莲·吉什扮演。剧情是一个黄种人收留了一个白人女孩，并且渐渐地爱上了她。巴塞尔迈斯是美国早期饰演黄种人的白人演员之一。他所塑造的华人总是弯腰驼背、虚弱不堪；眼神则总是由于吸鸦片而呆滞、迟钝。电影中有这样一个镜头：醉酒的父亲发现自己的女儿跟一个“支那佬”呆在一起，顿时火冒

(1) “签语饼”是一种华人餐馆里常见的小点心，里面嵌有一个纸条，上面往往写着一句吉利话或一句古人名言。在此，作者用“黄祸”和“签语饼”示意，美国排华时期的华人形象无非只有两个——不是招惹是非的祸根，便是只会说几句吉利话的庸人。——译者

三丈，大发雷霆。这时，银幕旁边打出的一行字幕是：“巴特林⁽¹⁾最忌恨的是那些不是在美国出生的人”。故事的结尾是这样的：由于“支那佬”对白人女孩的一片痴情遭到了社会舆论的谴责，他最后被迫自杀了，从而黄种人对白人女性的威胁也得以根除。这种处理手法，成了后来美国电影处理亚洲人与白种人恋爱关系的典型模式。

把华人形象丑化到无以复加地步的一部影片，是久演不衰的系列片《傅满楚》。《傅满楚》原著是英国小说家萨克斯·罗默的作品。一九二九年由美国培罗蒙电影制片厂改编，并把傅满楚这一形象搬上银幕。《神秘的傅满楚》一集，专门描写傅满楚如何偷偷追踪英国官员皮特利至伦敦，以便伺机报复。因为皮特利曾经在中国杀死了他的妻子和孩子。

这部先后由沃纳·奥兰和鲍里斯·卡洛夫主演的恐怖系列片，加剧了人们对“黄祸”的恐惧心理。在那个激烈地推行排华移民法时期，这部系列片的放映使人们进一步感到排华移民法律是合乎情理的。傅满楚这一阴险形象给银幕带来的恐怖长达四十年之久。直到一九六七年，才以《傅满楚的新娘》一集告终。但在停演了十三年之后，傅满楚这一形象于一九八〇年又通过彼得·塞勒斯主演的一部影片，再次在银幕上复活。

事实上，华人的反派角色一直不断地在美国银幕上出现。这些影片包括：三十年代中期由贝拉·卢格西主演的系列片《唐人街的幽灵》；同时期的另一部系列片《浮夸的戈登》（描写一个名叫“无情阿明”的头号敌手）；一九六二年放映的《满洲秀才》；以及另外两部电视系列片《夏威夷5—0》和《无法完成的使命》。

(1) 巴特林是影片中白人女孩父亲的名字。——译者

由于当时以傅满楚的故事为题材的影片在美国票房价值极高，这使得好莱坞电影制片商对于拍摄《东方好人》之类的影片是否有销路、能否吸引观众，曾表示怀疑。起初，他们试着很谨慎地把小说家厄尔·德·比格斯在二十年代创作的一个华人形象陈查理搬上银幕。第一部描写陈查理的影片是一九二六年放映的《没有钥匙的房子》，片中陈查理由日裔演员乔治·库瓦扮演。开始，这只是一个很不起眼的角色。后来，直到扮演过傅满楚的美国影星沃纳·奥兰主演陈查理这一角色时，人们爱屋及乌，这个人物形象才跟着出了名。当然，陈查理这一形象之所以能在银幕上站得住脚，还有另一个重要社会原因。那就是由于当时美国颁布了更加严格限制华人入境的法令，因此国内的排华情绪有所缓和，观众也就比较容易接受银幕上出现的仁慈善良的华人形象了。

陈查理这一角色曾先后由奥兰、西德尼·托勒和罗兰·温特斯等人扮演，共出现在五十多部影片里。这是一个足智多谋、处处比白人警官棋高一着的人物，但是仔细一推敲便会发现，这仍然是一个白人种族主义思潮的产物。不信你看：在陈查理嘴中念念有词的，无非是那么几句嵌在箴语饼里的哲语箴言，或是几句惹人发笑的孔子说教，完全是一个令人捉摸不透的人物。而那些扮演陈查理的白人演员，则因为全然不能把握华人言行举止的特征，因而只能靠一些温文尔雅的动作、弯腰驼背的姿势、内八字式的走相以及虚假做作的说话腔调来取悦观众。

一九八〇年，描写陈查理的一部新片《陈查理与龙后》打算在旧金山唐人街开拍。消息一传开，立即遭到华人界的强烈反对。他们在旧金山和好莱坞两地举行了“停拍陈查理！”的示威游行。但是制片商们却不顾华人的抗议，仍一意孤行地继续炮制他们心目中那些版浇模铸的华人模式形象。

“功夫”热

香港和台湾拍的功夫片，在美国各大华人区都备受欢迎。六十年代大批新移民涌入美国之后，功夫片变得尤其热门。由于过去好莱坞影片一向把华人描绘得荒唐可笑，所以现在功夫片里的华人形象使人感到耳目一新。尽管许多影片中出现的主要情节和场景都十分雷同，但是华人还是喜欢这些片子。因为他们感到，片中的人物更接近现实生活中的华人男女老少，他们都有着各自的喜怒哀乐，有着各自不同的气质与性格。影片融演员超人的武艺与电影特技的魔力于一体，使功夫艺术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在观众心目中，功夫片里的人物是为正义而战的勇士的化身。他们身怀绝技，充满豪气，对于身处异域备受歧视的美国华人来说，是一种莫大的精神鼓舞。

著名武术家、功夫片演员李小龙⁽¹⁾出生在旧金山，在香港长大。七十年代初，他在许多香港片以及香港与好莱坞合拍的功夫片里担任主角，影片卖座率打破世界最高票房纪录。李小龙勾魂夺魄的魅力和他正宗的武功绝技，使美国电视屏幕上所有的功夫片都黯然失色。相比之下，白人功夫演员戴维·卡拉代恩所扮演的少林和尚，纯粹是一个痴头呆脑、在美国西部荒原上茫然漫游的蛮汉。

在好莱坞发现功夫片有利可图之后，立即向影院投放了一大批香港功夫片。每逢一部新片上映，观众订票都空前踊跃。这类影片还特别受美国另一个少数民族的欢迎，这就是美国的黑人。这不仅仅是由于他们喜欢影片中的武打场面，而且还因为片中表

(1) 李小龙的英文名字为Bruce Lee。——译者

现的为正义而战的精神引起了他们的共鸣。

在亚裔美国人看来，华人以武林大师的形象出现在银幕上，比起过去那些凶神恶煞般的傅满楚形象、日本军官穷兵黩武的战争贩子形象、满嘴孔夫子说教的书呆子形象以及俯首贴耳的奴仆形象，显然是前进了一大步，不可同日而语。但与此同时，功夫片也给华人带来了一个新的模式形象——似乎人人皆为武功大师，个个都是超凡入圣。另外，这阵功夫热在小学校园里和市区街巷里也惹出了不少麻烦。

银幕上的东方女性

美国电影、电视、报刊、杂志里出现的亚裔女性，不外乎是这样几个模式形象：凶狠的泼妇，百依百顺的艺妓，或是王苏珊一类的色情女郎。华裔女演员黄柳霜⁽¹⁾的发迹，是美国电影业利用异国女性抬高票房价值、获取高额利润最突出的一例。黄柳霜出生在洛杉矶唐人街。自二十年代无声电影时期从影以来，这位天资超人的女演员到六十年代时已拍过一百部影片，蜚声国内外影坛。《巴格达窃贼》(一九二四年)是她拍的第一部影片。这是美国有史以来第一部充分利用异国服饰与场景拍成的电影，也正是这部影片，把黄柳霜捧上了明星的宝座。在以后的年代里，她先后饰演过多种角色：不受传统观念束缚的华人少女、女恶棍、荡妇等各种女性，有时也扮演女主角。在一九三一年拍的《龙的女儿》一片中，她甚至还饰演过傅满楚的后代。

黄柳霜是最早成名的一位出色的亚裔影星。她的表演既富有东方女性特有的神韵和魅力，又不乏西方观众能够欣赏的气质与

(1) 黄柳霜的英文名字为Anna May Wong。——译者

风度；着以华美的西方服饰，配以观众熟悉而流利的英语——集这一切特色于一身，是她走上成功之路的奥秘。在她一举成名之后，由于过的是极端西方化了的生活，使她变得逐渐与华人社会疏远和陌生了；但这并没有隔断她对祖国的恋情。一九三六年，她同许多第二代华裔青年一起回到了祖国，用她自己的话说，是去“花一年的时间，观察东方的文化”。在这段时间里，她曾一度为不能处理好自己的影星身份与她对祖国人民尽职这两者之间的矛盾而深感困惑不安。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黄柳霜曾一度从影坛消失，为当时的联合服务机构USO⁽¹⁾和美国华侨统一义捐救国总会工作。在四十年代后期，她曾再度重返影坛；但已时过境迁，盛名难再。

具有异国情调而又色情的亚裔女性形象，始终不绝于好莱坞银幕。六十年代初，好莱坞招聘亚裔和波利尼西亚族女演员，许多年轻姑娘来到了加利福尼亚州。一位欧亚混血女演员派勒·苏丽曾这样谈起当时电影业的盛况：“东方籍和欧亚混血的女演员格外受好莱坞的青睐，而且往往被起用饰演主要角色。我最近还演了一位波利尼西亚女郎。不过她完全不是那种穿沙笼裙的当地土著姑娘，让我穿的是上下分两截的游泳衣。”然而亚裔女演员地位的改善实在是非常有限。大部分亚太裔女演员扮演的角色，仍不外乎是酒吧间的招待、夜总会的舞女，或者是唐人街上一个什么女人。想获得一个扮演稍有分量角色的机会，实在是难而又难。

在不少美国电影里，都允许表现白人男子与亚裔女子相爱的情节。如影片《王苏珊的一生》、《爱情无限美》、《离别》和《金刚

(1) USO为United Service Organization的缩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一个提供娱乐消遣活动、慰劳军人的机构。——译者

钻》等，表现的就是这个主题。但是反过来，亚裔男子与白人女子相爱的内容，在电影里是绝对不允许出现的。这已成了种族之间的恋爱禁区。从一九一五年拍的《骗局》直到现今的许多美国影片，这个禁区始终没有被突破过。因为根据当时美国社会道德舆论，亚裔男子似乎是对白人女子的一种威胁。

进一步 退两步

到了六十年代，表现华人模式形象的文艺形式，又翻出了新花样——唐人街又以好莱坞歌舞节目的形式被搬上了舞台。一九六一年演出的花鼓戏《万象更新》和《格兰特街》，曲调确实动听悦耳，但是内容仍然没有跳出陈腐的老框框，没有摆脱华人的模式形象。在好莱坞文艺作品中，难得看到一个以胜者姿态出现的华人，难得找到一个比陈查理和傅满楚更有血有肉的人物。偶尔出现少数几个例外，也不过是凤毛麟角。比如，在一九六〇年放映的《走如龙》一片中，詹姆斯·史盖特塑造了一个比白人歹徒枪法更为高明的华人角色。又如，在一九六六年上映的《沙卵石》一片中，马科成功地塑造了另一个华人形象——一个名叫宝汉的轮机舱学徒工。马科还为此荣获美国电影艺术学院金像奖。

但是总的说来，华人形象是平淡无奇而千篇一律的，男仆、恶棍、异国情调的酒吧侍女、娴静拘谨的古代闺秀等等，如此而已。尽管人们对此愤愤然，并且纷纷投书表示抗议，但是这类庸俗的角色却屡屡出现在电影、电视剧本中，自七十年代至八十年代从未间断过。比如，电视系列长片《夏威夷5—0》中所出现的那些在杰克老爷身边的夏威夷人和华人随从，除了只会应一声“是，老爷”外，就什么戏也没有了。扮演华人滑稽角色的，则无例外地是些戴着深度眼镜、操着一口洋泾浜英文、长着满嘴大龅

牙的人。连那些在星期六上午专为儿童播放的电视动画片里出现的华人，也都是香港弗洛伊斯式的人物——斜眼、龅牙、满嘴孔夫子的说教——这是一个在一九七〇至七一年电影节上放映的影片《真杰里·刘易斯，请坐！》中的人物。

郭邓如鸯是一位资格很老的好莱坞女演员，历来坚决主张电影应该塑造体面正派的亚裔人形象。她曾经谈到，美国电影业完全脱离了现实，影片里的亚裔人形象根本不是现实生活中的人物：

“在表现亚裔人方面，美国的电影、电视要落后于现实生活五十年。他们至今还只把我们当成电影的点缀品，不肯让我们饰演有性格的重要角色。电影里的女医生从来不会是亚裔妇女；甚至在表现医学题材的电影里，你也别想看到任何一个当护士的是亚裔妇女。可是今天在现实生活中，不管你走进哪个医院，都有半数的护士是亚裔妇女。”

这位加利福尼亚州出生的女演员还谈到，亚裔男女演员都很少有机会演到一个较重要的角色：

“在我演过的所有角色中，我感到难度最大但我却喜欢的一个，是清朝的慈禧太后。其实每个女演员都盼望能演这样一些角色。但是令人感到压抑的是，分派给亚裔女演员的角色往往都是些苍白无力、没有个性的人物，使你觉得根本没有演头，因为这些人物的身上没有什么戏好演，……都是些十分浮浅的模式人物。记得六十年

代里，有个电影制片人打算拍一部描写中国姑娘沦为娼妓的片子，结果遭到整个演员班子的一致反对，我是其中最激烈的一个。没有人肯拍这种戏。不仅如此，我们还自己组织起来，到电影公司去抗议，坚决要求他们改变拍片计划。结果公司被迫撤销了原计划。不过那一次在这件事情上我们也确实闹得很凶。”

美国华人文化

六十年代，美国各少数民族经历了一个民族自豪感的复苏时期。这种自豪感不仅激励着他们在政治、经济上要求更好地掌握自己的命运，而且在文化上也要更充分地表达自己的心声。七十年代是美国亚裔文化的真正复兴时期。各行创作艺术家们加强了相互的联系，在彼此接触交往中发现他们有着许多类似的经历和见解，并且发现可以从不同的角度相互学到许多东西。他们回顾、分析了在美国书刊、电影、电视中所出现的种种华人形象，认为这些华人形象都是无法令人接受的，然而他们也意识到，这些形象是由于历史上经济、政治和种族歧视等原因而强加在华人身上的，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也曾一度为华人自己所默认了的。

但是，经过更深刻的观察与分析后，这些文化工作者发现，在美国华人中还是保留着自己的民族文化遗产，尽管她历尽了数十年的压抑与摧残，但还是完好无缺地保存了下来，闪烁着耀眼的光辉，并且正在以崭新的面貌继续发展。他们也发现，正是华人在美国世世代代的经历，使他们铸就了自己的处世哲学、道德规范以及自己的言行举止。如今，他们每时每刻都在文学、美术、舞蹈、音乐和电影等领域里探索着新的天地，表达自己的心声，并且利用这些文艺形式来歌颂自己的民族与文化。

文 学

早期到美国淘金和筑铁路的华工，大多数都是目不识丁或识字不多的农民。但是也有一部分有文化的人，远涉重洋来到了“金山”。这一部分人，以及中国国内一些作家，都写过有关旅美华人生活经历的作品。

早期华人文学作品的主题，多半是表现华人的苦难遭遇以及他们因当时中国政府无力帮助它的海外臣民而产生的忧思如焚和灰心失意的情绪。这方面的作品，包括十九世纪八十年代驻旧金山领事黄遵宪所写的长诗《逐客篇》。此外，还有一批在一九〇五年抵制美货运动推动下所涌现出来的小说、诗歌、杂文及歌谣等。这些作品都是华人作家为抗议美国排华法案而作的，其中包括小说《劫后余烬》、《海外华人血泪史》和《黄金世界》等。

在音乐方面，华人还通过短小的歌谣和大型戏剧等形式，表达移民所蒙受的苦难和屈辱。当时有一组名为《木屋拘囚吃尽苦》的广东民谣（作于一九一一或一九一二年），其中有一节，如泣如诉地道出了当年华人移民的衷肠：

家食柴米患，
债本来金山，
关员审问脱身难，
搜往埃仑⁽¹⁾如监犯。
到此问，

(1) “埃仑”指的是旧金山湾内的小岛 Angel Island (即“天使岛”)。当年华人移民拘留营就设在此。——译者

啼寒长嗟叹，
国弱被人多辱骂，
俨然畜类任摧残。(1)

当年的华人报刊杂志也刊登报道、社论和其它各种形式的文章，揭露华人在天使岛拘留营所蒙受的屈辱。这些文学作品(包括小说、诗歌、民谣和报刊文章等)有力地表明，许多华人从一开始就对美国排华时期的一系列种族主义行径深恶痛绝。虽然他们在外交上完全无依无靠，在法律上也只能任凭美国法庭的摆布，但他们还是通过报刊、文艺等各种形式和途径进行抗议和斗争。他们的这些努力对日后来美国的华人确有裨益，使他们对在天使岛将会遭受的苦痛有了提防和准备。

二十世纪初，曾有几位中国政府官员和华人学者用英文出版过一些书籍，目的是让美国人对中国人有所了解。显然是希望通过增进了解能改善华人在美国的处境。这方面的作品包括容闳(2)于一九〇九年写的《西学东渐记》(3)和屠汝悚于一九二三年写的《美国华人真貌》。

最早拿起笔来用英文写小说表达早期美国华人心声的作家，

(1) 这是一节民谣的原文。摘自《金山歌集》。(金山正埠大光书林印。)——译者

(2) 容闳(一八二八——一九一二)是一位杰出的爱国华侨学者。早年留学美国，是我国留学外国取得大学学位的第一个中国人。曾任清政府驻美副公使，负责我国留美学生的培养教育工作。——译者

(3) 《西学东渐记》是容闳晚年所撰写的一本自传体的回忆录。原文系英文，书名为《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由徐凤石、恽铁樵译成中文，商务印书馆出版。——译者

恐怕要推英国出生的欧亚混血女作家水仙女⁽¹⁾了。她在排华时期所发表的作品里，笔下的人物一反那种安分守己、唯唯诺诺的寒酸相，周身透发着生活在西海岸的华人所特有的性格与气质。作者用真实的华人形象取代了“约翰支那佬”那种被歪曲了的华人形象。她的一部分短篇小说曾于一八九六年陆续发表在加州《阳光大地》杂志上，后来又于一九一二年编入她自己的小说集《春香夫人》里。

二十年代中期，陈查理这个虚构的人物形象已在美国妇孺皆知。这一形象告诉人们，美国华人始终生活在双重民族文化之间。他们能讲一口词藻华丽的英语，然而言谈之间却又不乏东方古老的箴言哲语。在人们心目中，美国华人具有双重性格——一半是中国人的，一半是美国人的；而且他们具有入乡随俗、适应各种环境的能力。从这个角度描写美国华人的小说很多，其中包括《唐人街真面目》（一九三八年出版，作者“两个人”⁽²⁾）；《父亲与裔昌》（一九四三年出版，作者刘裔昌）；《第五个女儿》（一九四五年出版，作者黄玉雪）和《泰明造的房子》（一九六三年出版，作者李金兰）。由于当时美国国内以华人为题材的文学作品寥寥无几，所以这几位华裔作家早期写的一批自传体或半自传体小说便进入了美国出版市场。这些作品进一步告诉美国公众，华人虽然是一个独特的民族，但他们并不构成对任何人的威胁。

雷廷超⁽³⁾的小说《请喝一碗茶》（发表于一九六一年）标志着华

(1) “水仙女”是这位女作家的笔名。她的原名为 Edith Wharton。——译者

(2) “两个人”的原文为 Leong Gor Yun，是作者的笔名，取音于广东话“两个人”的读音。该书由两位作者合写，一位是美国人，一位是华人。——译者

(3) 雷廷超的英文名字为 Louis Chu。——译者

人文学创作已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在这之前，唐人街往往被当作猎奇小说的题材加以描写。而在雷廷超的小说里，唐人街的真实面貌被如实地反映了出来。作者写出了纽约唐人街的单身汉社会，写出了这里人们的孤独感、抑郁心情以及他们无依无靠的境遇，也写出了单身汉社会内部的动态。作品里出现了不少译成英语的广东家乡话，这与许多早期华人文学作品那种词藻华丽而矫揉做作的文体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纽约的小说家、诗人张燊芳⁽¹⁾既是巴纳德学院的一位教师，又是一位多产的华裔作家。她的作品并非全都是描写美国华人生活经历的，但是她的第一部小说《爱情的疆域》（一九五六年出版）却是围绕着这一题材写的，并且是一部说服力、感染力极强的作品。小说从一个生活在中国的欧亚混血儿的角度，着力描写了东西方文化在主人公身上表现出来的冲突。作者在这里触及到了一个凡是具有双重民族文化的公民都会面临的问题，即如何选择和确定自己的民族身份与政治观点。除这部小说外，张燊芳还创作了另外四部小说：《一个三十岁的女人》、《人生激情》、《城里仅有的娱乐》和《心心相印》。她也发表过不少诗作。此外，她还担任《美国笔会》的编辑工作。

王肖恩（音译）的小说《本垒》于一九七九年出版。虽然在华人文学史上这是一部姗姗来迟的作品，但却是第一部出自华人男作家手笔的小说。作者运用诗一般流畅而深邃明晰的语言，叙述了一个第四代华人雷斯福特·陈的一生，描写了他一生中对他全家四代人旅美家史的追溯与探索。王肖恩出生于加利福尼亚州，生活在西雅图。还在大学读书的时候，他就发现不仅周围有许多亚裔

(1) 张燊芳的英文名字为 Diana Chang。——译者

美国作家，而且很可能在美国保留着一套完整的亚裔文化传统。他最早结识的两位作家是陈耀光⁽¹⁾和赵建秀⁽²⁾。

王肖恩谈到与其他华人作家联系的情景：

“我们四处联络，找人交谈，就这样开始了我们《哎！》⁽³⁾一书的编写工作。我们的做法是，先找到一位作家，再由这位作家向我们提供一些他二十年前认识的一些人的名字——也许这些人至今仍在从事写作。我们还派一些旧金山州立大学的学生帮我们到旧书店和加利福尼亚大学图书馆去查阅他们所能想到的每一个华裔作家和日裔作家的名字。也让他们到废旧书店去翻。他们不必仔细看每本书的书名，只要站在十英尺外找书架上那些竹笋字体⁽⁴⁾的书名就行了。”

汤婷婷⁽⁵⁾是近年来美国主流社会文艺评论家和广大读者最熟悉的一位华裔作家。她的小说《女斗士》曾获一九七六年“全国图书评论界奖”。她的第二部作品《中国人》（一九八〇年出版）同样是一本畅销书。虽然她的作品属于非小说类文艺书籍，但她还是用富有诗意的语言，以她独特的观点，描述了加利福尼亚她一家

(1) 陈耀光的英文名字为 Jeffery Chan。——译者

(2) 赵建秀的英文名字为 Frank Chin。——译者

(3) 《哎！》一书是一本由赵建秀、陈耀光、劳森·艾那达和王肖恩四人合编的亚裔美国作家作品选集。一九七五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作者

(4) “竹笋字体”指英语大写字母中每一笔都呈竹笋形状的字体。许多华裔作家的作品书名都用这种字体写成。——译者

(5) 汤婷婷的英文名字为 Maxine Hong Kingston。——译者

人的生活经历。这两部作品在创作技巧方面，都把现实生活与梦幻色彩和中国古代民间传说水乳交融地交织在一起，赢得了美国主流社会文艺评论家们的一致赞誉。他们称她的作品为“具有强烈的吸引力”、“富有自然魅力”。但是她的作品也引起了不少华人作家的非议，他们担心她的作品会导致新的华人模式形象。

在儿童文学领域里，作家叶添祥⁽¹⁾通过他的小说《蜜水》(一九七六)、《猫头鹰的后代》(一九七七)以及获奖作品《龙翼》(一九七五)等作品，不仅向儿童、也向成人展现了美国华人生活中许多感人而幽默的场面。他在作品中巧妙地运用了美国华人的语言，维妙维肖地刻画了各种人物关系。不论是风雪漫漫的塞拉山上的华人铁路工之间还是唐人街单间屋里的老奶奶与小孙女之间的关系，都是真实可信的。

华裔诗人的队伍也在不断扩大。当代诗人有朱丽爱⁽²⁾、艾伦·钟·刘、梁乔治(音译)、玫玫·伯塞尔洛格、江费(音译)、卢永德(音译)、马劳伦(音译)和崔姬蒂(音译)等。少数诗人出版了自己的诗集，但大部分诗作都收集在诗选中，也有一部分发表在《新人园地》、《桥》和《竹岭》等杂志上。

七十年代中，美国出现了各种亚裔诗人和作家组织，其宗旨是切磋写作技巧、增进相互协作。首届“美国亚裔作家会议”于一九七五年在奥克兰召开。之后几年里，又分别在西雅图和檀香山召开过两次。七十年代末，还出现了两个妇女作家团体，一是洛杉矶的“美西太平洋亚裔女作家创作协会”，一是旧金山的“自由妇女作家创作室”。这是两个供创作艺术家们为读者和观众朗读新创

(1) 叶添祥的英文名字为 Lawrence Yep。——译者

(2) 朱丽爱的英文名字为 Nellie Wong。——译者

作的诗歌和表演戏剧新作的场所。

戏 剧

最明确地提出美国华人具有特殊的文化敏感性这一理论的，是加利福尼亚州出生的赵建秀。他从事过教学工作，发起组织过各种会议，并且与别人合编过大量亚裔文学作品选集。在向广大读者和公众介绍老一辈亚裔作家文学作品方面，他起着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正是这些老作家多年来创作的一批又一批作品，证实了亚裔文学在美国始终存在这一事实。赵建秀本人虽然也发表过许多散文和短篇小说，但他主要是以剧作家而闻名。

赵建秀创作的《鸡屋华人》于一九七二年在纽约一家剧院上演。自己的剧作能在美国主流社会剧院里上演，这在亚裔美国作家中还是首例。赵建秀为纪念美国建国二百周年所写的另一个剧本《龙年》，一九七五年还通过美国公共广播电视台向全国电视观众进行了播放。赵在一九七九年曾经对檀香山一位新闻记者说过这样一番话：“华人横跨太平洋来到了美国，在这儿定居下来，学会了两种语言。这样的民族决不能说是一个消极无能的民族！我剧本里的人物都是历史的牺牲品。他们一生拼命挣扎，与世抗争。他们看到这个世界不公平，但却不知道问题的症结在哪里。”

还有一位华裔作家叫黄哲伦⁽¹⁾。当他还是斯坦福大学的一名学生时，他的剧作《新移民》就被选中在一九七九年奥尼尔全国剧作家会议上公演（这次会议在康涅狄格州的沃特福德举行）。该剧一九八〇年曾在纽约国家剧院久演不衰；之后又在洛杉矶和旧金山再度由亚裔剧团搬上舞台。《新移民》被评为一九八〇——八

(1) 黄哲伦的英文名字为 David Henry Hwang。——译者

一年度戏剧节最佳新剧目，并荣获奥比奖⁽¹⁾。剧本回顾了美国出生与非美国出生的华人移民(后者又称“刚下船的新移民”)之间的文化冲突；探讨了是什么因素一度使二者互不相容，又是什么精神最终使他们团结一致的。在剧中扮演主人公的演员楼约翰(音译)被《纽约时报》称为天资聪颖、颇有前途的演员，并获奥比奖最佳男演员奖。黄哲伦还曾以特邀剧作家的身份应邀参加一九八一至八二年度纽约莎士比亚戏剧节。此外，他发表过的作品还有《忠诚》、《加迪那的热恋》、《姗姗来迟的爱情》和《睡美人的家》等。

由于多年来在舞台和影视屏幕上一直很少看到真实而有血有肉的亚裔人形象，因此在七十年代时，亚太裔文艺演出界人士又在美国东海岸和西海岸组织了不少新的文艺团体，发展了各类剧团，定期换演各种剧目，从而为亚裔剧作家和演员提供了更好的创作条件和更多的演出机会。这些新的文艺团体包括洛杉矶的“东西话剧团”、旧金山的“亚裔戏剧创作室”和纽约的“泛亚戏院”等。

美 术

绘画作为一种美术表现形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近些年来，不少华人画家又在这个领域里探索着新的创作途径。

多拉·傅·李就是这样一位画家。她年幼时就在家乡北京初露艺术才华。十一岁起，开始从师于国画大师，学习绘画。五十年代里，她又在日本东京从师于中国名画家普林斯·蒲·瞿。六

(1) 奥比奖是每年一度授予外百老汇优秀剧目的奖。——译者

十年代，全家在美国马里兰州贝塞达定居下来。自那时以来，她举办过多次个人画展，并参加过数次集体画展。仅她一人所创作的水粉画和雕刻艺术品中，就有三十多件获奖。她在教授绘画课程中，始终坚持传统的艺术风格；与此同时，她在西方的生活经历，又使她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创作风格：

“自六十年代起，我就开始尝试用中国传统的国画形式来表现首都华盛顿。试画了多次，都不成功。但是我一直坚持不断地摸索，以求另辟蹊径，用国画来描绘我喜爱的华盛顿姿影。我所用的绘画材料（颜料、画笔、画纸）全是绘国画用的，与西方绘画材料完全不同。另外，我的画虽然表现的是西方题材，但是画面布局和着色都是国画风格。比如，一般说来，画面上的天空部分我都不着色。因为根据国画的特点，画面宜留出适当的部位，供欣赏者去体味、去充分发挥他们的想象力。”

另一位华人画家是杨度（音译）。他曾先后在衣阿华州和纽约州学习美术。一九七三年回到故乡夏威夷，便开始用难度极高的工笔水粉画技巧描绘夏威夷的风光。他的入画题材丰富多样，有夏威夷岛上的旅游者，也有跳呼拉圈舞的女郎，甚至连商店货架上的大听菠萝罐头和苏门拉玛面条，以及唐人街菜场上的活鱼鲜虾，也无不栩栩如生地跃然于他的画纸上。

“我的作品，画面上展现的是现代夏威夷的风貌，而其蕴藉的内涵是我对夏威夷群岛的热爱。我画的多半

是当地唐人街的风情，但别处也有唐人街。所以，虽然我具体取材于檀香山的唐人街，但是应当把它看作既可以是纽约的又可以是旧金山的唐人街；……因为虽然画面上我所表现的是随时直观摄取的一幅幅景物，但是我所努力追求的，是能突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让画面上的景物升华到一种旨趣更高的意境。”

还有一位华人画家是吴约翰(音译)。他曾经说：“美国的文化对我吸引力太大了，因为它蕴藏着世界各民族的文化。它是一个璀璨斑斓的民族文化拼盘，并非一个民族文化熔炉。当然各个民族也应摒弃狭隘的民族意识、乐于接受其他民族的文化。”他是纽约一位无固定职业的自由画家，曾经创作过大量不同题材的作品。在他家乡西雅图国际区有一幅大型壁画，就是他的作品之一。这幅画的主题着力表现了华工对开发美国西北部太平洋沿岸地区的贡献。此外，他还为纽约“地下艺术工作室”举办的一次摄影展览创作了另一幅壁画，题为《被遗忘了的过去：美国华人的成就与文化》。壁画按历史年代顺序，再现了美国华人的奋斗历程及其优秀的文化传统。作品气势雄伟，引人注目。

音 乐

美国华人的音乐，以往有这样几种形式：民乐演奏，地方戏曲，唐人街游行队伍中的乐队，以及四十年代出现的舞蹈乐队和六十年代出现的摇摆舞乐队——后两者是美国主流社会音乐表现形式的反映。六十年代以来，不少华人音乐家又创作和演出了专门反映美国华人生活和亚裔人生活的许多音乐作品。

纽约音乐家兼诗人秦查理(音译)，六十年代时曾在格林威治

村⁽¹⁾参加过民间音乐演出，并随一个摇摆舞乐队到美国各地巡回演出。但是自七十年代初以来，他便专心致力于亚裔人音乐的创作和演出了。

“那时候许多亚裔青年，也有一些老年人，正在设法回到自己的亚裔人社区来，一种强烈的民族意识也正在形成。在这之前，美国的亚裔人已处在日益消沉、濒于销声匿迹的时期。在亚裔民族觉醒运动兴起的同时，黑人运动也在日益高涨。当时越南战争还在持续着。这场战争迫使亚裔人意识到，在这个紧要关头，他们至少应该站出来表明自己的立场和观点。在那些日子里，晚上回到家中吃晚饭时，打开电视机，经常看到长得很像自己叔叔、阿姨的人们被子弹打穿了头颅，或是正从燃烧着的茅屋里往外逃命。这种场面实在令人在感情上难以忍受。我自己深深感到，我有话要说，我要拿出行动来，决不能无动于衷，袖手旁观。

“当时大伙都想为整个运动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我自己是搞音乐演奏的，正巧又遇上了另外两位同行——诺比柯·米亚莫特和克里斯·依吉玛，于是我就跟他们一起，到全国各地的亚裔人社区去举办音乐演奏会。前后共演出了三年。我们觉得有责任为他们演奏些亚裔人自己的音乐，演奏些他们过去接触不到的内容。当时不单单我们在这样做，还有许多人也都在各个不同的领域内做着类似的工作。这项工作目前还在继续进行着。

(1) 格林威治村是纽约市华盛顿广场以西的一个地区，一度是美国艺术家、作家和演员等汇集的地方。——译者

我始终认为,应该创作出能够表现我们亚裔人生活、体现亚裔人观点的亚裔人音乐、亚裔人文学和亚裔人艺术。”

余本尼(音译)是从小在洛杉矶长大的一位华人音乐家,幼年起就在他父亲开的洗衣店后间学钢琴。六十年代他曾协助组织过一个名叫“广岛”的亚裔乐团;后来又与歌唱家诺比柯·米亚莫特和其他几位西海岸音乐家一起,组织了“彩虹武士”乐团。余本尼自己还曾创作过一个摇摆舞剧《什锦》,描写洛杉矶年轻一代华人的生活。该剧于一九七九年夏季首次上演,当时是作为由“东西话剧团”演出的讽刺歌舞剧《美国造》中的一个片断搬上舞台的。

舞 蹈

不少亚裔舞蹈团已把华人在美国的生活经历编成舞蹈搬上舞台。一九七七年,华人舞蹈家王仁璐在加利福尼亚州拉霍亚主演了她的舞剧《金山》。这是第一部以美国华人历史为题材的大型舞剧。它以大海和蓝天为背景,完美地将音乐效果与造型艺术融为一体。美国其他地区的许多亚裔舞蹈设计家与演员,也都在各个舞蹈团体充分施展着各自的艺术才华。这些舞蹈团体包括旧金山的“亚裔舞剧团”和纽约的“摩丽塔歌舞团”及“亚裔舞剧院”等。纽约的华人江菁(音译)是一位善于汲取中、美两国舞蹈技巧精华进行艺术创作的舞蹈设计家。此外还有温斯顿·唐。他在一九七八年创作的舞剧《三寸金莲》曾获奥比艺术奖。

电影、电视与广播

由于好莱坞电影里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复那些模式化了的东方人脸谱,因此亚裔艺术家们感到,要想塑造真正的亚裔人形

象，非自己动手改变现状不可。各个社区里一些从事独立经营的电影制片人，都充分利用他们有限的资金，尽力制作题材新颖、形式多样的各种影片。比如在七十年代历届亚裔人电影节上，都曾经放映过多种纪录片、小型故事片、大型故事片、动画片以及其他许多标新立异的电影佳作。洛杉矶影视公司也专为亚裔人社区制作和播映了许多部新片。其中《美国华人》一片记述的是华人作家康尼·杨·余的一生，虽然影片追溯的是一个人的身世，但它反映的是整个旅美华人的共同经历。另一部是纽约华人克里斯·周制作的《钉与轴》，这是一部反映华人工人阶级生活题材的作品。

“亚洲影视”是一个面向华人社区、致力于精湛的艺术创作的影视机构，总部设在纽约市唐人街。该机构曾经举办过各种电视训练班及每周一次用粤语与国语播放的节目，还主办过一年一度的亚裔人电影节，并建立起一个亚裔广播、影视档案室。一九八一年，“亚洲影视”又与“国家人文基金会”一起，联合发起召开了“亚裔广播影视与人文学科捐赠会议”，目的在于促进电影制作人员、剧本创作人员以及社区资金捐赠人士之间的联系。

旧金山还通过地方电视台播放各种电视教育节目，如《一、二、三，亚洲节目开始！》、《金山客》以及《实用英语》等，后者曾获“爱美奖”⁽¹⁾。电影制片人丁罗内(音译)制作的电视节目《萌芽》、反映的是唐人街儿童的生活。波士顿的儿童电视节目《雷博普》，还播放反映美国华人历史的片断。此外，由弗吉尼亚州教育影片中心摄制的两部反映亚裔人生活的电影系列片《太平洋上的桥梁》和《珍珠》，也通过美国公共广播电视台向广大观众播放。

(1) 爱美奖(E Emmy)是美国电视金像奖。——译者

《都板街》是由旧金山亚裔广播影视工作者制作的第一套广播系列节目。它通过“历史的窗口”这一形式，简要而生动地回顾了美国华人的历史，并且探讨了华人社会的种种问题。在东海岸也有一套与它相应的节目《金山》，是由华盛顿特区的一个亚裔人团体为太平洋广播公司制作的一套节目。它每月举办一次有关社区新闻评述的专题讲座，同时还播放亚裔音乐家、诗人和其他创作艺术家的作品。

总之，七十年代里，不仅电影、电视和广播等宣传舆论工具大大丰富了人们对华人和其他亚裔人的感性认识，而且华人艺术家们还进一步在更多的领域内探索着新的途径，努力塑造崭新的华人形象。华人作家、美术家、演员及电影制作人员等都纷纷发挥各自的专长，通过个人和集体的努力，在这方面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事实证明，一旦摆脱了社会偏见所造成的重重障碍与束缚，华人蕴蓄在心底的呼声便会如泉喷涌，以其特有的崭新语汇响彻美国各华人区。下一个目标便是让这一声浪冲出自己的社区，飞向全美国，让美国所有的人都倾听到他们的心声。

第十一章 当代华人社会概貌

自一九五〇年以来，美国华人人口以每十年翻一番的速度增长着。一九五〇年人口为十一万七千六百二十九人；一九六〇年为二十三万七千二百九十二人；一九七〇年则为四十三万五千零六十二人。到一九八〇年，美国人口调查统计数字表明，华人人口已增至八十万六千零二十七人。七十年来，华人第一次取代日本人，成了亚裔美国人中人数最多的一个民族。

华人人口增加的主要原因是一九六五年美国撤销了歧视性的移民政策，并于一九七五年以后又接受了许多来自东南亚各国的华裔难民。随着人口的急剧增加，在人口统计方面出现了许多新变化；在社会经济方面也产生了大量新问题。于是各种新的华人组织和其他亚裔人组织纷纷应运而生，这些组织专为华人和亚裔人关心的问题进行呼吁，并为维护他们的权益在国会山上进行游说，要求联邦政府提供应有的拨款并将亚裔人事务纳入少数民族规划之内。

华人的处境之所以难以得到改善，主要原因之一是美国政府一直坚持散布所谓华人是模范少数民族的论调。一九七九年，美国总统吉米·卡特在宣布第一届“亚太裔历史周”开幕时，赞扬了亚裔美国人过去在反对种族歧视斗争中所取得的胜利，并进而得

出结论说：“我们已经排除了阻碍亚裔人全面参加美国社会生活的种种障碍。……他们在社会上已享有平等待遇，并且已积极主动地参与了我们的国家生活。这一事实表明，美国政府对来自亚太地区各族人民所采取的持续开放政策是完全正确的。”

在庆祝一九八一年“亚太裔历史周”的大会上，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也超越党派界线，重复了卡特的话：“他们克服了无数艰难困苦，实现了美国之梦。他们的成功，不仅为美国同胞，也为至今仍在不断加入美国民族大家庭的亚太裔诸民族带来了希望和鼓舞，他们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关于美国华人获得了成功的说法，不仅为白宫椭圆形办公室⁽¹⁾所承认，而且在政府机构、教育部门 and 报纸、电台等舆论界也广为流传。这种说法很令人恼火，因为它完全否认了美国华人实际上存在的许多问题，而且这样一来，华人社区所需要的各种资金和规划也都得不到政府有关部门应有的支持。

就 业 状 况

华人在美国的就业范围目前正在不断扩大，但就其职业性质来看，有两极分化的趋向。虽然许多男性华人已在从事专业性和技术性的工作，可是更多的人则是在餐馆和洗衣店里从事低报酬的服务性劳动。在就业的华人妇女中，有四分之一是做专业性工作或经营管理工作的。这个数字与美国其他就业妇女情况相仿，但是这部分华人妇女绝大多数是地位较低的职员，如打字员、秘书或者售货员等。此外，华人就业妇女中还有四分之一是在服装厂或

(1) “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即美国总统办公室。这里用来象征美国总统。——译者

其他工厂从事半技术性的体力劳动。

目前，美国华人仍然被排斥在若干就业领域之外。譬如，各种贸易和工艺行业就根本不接受华人当学徒；而不当学徒就没有资格加入工会。在美国历史上，华工一向受歧视，至今他们多半还是只能在廉价的计时工种里就业。即使在专业性行业里，也存在着类似的不平等现象。

虽然从统计数字来看，有相当数量的华人从事经营管理工作，但是仔细分析一下就不难发现，这一部分人中的大多数都是自己开业的，如经营餐馆或小公司之类。能在美国大公司里当经理的华人为数极少。

华人并没有实现“美国之梦”。最有力的证据恐怕莫过于华人的贫困程度了，尤其是旧金山和纽约唐人街的华人。一九七〇年，美国有百分之十三的华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华人男劳力中，年收入不到四千美元的，约占百分之四十一，而全国平均数字是百分之三十一。出现这一差别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华人男劳力中有很多是老年人和新移民，这些人都是从事低收入劳动的。

夏威夷的情况略为不同。那里的华人有更多的机会从事专业性或者是管理性工作。一个中等水平之家每年收入为一万四千九百三十六美元，这在全美国华人中算是较高的收入了。而在纽约市，中等华人家庭平均年收入为七千八百零九美元，仅为夏威夷中等华人家庭年收入的一半。据一九七四年美国卫生教育福利部统计，纽约有百分之八十六的华人家庭年收入低于六千美元。纽约唐人街的人均年收入只有二千二百六十四美元，而整个纽约市的人均年收入是三千七百二十美元。

不管华人生活多么贫困，他们从联邦政府那里得到的救济却一向低于其他任何民族。这当中原因是多方面的。如有的人由于

语言障碍缺乏有关社会福利方面的知识，因而失去了领取救济金的机会；有的人怕领取政府救济金会丢面子；还有的人希望保持从不申请救济的好名声，以便有资格在必要时为亲属向美国移居提供经济担保。

精神卫生问题

美国华人不仅要承受一般美国人所经受的精神压力，而且作为美国的一个少数民族，他们还要承受来自社会、政治和经济诸方面的不平等待遇。华人比美国其他少数民族蒙受的不平等待遇更甚，原因是他们总是被看作是一个能管理好自己事务的民族。也正因为这个原因，他们在精神卫生方面存在的许多急需解决的问题，大多得不到社会和政府机构的关心和资助。

对待华人的精神卫生问题，社会上存在着两种对立的观点。一部分人把华人很少到精神病院就诊、离婚率低、教育和事业上的成就显著等方面的统计数字，看作是华人情绪稳定的表现，从而得出结论说华人是精神卫生方面的楷模。但也有一部分社会工作者和卫生专家却持异议。他们认为不能只凭经验出发想当然地看问题；认为这些数字本身并不能完全反映事实真相，因为这种统计数字往往挂一漏万。就以去医院就诊而言，来就诊的人是统计进去了，但是还有许许多多由于各种原因而没有前来就诊的人，这些人就不可能统计进官方数字。比如有的人不肯就诊是怕精神病症会使自己丢面子；有的人是由于语言和文化上的障碍；还有的人对专为他们提供的精神医疗规划不甚感兴趣，等等。

纽约的学校教育心理学家陈利民曾谈到，华人一般不愿在家庭范围之外谈及有关自己精神疾病方面的问题；

“有关华人精神卫生方面的统计数字总是表明华人很少患有精神方面的疾病，事实上这是一种假象。造成这种假象的原因有多种。患有精神疾病的华人，除非病情已十分严重，再也无法在家里养好，或者再也无法对邻居隐瞒，否则是不肯承认自己患有精神疾病的。还有一种情况是，在遇到人与人之间的冲突或者相互协调方面的问题时（诸如婚姻问题等），中产阶级美国人往往求助于外界帮助解决，而华人则往往不愿声张出去，总设法在家庭内部解决。有些事情干脆不去挑开，或者设法包起来。个人也好，家庭也好，都学会尽量将就，不让家丑外扬，以免损害一家人的名声。因为每个家庭成员都代表全家，一个人出了事会使全家人都不光彩。许多华人家庭还是照老式的传统家规行事。只要家庭成员言行不越轨，一般不会发生磨擦。他们每个人都知道自己在家里所处的地位和自己的责任。华人家庭似乎也不鼓励进行反省和发展个性，因为这样做将意味着接受或者至少是承认外界的影响和精神疗法的重要。”

华盛顿大学的心理学教授司徒永振认为有必要采取新的办法来研究美国华人的精神卫生问题：

“我建议从分析精神压力和应付精神压力的能力这两个方面着手，来研究华人精神卫生问题。……对于许多华人来说，社会偏见与种族歧视影响着他们的自尊心和健康；贫穷和有限的社会经济活动能力又使他们感到灰心、愤懑和无能为力；还有许多华人至今不能解决如

何做一个双重文化公民的问题。

“这种分析与精神卫生的关系是：如果一个人所受的精神压力较小，而应付精神压力的能力又较强，他的心理健康状况就好。反之，如果一个人所受的精神压力很大，而应付精神压力的能力又低，那他必然会产生严重的情绪波动。因此，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是，首先了解华人的精神压力之所在，以及他们应付精神压力的能力如何，然后再设法帮助他们减轻精神压力，增强应付精神压力的能力。”

一九八〇年，旧金山的“华埠住房和卫生研究计划”工作人员查尔萨·卢与康尼·杨·余，曾经对一百零八名有代表性的旧金山唐人街居民作过一次全面调查。他们在调查报告中说，就全国范围来讲，有二分之一的人对生活充满热忱，但在唐人街范围内，怀有同样感情的人却不到十分之一。华人对未来也不抱多大希望，不象一般美国人那样对未来满怀憧憬。被调查的人当中，大约有二分之一的人对自己的学历感到不满足；约三分之一的人对目前的生活境遇感到沮丧。调查结果还进一步表明，唐人街居民感到人口过密和噪音污染是危害他们健康的两大公害。跟其他美国人一样，他们也渴望有个静谧、清洁和安宁的生活环境。

对新移民和老年人来说，住在唐人街上也自有一定的好处，如离朋友近，购买物品方便，有一种生活在自己人当中的感觉，而且不会讲英语的人在这儿可以用汉语。但是住在唐人街也有不利的地方：这种少数民族聚居区的恶劣生活环境常会使人感到压搾和灰心，甚至会产生自杀的念头。目前美国各大唐人街的物质条件都在日益恶化，这不仅严重地影响着居民的生活水准，而且也

给他们精神上带来极大的压力。因此，与若干人的说法恰恰相反，华人的精神卫生问题，不仅过去是，而且今后将继续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老年人问题

一九七五年，“费城社会服务部成人服务处”主任维多利亚·佩拉达为筹办亚裔老年人服务项目，曾向该市老年人问题研究机构申请资助。可是他们却反问她：“这些亚裔老年人在哪儿？我们怎么没见过？我们根本不知道周围有这样一些人。”后来虽然佩拉达对费城亚裔老年人问题专门进行了调查研究，可是当一九七八年她调查完毕时，这个老年人问题研究机构又托词说，他们没有资金筹办新的亚裔人服务项目。

根据一九七〇年的人口调查，美国有二万六千八百五十六名华人年龄在六十五岁以上，占美国华人总人数的百分之六点二。而实际人数可能比这个统计数字还要高，原因是这些老年人对政府的调查询问往往怀有种种疑虑，不都肯讲实情。这些疑虑是由许多历史原因造成的，如早年天使岛拘留营的盘问、害怕被驱逐出境的恐惧心理、饱受种族歧视的身世，以及语言障碍造成的信息不灵等等。这些老年人直到风烛残年也没有享受到他们一生辛勤劳动的果实。据一九七〇年统计，男性老年华人的平均收入仅一千九百四十三美元；老年妇女收入更低，平均只有一千一百八十八美元。

亚裔民族觉醒运动的明显成果之一，是建立了各种为老年人服务的社区组织。旧金山的“华埠安老自助处”就是为老年人提供医疗及其他社会服务的一个范例。在这以前，老年人问题从未得到过政府部门和唐人街当局的重视。七十年代里，各大城市有不

少新的研究项目和社会服务机构都争取到了公益基金。这些项目包括洛杉矶的“亚太耆英研究计划”、旧金山的“安乐居”和“华埠改进协会”，以及西雅图的“华人信息服务中心”等。

这些社区组织虽然也定期安排一些文娱活动，但主要工作是提供日常性的服务，诸如传递信息、安排病人就医、帮助翻译、为申请救济金的人提供咨询和指导等等。洛杉矶的“华埠老年人服务中心”主任弗朗西斯·洪谈到，华人的老年人服务项目与其他的老年人服务项目有所不同：

“美国其它城市或其它地方搞的一些老年人服务项目，我认为属于‘享乐性的’，而我们的却不是。我们要解决的是老年人的孤苦无告问题、死亡威胁问题和陪伴慰藉等问题。我们全部时间都花在帮助老年人度日活命的救助性工作上，要保证他们吃得饱，要保证有人陪他们去医院看病，要保证有人照料他们生活起居上的各种困难。在这种情况下，根本不可能侈谈什么享乐性的服务。这就是我所说的不同。”

按照中国人的传统观念，老年人不论在家里还是在社会上，都应该受到敬重。虽然这一观念在美国这样一个社会里已经有所淡化，可是不少年纪大的人仍然坚持这种观念。“纽约华埠策划委员会”下属的开放计划主任伍宝玲认为，这种传统观念束缚了许多老年华人的思想，不少人明明迫切需要救济，却不肯开口申请：

“他们有顾虑，怕给自己的孩子丢脸。因为别人会

问你‘谁养活你呀？’如果你能说‘孩子们养活我’，你会感到很体面，这表明儿女们都孝敬你。可是当你回答说从政府那儿领救济金时，那人们就会说‘唉，你家的孩子们真不像话，不知道孝敬父母，不懂得体贴老人。’这么一来就给家里人丢了脸。”

不过伍宝玲说，随着社会上对老年人问题日益关心，又针对他们的需要办起了一些服务项目，他们的看法也有了改变：

“七年以前，一九七二年八月十四日，我们这个服务中心刚开办的时候，没有人对学英语或上别的课感兴趣。

“现在我们有很多学生了。当然英语是很不容易学的。一开始时，连最简单的英语他们也不敢讲。老师只好一再提醒他们‘请讲得响一点’。可是他们总是不好意思。说他们的声音不好听，发音一塌糊涂。我就对他们说：‘你要是不开口讲，谁知道怎么来帮你纠正呢？没人能帮你。’他们说‘嗯，倒是这么回事。’到后来哪，每逢放假或过节，他们都会说，‘宝玲，我们不想过节放假。最好这个班一年到头都上课。而且最好星期天也上课。’这说明我们的工作是有成绩的，他们都愿意天天来上课了。他们的想法变了。”

印度支那难民问题

美国华人中另一个迫在眉睫的重大问题，是那些刚从东南亚来的华裔难民的救济问题。一九七五年四月，南越政权的垮台，

结束了美国出兵印度支那的历史。同时也造成大批华人离境。这些人多是被剥夺了公民权的商人或是与美国有牵连的人，都纷纷被迫逃离印度支那。当时越南政府与巴特寮看来也是鼓励他们这样做的。

第一批难民共有二十二万人，是一九七五年逃离越南的，大部分被直接空运到了美国和法国。不过这种大规模的逃难很快就停止了。但是这些地方的政治动乱、种族迫害和饥饿却一直持续不断。所以自一九七八年十月以后，每个月都有成千上万的人继续设法从越南、柬埔寨和老挝逃出。他们挤在超载的小艇或破旧不堪的货船里，被运往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和香港等地的临时难民营。这些海上逃生者，能活着到达难民营的只有半数。到了难民营，还得等待数月甚至数年，直到在其它国家找到了担保人才能离开那儿。

到一九八〇年八月为止，美国已经接受了三十九万五千名印度支那难民。开始时，由美国国务院负责将难民接纳入境，尔后的安置工作便由三个主要联邦机构及无数的独立机构一起插手做。结果常常出现重复工作和官僚主义造成的种种混乱局面。

由于全国的安置工作不能很好地协调，加剧了难民到达之后遇到的各种困难。当时那批一九七五年逃离越南的难民，离境前大多数只有两天甚至两个小时的准备时间。生活环境的急剧变化，以及离开家园时的仓促慌乱，使他们精神极度困惑不安、高度紧张，同时也给他们带来了其他各种精神疾病。

此外，难民就业也是一个普遍令人担忧的问题。由于就业许可方面的种种限制性规定，加上他们的难民身份，使这批人中的专业人员都无法在自己的专业领域里找到工作，因此不得不靠干体力活养家糊口。至于那些没有文化的难民(多半是文盲)，处境

就更难了。得克萨斯州一个沿海城市的越南难民，就曾因语言不通而跟当地渔民发生过暴力冲突，造成了一百五十名越南捕虾渔民被驱逐出城的事件。

美国政府对印度支那难民的安置工作期限只有两年，对这项工作的拨款也是低到不能再低，并且工作中又缺少懂两种语言的工作人员。这些都表明，美国政府在帮助印度支那难民适应美国社会环境过程中所采取的措施并不能解决多少实际问题。这些难民初到美国时，多半先在担保人居住的地方安下身来，随后逐渐迁往气候温暖的地带或者到已经有亚太裔社区的各州去定居，如加利福尼亚、华盛顿、佛罗里达、纽约和得克萨斯等州。

在唐人街上安顿下来的难民往往能较快地加入华人社会并且消除自己的孤独感。他们在这儿也能了解到其他印度支那难民的生活状况，从而看到在这个陌生的世界里挣扎的并不单单是他们自己。由于这些新移民纷纷向唐人街各种机构申请补助和救济，使这些本来工作负担就已经够繁重的机构现在感到简直难以招架了。这些机构包括西雅图的“华人信息服务中心”、纽约的“移民社会服务处”和旧金山的“新侨服务中心”。

教育问题

随着亚洲各国许多家庭移民到美国，对于双语教育和双重文化教育⁽¹⁾的需要也日益迫切。一九七四年，刘对尼科尔斯的诉讼

(1) 双语教育指用英语和学生(少数民族儿童或移民儿童)的本族语，同时进行教学活动的学校教育。双重文化教育指对少数民族儿童或移民儿童既进行美国文化的教育又进行其本民族文化的教育。使儿童既能了解和适应美国的主流文化，又能尊重和继承其本民族的文化传统。——译者

案⁽¹⁾促使联邦最高法院作出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裁决。旧金山一个班级十三名华人学生，于一九七〇年代表学区三千名讲华语的学生向法院提出起诉，要求对他们这些英语上有困难的移民儿童的教育作出特殊安排。二十年前，布朗对地方教育委员会的诉讼案，曾经迫使联邦最高法院判决学校中对黑人的种族隔离为非法；现在刘对尼科尔斯的诉讼案，又为其他有色种族的儿童(包括不懂英语的华人、朝鲜人、菲律宾人和墨西哥人的儿童)争得了享受同等教育的权利。

根据刘对尼科尔斯一案的裁决，美国国会于一九七四年通过了“双语教育法案”，并拨款七亿多美元作为五年内开展双语教育和双重文化教育的费用。这项新法案规定，双语和双重文化教育是为不懂或者很少懂英语的儿童提供同等教育机会的唯一有效途径。

遗憾的是，这项裁决的执行多年来一直遇到来自各个学区的阻力。加利福尼亚州甚至根据州立法第十三条削减了双语教育的经费。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上台后，在教育方面所作的第一项决定也是大幅度削减双语教育经费。但是，洛杉矶唐人街卡斯台拉小学的教学实践，证明了双语与双重文化教育对华人儿童学习的重要作用。这个学校在这方面获得了显著成效。一九七九年时，这所学校中有百分之七十五到百分之八十的学生都不会说英语，全校一千一百名学生中有三百名来自东南亚各国。在谈到双语教

(1) 一九七〇年三月二十五日，刘建民(音译)和十三名学龄儿童代表三千名在英语上有困难的华人学生，到法院控告旧金山教育局局长艾伦·尼科尔斯。指责教育局无视华人儿童的困难，致使这些学生享受不到平等的教育机会。该案一直上诉到最高法院。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一日，联邦最高法院判决旧金山教育局败诉，并做出为不懂英语的学生开设双语教育课程的决定。——译者

育的作用时。该校校长威廉·春·洪是这样说的：

“我校设有华语的双语教育课程和西班牙语的双语教育课程。我们鼓励孩子们和他们的父母说任何一种语言，只要他们感到能用它交流思想就行。我们还鼓励孩子们多开口说话，也允许他们在英语课上使用本族语。当然，我们要教英语，而且这是一所讲英语的学校。但是我们也利用他们的本族语作为过渡手段，来帮助他们掌握新的概念，弄懂各种教学要求以及同他们的父母交谈。

“此外，我们还另外聘请了把英语作为第二语言进行教学的教师，帮助孩子们巩固他们课内所学的内容。我们这样做是出自这样的考虑：孩子们刚到一个新的国家，这已经是一个突变了；接着走进教室，假若又是什么也听不懂，对孩子们肯定又是一个打击。我认为双语教学的好处就在于教师与孩子们一见面就立即可以交谈。从第一天起就可以开始讲课。”

六十年代末以来亚裔学生激进分子所提出的有关教育方面的问题，到七十年代后期仍然为人们所关注。因为在七十年代中期，美国各院校已开设起来的亚裔美国人问题研究课程都面临着缩减预算和减少课程的问题。不过学生运动并没有因此而沉寂下去。西海岸一个代表四十五个学生组织的团体“亚太裔学生联合会”，于一九八〇年召开了第三次年会。会上讨论了教育经费削减、亚裔妇女的苦闷以及征兵对亚太裔美国青年的影响等问题。各种社区研究计划还为学生们提供了多种既能发挥其专业特长、又能为社区人民尽义务的机会。例如，参加纽约社区的“前程”规划的医

学专业学生们，就有机会搜集到各种数据，还记录了社区医疗卫生方面的许多问题。与此同时，学生们对整个社区情况也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并且这很可能对他们未来的职业选择会产生影响。

为保留唐人街而斗争

美国华人也像一般美国人一样，是一个喜欢流动的民族。凡是华人集中的地区，一般说来都是经济发展机会较多的地方，或是有必要建立起社区的地方。也有些华人区是在他们寻求更好的生活条件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五十年代时，华人纷纷离开唐人街向市郊迁移。六十年代里，一部分城市的唐人街人口又突然猛增起来。到了七十年代，华人区又面临着另一个新问题——城市的重新规划又迫使许多华人离开了唐人街。

由于华人是美国许多主要城市里的第一批居民，因此他们当时多半都住在靠近城镇中心地区。后来城镇不断向外扩展，华人居住区也随着成了许多城市的上等房地产地段。但是多年来由于这些华人区缺少资金，建筑物又年久失修，结果使唐人街的房屋都已不符合居住标准，情况与附近一些罪恶活动猖獗地段相差无几。

这时候，全国的各城市规划部门与实业界人士正在着手对各大城市的许多地段进行改建和整修。鉴于市中心地段的房地产价格不断上涨，他们意识到如果在这些地段重新造房，其房价必然相应抬高，而这里的高价房屋是不愁没有买主的。于是他们便决定把唐人街的老建筑全部拆除重建。这就意味着，这里的居民将被另一个新的经济阶层的居民所取代。

对唐人街居民的利益全然不顾的情况在美国不少城市都有所发生。六十年代里，底特律的唐人街为了给高速干道让路而被拆毁。匹兹堡的唐人街也由于同样的原因被推土机夷为平地。波士

顿的一条高速公路横穿唐人街，挤走了唐人街的半数人口。一九六〇年，费城也在规划建设一条横穿费城唐人街的高速公路以繁荣市区经济。当居民们听说他们可能也将遭到同样厄运时，华人界便发起了一场“拯救唐人街”的运动。这场斗争最先由“中华总会馆”发起，该组织自身的办公大楼就面临着被拆除的威胁。后来由一个称作“黄仔”的学生组织继续进行下去。华人界组织了示威游行，并且与政府官员进行交涉。结果，大规模的拆除计划虽然推迟了，但是仍有部分房屋被毁。这预示着日后还会有更多的麻烦。

目前洛杉矶、萨克拉门托和檀香山的唐人街可以说是属于过渡型的。部分还保持着老式的唐人街风貌，部分已发展成增加收益的旅游点。因此，那里的居民，包括单身老人和新移民家庭，深有朝不保夕之虞。不过，由于他们已从全国其他各地唐人街迫迁事件中得出了教训，因而已纷纷要求在今后的城市发展规划中一定要为华人提供廉价住房。

美国有几个亚裔社区，工作开展得非常出色。其中之一是西雅图国际区。在英特·依姆等组织的领导下，这个社区挫败了打算在附近建造大型交通转运站的规划。因为这个转运站一旦建造起来，加上已经建起的圆顶体育馆和高速公路，必将给社区带来环境污染、交通阻塞等问题，甚至对国际区的存在都将是一个威胁。此外，国际区还制定了一项长期造房规划，打算为居民建造一千套物美价廉的单元住房。目前这一规划正在不断取得进展。

如果提出把唐人街上破旧和危险住房统统推倒重建，肯定全国大多数华人都会首先举手表示赞同。但是对于应该再造什么式样和风格的房子，以及由谁作出决定等问题，却在各有关方面引起了激烈的争论。看来在美国一些较大的城市保留唐人街，还是十分重要的。这里有多方面的原因。目前唐人街的居民多半是老

年人或者是一九六五年以后来美国的新移民，也有来自东南亚的难民。有些人，比如单身老年人，已经在这里住了大半辈子，唐人街已经成了他们的家。而对于新移民和难民来说，唐人街又是他们来到美国的第一个落脚点，他们可以在这里逐渐适应美国的生活环境。这儿甚至可能是他们唯一能够边学英语边找到工作的地方。在他们熟练地掌握英语之前，要想生存下去，非住在唐人街或唐人街附近不可，否则他们将寸步难行。

维护亚太裔美国人的权利

七十年代，越来越多具有自由和进步思想的华人，开始为促成华人参加选举和参与政府工作而进行奔走。他们把这一项工作看成是为在现存的政府机构中获得政治权利而进行的选民组织动员工作。旧金山的“华裔民主党协进会”、“华人权益促进会”和“亚裔辅邻会”三个组织，已经从选举策略、公民权利和小型企业权益这三个方面发动了攻势。一九七七年，“华人权益促进会”成功地支持其成员刘贵明⁽¹⁾律师当选为旧金山市参议会第一位华裔参议员。但当他任期届满，在争取连任的选举中却失败了。这不禁使人们对华人在政界地位的稳固性产生了怀疑。

一九七七年在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内成立了亚太裔美国人事务处。由于该组织支持卡特的竞选活动，使少数华人在政府部门获得了任职，尽管这些职务都不属于决策性一级的。

在首都华盛顿，少数联邦机构也开始考虑华人和其他亚太裔美国人的问题了。第一个这样做的机构是“卫生教育福利部”。该部在一九七三年成立了一个咨询办公室，现称“亚裔美国人事务

(1) 刘贵明的英文名字为Gordon Lau。——译者

处”。目前，“教育局亚太裔事务处”正在着手调查亚太裔教育方面存在的问题，并着手制定有关政策和措施。另外两个机构——“民权事务局”和“平等就业委员会”——也已经初步完成了对亚裔人受歧视问题所做的调查和听证工作。

一九七三年成立的“美华协会”是一个维护华裔美国公民和华人永久居民权益的组织。作为一个全国性维护华人权益的机构，它在首都华盛顿设有联络处，并负责与“日裔公民联盟”一起在国会山就亚裔美国人的教育问题进行游说。该组织还与其它亚太裔组织共同努力，促使国会通过了一九七五年的“产稻法案”，从而降低了米价；宣布举行“亚太裔历史周”纪念活动，并促成亚裔美国人加入美国少数民族小型企业管理发展计划。“美华协会”目前在全国有二十多个分会。它在八十年代所致力解决的问题包括：亚洲难民安置问题、放宽移民法问题、双语和双重文化教育问题、职业培训问题及平等就业机会问题等。

“亚太裔联邦职工理事会”和政府机构的各亚太裔问题小组，一致要求对涉及亚裔美国人各方面利益的全国性政策问题给予特别关注。目前有些专业性组织，如“美国公共卫生协会”、“美国精神病学协会”、“美国心理学协会”和“美国图书馆馆员协会”等，也都在全国性机构中设有亚裔人问题小组。

美国唯一的一个“州立亚裔人事务委员会”总部设在华盛顿州奥林匹亚市。该委员会由二十四名成员组成，负责为州长提供咨询和提出立法议案等，工作范围广泛。人们普遍反映，有必要在其它各州也成立类似的机构，该委员会前执行主任黄燕薇谈到他们的委员会在华盛顿州的工作时这样说：

“这个委员会的主要职能是负责提高亚裔人的生活

水准。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的任务是做好调查研究工作，向州长、州立机关、各部门领导及其他官员介绍有关情况，提出建议。我们也有责任让亚裔人有更多的机会参与政府工作和经济活动。

“我们还参与联邦立法、汽车接送学生、救济印度支那难民和为移民提供帮助等工作。此外，我们也组织社区教育，还答复各方面的问询。两个半月里，我们就对四十五封问询信作了答复，而且这还不算我们本职工作之内的事。”

关心政治的亚裔妇女也不断向有关方面就社会上对妇女的成见问题和妇女在受教育和就业方面的不平等现象进行呼吁。首都华盛顿的“泛亚妇女组织”、“华人妇女组织”和纽约的“亚洲妇女联合会”等组织，为相互交流妇女工作经验及组织妇女进行社会变革树立了榜样。一九八〇年八月，又在首都华盛顿召开了一次全国性妇女工作会议，专门就亚太裔妇女平等教育权利问题进行了讨论。会议特别强调了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妇女工作联络网和各种妇女组织的重要性。

美中关系正常化与美国华人

一九七九年一月一日，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外交关系。作为建交的一个重要条件，美国同意在一九七九年年年底以前废除美台共同防御条约，并断绝同国民党政府的关系。在此以前，美国政府一直把国民党政府视为中国的官方政府。在美国一些主要城市的唐人街上，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支持台湾的人都纷纷上街游行，前者庆祝，后者抗议。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华人兴高采烈地谈论着他们终于可以回国探亲了，并且再次体验到了作为一个中国人的自豪感。而支持台湾的华人则谴责美国出卖了“国民党中国”和“自由世界”。过去有这样一种观念，即忠实的美国人都是支持国民党的，而且美国国旗要和国民党的“国旗”并排悬挂在唐人街上。现在这种观念已经不完全行得通了。从这个意义上讲，美中关系正常化具有解放思想的性质。它为美国华人在旅游、自我观感和政治信仰方面提供了自由选择的余地。

黄运基先生特别提到了唐人街上人们的态度变化：

“我并不是说百分之百的人都是支持新中国的。但是情况确实是在起变化。人们不再感到害怕了，这就是一个很大的变化。你翻开《中国时报》或者《旧金山时代报》就会发现，哪一家旅行社不在跟中国建立业务关系？他们都在从中赚钱，而且赚大钱。对吧？所以说这是一种趋势。他们不能不正视这一事实。他们想跟国民党做生意，可以。但是他们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他们也得跟中国做生意，而且这是一个潜力巨大的市场。还有许多礼品商店——大多数礼品商店和杂货店里都在大量出售各种来自中国的纪念品。不信你数数看，今天几乎所有的行业都在同中国做生意。”

开创未来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华人已克服了在工业、商业、政府部门、专业部门和社会生活其它许多领域里的各种法律及社会障碍，逐步跻身于这些领域之中。虽然对华人的歧视在相当程度上仍有存在，但是每前进一步都是对下一步的推动力，都为华人

充分进入美国社会进一步创造了条件。

一些最杰出的美国华人所取得的成就，已经普遍为美国主流社会所公认。杨振宁和李政道一九五七年荣获诺贝尔物理奖。丁肇中是这项令人向往的诺贝尔奖一九七六年的获奖人。实验物理学家吴健雄验证了杨振宁—李政道的理论，为他们获得诺贝尔奖铺平了道路。而吴健雄本人又是获美国科学院赛勒斯·康斯托克奖的第一位女科学家。该奖每五年一次颁赠给在电学、磁学或放射学方面有重大发现的人。世界脑垂体最高权威李卓皓于一九六二年获艾伯特·拉斯克医学研究奖。药物研究员张明觉与他人合作研制成功了避孕药片。丘成桐由于证明了卡拉比猜想而被“加利福尼亚科学与工业博物馆”授予一九七九年“加利福尼亚州科学家”的荣誉称号。这一几何命题自五十年代以来一直使世界一流数学家们百思不得其解。丘成桐目前已转向对宇宙空间“黑洞”的研究。

贝聿铭是当代美国建筑界首屈一指的建筑师。一九七九年被授予美国建筑界的最高荣誉——美国建筑学会金质奖章。他设计的建筑包括美国国家美术馆东馆、纽约市会议中心和北京的香山饭店等。在私人企业方面，王安博士是一位经营个人电脑和文字处理机公司的华人。他的公司“王安实验所公司”现在已发展成一个享有国际盛名的国际性联合企业。

华人在电视新闻领域里过去虽然也取得过一定成就，但他们在新闻界崭露头角还是七十年代的事。比较出类拔萃的华人新闻工作者有周淑英、周坚强和宋毓华等人，后者是第一位负责安排地区新闻广播的华人播音员。旧金山的电视制作人刘泳常曾携带摄影机回中国拍摄了纪录片《中国啊，我的祖国》。另外还有在中美关系正常化后被选派为驻京记者的查尔斯·钟和梅林达·刘。

华人作曲家李泰康(音译)和周文忠(音译)对美国流行音乐和传统音乐都有独特的贡献。大提琴家马友友被艾萨克·斯特恩赞誉为“当代最伟大的演奏天才之一”，他曾经与美国和欧洲一些著名管弦乐队合作，赴世界各地巡回演出。富有想象力的舞台美术设计师李明宙(音译)在耶鲁大学戏剧学院任教，并且是纽约莎士比亚戏剧节和朱丽学院歌剧院的主要舞美设计师。新加坡出生的华人舞蹈设计家郭竹山(音译)是当代舞蹈界最负盛名的舞蹈设计家之一。他设计的舞蹈动作独具一格，既新颖别致又豪情奔放。他曾先后在休斯敦芭蕾舞团、宾夕法尼亚芭蕾舞团和乔夫里第二舞蹈团任舞蹈设计。目前他在华盛顿芭蕾舞团工作。

在司法部门，也有数名华人担任法官职务。他们当中包括：夏威夷州的威廉·理查森为州最高法院首席法官；亚利桑那州的邓心平为联邦上诉法院法官；西雅图的陈文华为州高级法院法官。此外，在美国最早当选为市长的华人有约翰·容和威廉·苏·胡。前者于一九六五年当选为密西西比州琼斯城的市长，后者于一九六六年任加利福尼亚州奥克斯纳德市市长。

艾尔·杨曾获一九七八年全美赛车协会汽车赛第六级冠军，次年又夺得第七级冠军。他曾驾驶一辆车名为“狮舞”的普利茅斯牌巴拉库达型赛车，在全国各地举行的一系列车赛中夺得桂冠。西雅图职业网球运动员艾米·余多次赢得冠军称号，包括一九五一和一九五四年举行的西北太平洋沿岸网球赛女子单打冠军、一九七三年美国草地网球协会举办的全国老年网球赛(五十岁以上组)女子单打冠军和一九七四年该协会举办的全国老年网球赛(五十岁以上组)女子双打冠军。在西雅图举办的一次夏季网球训练班期间，她曾帮助数百名少年学会了打网球。在过去三十年中，余和她的四个孩子前后共一千多次荣获各种桂冠。她最小的儿子

加里也是洛杉矶的职业网球运动员。甚至她的几位亲戚也是网球运动好手。她在旧金山的两个侄女玛西和皮纳特·露易也都是职业网球运动员。

美国华人的“群星谱”里光辉夺目的名字，可以一直不断地写下去，因为华人中确实不断涌现出众多杰出的人物，华人科学家、缝纫师、厨师、剧作家和医学研究人员……，真可谓代出英才，各领风骚。他们在各自的领域里，创造着令人称羨的业绩，为华人社会的发展与繁荣贡献着自己的力量。这也正是数代华人一直为之奋斗的事业。早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当华工们还在栉风沐雨修建大铁路的时候，他们就不仅在开创着自己的未来，也在开创着美国的未来。

第十二章 后 记

美国华人的历史是一部真实的历史，一部求生存的奋斗史。这部历史的许多新的篇章，尚有待于世世代代的人们继续谱写下去。早在一八五〇年，华人的先辈们就把美国这块土地奉为“金山”，然而来到“金山”后，真正实现了迅速致富梦想的人，却是寥寥无几。对大多数华人移民来说，“金山”路意味着茹苦含辛的一生和久别亲人的离愁；意味着寄人篱下的戚苦和种族歧视的煎熬。事实上，还在他们踏上美国这块土地之前，这儿就早已滋长了厌恶华人的情绪。在旅美华人中，固然有些人是怀着在美国安家立业、长住久留的打算而来的，但是更多的人始终把对祖国的思念珍藏心底，指望着将来有一天能告老还乡、叶落归根。然而多年来，由于家乡持续不断的贫困，社会的动荡不安，加上外国的侵扰和国内的战乱，使他们终于在本世纪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时，开始把美国当成了自己的家。

美国华人的政治生活、文化生活和华人社区本身，多年来一直在各种辩论和变革中，不断地被注入新的活力，充满着新的生机。长期以来，华人社会的领导权始终掌握在诸如“中华会馆”和“中华商会”等传统的唐人街组织手里。可是到了六十年代，这些组织开始受到新的利益集团的挑战。当然，目前这些传统组织仍

然在华人社会中保持着一定的作用。它们代表着华人社会中较保守的一部分势力，通过资助唐人街春节喜庆活动、社团俱乐部活动、各种祭奠活动以及开办华语学校等形式，来保持和维护华人的民族传统文化。一些有声望的华人领袖，甚至还为建造纽约的华人居住点“孔子大厦”提供资助。他们对解决唐人街存在的其他各种问题也表示极大的关注。但是最近几十年来，由于种种原因，使这些传统组织的影响正在不断缩小。首先一个原因，是这些组织的宗旨问题。一九一一年后，随着“中华民国”的建立，美国华人的命运与祖国的命运更紧紧联系在一起。这种对祖国的强烈感情，压倒了他们以往对一乡一地的乡间观念。而唐人街的各个传统组织当初正是植根于这种乡间观念，正是为加强来自各地域的移民之间的联系而建立起来的。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这些组织很难赢得美国出生的大批华裔的青睐，因为这些华裔所最关心的，是如何更好地适应美国文化，更好地适应美国社会这样一些问题。其次，传统组织的资产也在减少，而且已经失去了它们以往对新移民的影响和控制作用。这使唐人街传统体制的经济基础也受到削弱。但是最重要的原因还在于，这种传统的权力机构自身完全没有力量应付急剧的社会变化给唐人街所带来的种种难题。

六十年代中期，美国华人激进分子受美国社会变革潮流的影响和鼓舞，开始以前所未有的狂热向唐人街的传统体制提出了挑战。主要的矛盾冲突有两个：一个是唐人街在社会福利方面存在的种种问题；一个是台湾的支持者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支持者之间的政治冲突问题。在这个时期内，唐人街采取了许多社区改革方案，建立起许多方便群众的医疗保健中心、托儿所、补助食品分发处、法律咨询服务处以及青、老年活动中心。也正是在这个时期，年轻一代华人开始意识到，美国华人有着自己灿烂夺目的

民族文化，并决心努力探索各种途径，使它在美国这块土地上不断发扬光大。

自从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第一次华人移美浪潮以来，华人的分布状况经历了数次重大的变化。直到一八八〇年以前，大部分华人都集中在美国西海岸和落基山脉一带。他们当时多半是矿工、铁路工人、农场工人或工厂工人。自一八八〇年至一九〇〇年间，由于大规模的排华暴乱、铁路竣工和矿业衰落等原因，一部分华人开始向东移居到了美国的中西部和大西洋沿岸一带。还有些华工在美国南方和西南部铺完铁路之后，便就地定居了下来，成了捕虾的渔民、种植园的工人或者小商业主。

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不少小型的华人聚居区（如当时随着新兴城镇的建立而出现的类似内华达的“草谷”那样的小型聚居区），因失去了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而相继衰落。在二十世纪前四十年内，华人陆续移居到了旧金山、芝加哥和纽约等大城市的市中心区，因为这些地方有较多的就业机会。后来，随着移民中妇女人数的增多，家庭也逐渐建立了起来，这使昔日只有单身汉居住的唐人街，生活状况略有改善。

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时，华人移民中已经出现了在美国出生并且在美国接受大学教育的一代人。这一代华人中的相当一部分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或奔赴前线作战，或参加后方战时服务。他们的这些努力，促使美国在战后修订了若干立法条例，作出了一些对华人有利的规定。这一切都为华人在五十年代向南郊白人区迁移，创造了有利条件。

进入六十年代，成千上万的新移民和难民从香港、台湾和东南亚各国涌入美国，在各大城市唐人街或者华人密集的其他地区定居下来。到了七十年代，各种名目繁多的城市改建规划（有些

是亚洲出资的),使唐人街一向无法解决的住房面积紧缺等问题进一步加剧。结果,若干改建规划,诸如拆除供低收入居民居住的“国际旅馆”,把“乐客”唐人街改建成旅游点,在奥克兰建造香港兼美国式的商业中心等等,都遭到了来自各阶层华人的坚决抵制和反对。

自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以来,美国许多标志着华人历史的人工建筑,都因年深岁久而不复存在。然而,那些自然界中象征着华人创业艰辛的大树,如今却依然根深叶茂,挺拔苍翠。你看,夏威夷群岛上那片桃树、梨树和柚树,它们的种子是当年华人从中国带去的,经他们年复一年的悉心培育,如今已硕果累累。你看,美洲大陆上当年华人在加利福尼亚所种下的天树(又名榕树),如今也已根深冠硕,花团锦簇,开遍了华人先辈用汗水浇灌的大地。而与之同生俱长并世代相传的,是中华民族炎黄子孙那坚韧不拔、自强不息的创业精神。这一精神正在激励着新一代华人,为创建今天更美好的家园,而开拓奋进。

附 录

美国主要各州华人人口分布情况表

排列 顺序	1980		1970		1960	
	州 名	占全美 华人总 数之百 分 比	州 名	占全美 华人总 数之百 分 比	州 名	占全美 华人总 数之百 分 比
1	加利福尼亚	40.0	加利福尼亚	39.1	加利福尼亚	40.3
2	纽 约	18.4	纽 约	18.8	夏 威 夷	16.1
3	夏 威 夷	7.0	夏 威 夷	12.0	纽 约	15.8
4	伊 利 诺 斯	3.5	伊 利 诺 斯	3.2	伊 利 诺 斯	3.0
5	得 克 萨 斯	3.2	马 萨 诸 塞	3.2	马 萨 诸 塞	2.8
6	马 萨 诸 塞	3.1	新 泽 西	2.1	华 盛 顿	2.3
7	新 泽 西	2.9	华 盛 顿	2.1	得 克 萨 斯	1.8
8	华 盛 顿	2.2	得 克 萨 斯	1.8	新 泽 西	1.6
9	马 里 兰	1.8	宾夕法尼亚	1.7	宾夕法尼亚	1.6
10	佛 罗 里 达	1.7	马 里 兰	1.5	密 执 安	1.4
11	宾夕法尼亚	1.6	密 执 安	1.5	俄 勒 冈	1.3
12	密 执 安	1.4	俄 亥 俄	1.2	亚 利 桑 那	1.2

资料来源：美国普查局《1980年各州人口种族分布》(PC80-S1-3)。

美国普查局《专题报告》(PC(2)1C1960, PC(2)1G1970)。

此表由王恭立编制。

美国华人人口性别比较表(一八六〇至一九七〇)

年 代	总 数	男 性	女 性	男性与女性 之百分比
1860	34,933	33,149	1,784	1,858.1
1870	63,199	58,633	4,566	1,284.1
1880	105,465	100,686	4,779	2,106.8
1890	107,488	103,620	3,868	2,678.9
1900	89,863	85,341	4,522	1,887.2
1910	71,531	66,856	4,675	1,430.1
1920	61,639	53,891	7,748	695.5
1930	74,954	59,802	15,152	394.7
1940	77,504	57,389	20,115	295.3
1950	117,629	77,008	40,621	189.6
1960	237,292	135,549	101,743	133.1
1970	431,583	226,733	204,850	110.7

美国华人人口区域分布表

	1980年 总 数	1980年 分 布 百分比	1970年 总 数	1970— 1980年变 化百分比	1960年 总 数	1960— 1970年变 化百分比
全美华人总数	806,027	100.0	435,062	85.3	237,292	83.3
东北部	217,730	27.01	115,777	88.1	53,654	115.8
新英格兰	32,969	4.09	18,113	82.0	8,527	112.4
缅因	484	.06	206	135.0	123	67.4
新罕布什尔	790	.10	420	88.1	152	176.3
佛蒙特	271	.03	173	56.7	68	154.4
马萨诸塞	25,015	3.10	14,012	78.5	6,745	107.7
罗得岛	1,718	0.21	1,093	57.2	574	90.4
康涅狄格	4,691	0.58	2,209	112.4	865	115.3
中大西洋地区	184,761	22.92	97,664	89.2	45,127	116.4
纽约	148,104	18.37	81,378	82.0	37,573	116.6

续 表

	1930年 总 数	1980年 分布百 分比	1970年 总 数	1970— 1980年变 化百分比	1960年 总 数	1960— 1970年变 化百分比
新泽西	23,366	2.90	9,233	153.1	3,813	142.1
宾夕法尼亚	13,291	1.65	7,053	88.4	3,741	88.5
中北部	72,905	9.04	39,343	85.3	17,863	120.2
东北中部	57,565	7.14	31,001	85.1	14,750	110.2
俄亥俄	9,911	1.23	5,305	86.8	2,507	131.5
印第安娜	3,994	0.50	2,115	87.9	952	122.2
伊利诺斯	28,590	3.55	14,474	97.5	7,047	105.4
密执安	10,992	1.36	6,407	71.6	3,234	98.1
威斯康星	4,097	0.51	2,700	51.7	1,010	167.3
西北中部	15,340	1.90	8,342	83.9	3,113	168.0
明尼苏达	4,835	0.60	2,422	99.6	720	236.4
衣阿华	2,110	0.26	993	112.5	423	134.8
密苏里	4,290	0.53	2,815	52.4	954	195.1
北达科他	305	.04	165	84.9	100	65.0
南达科他	269	.03	163	47.0	89	83.1
内布拉斯加	1,106	0.14	551	100.7	290	90.0
堪萨斯	2,425	0.30	1,233	96.7	537	129.4
南部	90,616	11.24	34,284	164.3	16,605	106.5
南大西洋地区	50,558	6.37	19,332	175.8	8,555	126.0
特拉华	1,004	0.12	559	79.6	191	192.7
马里兰	14,485	1.80	6,520	122.2	2,188	197.9
首都华盛顿	2,475	0.31	2,582	-4.2	2,632	-1.9
弗吉尼亚	9,360	1.16	2,805	233.7	1,135	147.1
西弗吉尼亚	881	0.11	373	136.2	138	170.3
北卡罗来纳	3,170	0.39	1,255	152.5	404	210.6
南卡罗来纳	1,338	0.17	521	166.4	158	229.7
佐治亚	4,324	0.54	1,584	173.0	686	130.9
佛罗里达	13,471	1.67	3,133	330.0	1,023	206.2

续表

	1980年 总 数	1980年 分 布 百分比	1970年 总 数	1970— 1980年变 化百分比	1960年 总 数	1960— 1970年变 化百分比
东南中部	7,565	0.94	4,235	78.6	2,074	104.2
肯塔基	1,318	0.16	558	136.2	288	93.8
田纳西	2,909	0.36	1,610	90.7	487	230.8
亚拉巴马	1,503	0.19	626	140.1	288	117.4
密西西比	1,835	0.23	1,441	27.3	1,011	42.5
西南中部	32,493	4.03	10,717	203.2	5,977	79.3
阿肯色	1,275	0.16	743	71.3	676	9.9
路易斯安那	3,298	0.41	1,340	146.1	731	83.3
俄克拉何马	2,461	0.31	999	146.3	398	151.0
得克萨斯	25,459	3.15	7,635	233.5	4,172	83.0
西部	424,776	52.70	245,658	72.9	148,386	65.6
西部山区	19,509	2.42	9,245	110.0	5,966	55.0
蒙大拿	349	0.04	289	20.8	240	20.4
爱达荷	905	0.11	493	81.7	311	60.1
怀俄明	392	0.05	292	34.3	192	52.1
科罗拉多	3,897	0.48	1,439	161.7	724	105.4
新墨西哥	1,441	0.18	563	156.0	362	55.5
亚利桑那	6,820	0.85	3,878	75.9	2,936	32.1
犹他	2,730	0.34	1,281	113.1	629	103.6
内华达	2,978	0.37	955	211.8	572	66.9
太平洋地区	405,267	50.28	236,413	71.4	142,420	66.0
华盛顿	18,113	2.25	9,201	96.9	5,491	67.6
俄勒冈	8,033	1.00	4,814	66.9	2,995	60.8
加利福尼亚	322,340	39.99	170,131	89.5	95,600	78.1
阿拉斯加	521	0.06	228	128.5	137	66.4
夏威夷	56,260	6.98	52,039	8.1	38,197	36.2

资料来源：美国普查局《1980年各州人口种族分布》(PC80-S1-3)。

美国普查局《专题报告》(PC(2)1C1960, PC(2)1G1970)。

此表由上表立编制。

美国华人出生情况表(一九〇〇至一九八〇)

年 代	美国出生%	非美国出生%
1900	10	90
1910	21	79
1920	30	70
1930	41	59
1940	52	48
1950	53	47
1960	61	39
1970	53	47
1980*	46	54

* 1980年为估计数字

资料来源：美国一九〇〇——一九七〇年人口统计。

上表中“美国出生”一栏，不仅包括在美国出生的华人，而且也包括其父母中有一人为美国公民的非美国出生的华人子女。人口普查局把这些人也计入了此栏。许多华人就是根据这种关系而要求享有公民权，并且移民到美国的。因此，美国出生华人的百分比实际上可能低于本统计数字。

美国各州印度支那难民人数表

(截至一九八一年六月三十日)

排 列 顺 序	州 名	人 口
1	加利福尼亚	173,955
2	得 克 萨 斯	44,589
3	华 盛 顿	23,336
4	宾夕法尼亚	19,570
5	伊 利 诺 斯	18,619
6	明 尼 苏 达	16,738
7	俄 勒 冈	15,189
8	弗 吉 尼 亚	15,030
9	纽 约	14,331
10	路易斯安那	11,750
11	佛 罗 里 达	9,304
12	马 萨 诸 塞	8,890
13	密 执 安	8,862
14	科 罗 拉 多	8,499
15	衣 阿 华	7,841
	其他各州	107,004
		共计: 503,507

资料来源：美国卫生及人事服务部所属亚洲难民署。

此表由王恭立编制。

